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College of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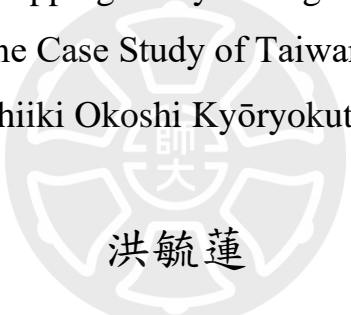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探討地方創生職員之資訊行為與資訊世界圖——

以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臺灣籍隊員為例

An 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Study of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taff's
Information Behavior: The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Members of Japan's
Chiiki Okoshi Kyōryokutai



洪毓蓮

Hung, Yu-Lien

指導教授：柯皓仁 博士

Advisor : Ke, Hao-Ren, Ph.D.

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June 2025

中文摘要

「地域振興協力隊」是日本總務省自2009年以來推動地方創生的政策實施之一，旨在吸引都市青壯年或外國人移居地方，從事農業、觀光推廣、社區營造等公共任務。隨著制度逐步開放外國籍人士申請，越來越多臺灣青年參與該制度，進入日本各地從事地方工作。然而，外籍協力隊員在跨文化環境中生活與工作的資訊行為樣貌及其影響因素，仍缺乏現有研究。本研究以任職於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的臺灣籍隊員為對象，探討其任職前至任職期間的資訊需求、資訊來源、互動方式與資訊世界的變化。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針對10位曾任或現任臺灣籍協力隊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與繪製資訊世界圖（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IWM）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資訊世界圖法有助於受訪者圖像化其資訊互動網絡，呈現資訊來源的重要人物、場所與媒介，並探討其在不同任期階段的資訊世界之變化。

研究結果顯示，隊員在任職前資訊需求集中於工作內容、制度理解、生活環境與前輩經驗，主要透過熟人介紹與網路搜尋（如Google、Facebook社團）進行。任職後，資訊行為逐漸轉為高度情境化，隊員仰賴在地行政單位、社區居民、活動場所等建立新的資訊網絡，資訊互動方式亦由單向接收轉為主動探索與雙向協作，反映出角色與身分由「制度申請者」轉變為「地方參與者」的歷程。部分隊員更進一步將資訊行為延伸至創業規劃與地方扎根，展現資訊行動的延續性與目的性。

此外，本研究發現資訊取得的挑戰並非僅限於語言與媒介使用，更深層地涉及地方行政習慣、資訊公開文化與人際信任網絡。即便身處地方政府或支援機構中，若涉及內規、流程或文化默會知識時，資訊往往難以透明傳遞。特別在文化封閉、熟人社會色彩濃厚的地區，外籍隊員面臨較高的資訊可進入障礙，與文化開放地區相比，其資訊行為策略與適應歷程明顯不同。

本研究亦指出，資訊行為具有顯著的個體差異，受隊員過往背景、任務性質與個人特質影響。有者擅長運用數位工具與社群媒介提升資訊效率，也有者

傾向透過人際互動與地方實地參與累積知識與網絡，並調整資訊行為以配合未來生涯規劃。

本研究觀察到資訊行為不僅是協力隊完成任務的技術手段，更是其身分認同建構與在地融合的重要過程。研究建議未來制度設計應強化前後輩交流機制、建立多語資訊平台，並導入制度彈性（如短期參與制度），同時鼓勵本國高等教育與地方政府合作設置「事前接觸機制」，以提升青年跨文化適應力與資訊行動力，促進制度永續與地方多元化發展。

關鍵詞：地域振興協力隊、資訊行為、資訊世界圖、跨文化適應、地方創生



Abstract

The Chiiki Okoshi Kyōryokutai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Cooperation Program) is one of Japan's policy initiatives to promot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program to include foreign national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young Taiwanese individuals have engaged i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work across Japan. However, there remains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information needs and behaviors of foreign participants operating in cross-cultural environmen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aiwanese members of the program, exploring their information behavior before and during their tenure, as well as the evolving structure of their information worlds.

Using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his research employs the 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IWM) method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efore employment, participants primarily sought information related to job content,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former members—largely relying on informal interpersonal networks. During their tenure, as they encountere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d workplace challenges, their modes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shifted, leading to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new, community-centered information networks. The analysis of the IWM diagrams further illustrates changes in the key people, places, and tools involved in their information interact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information behavior is shaped not only by 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es but also by individuals' personal background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local support networks. Based on th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uture program designs enhan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rrent and former members and offer multilingu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to improve information adaptability and support the local integration of foreign personnel.

Keywords: Chiiki Okoshi Kyōryokutai, information behavior, 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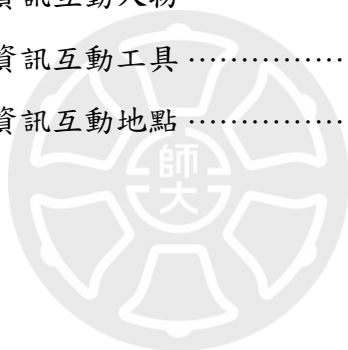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i
目次	iv
表次	vi
圖次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2
第二節 研究目的.....	5
第三節 研究問題.....	5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6
第五節 名詞解釋.....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	9
第一節 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制度.....	9
第二節 資訊行為與青壯年赴外工作.....	21
第三節 資訊世界圖研究法.....	30
第四節 小結.....	40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2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招募.....	42
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工具.....	46
第三節 研究流程.....	51
第四節 資料編碼.....	52
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60
第一節 任職前資訊搜群歷程與其需求與來源管道.....	60
第二節 任職協力隊中的資訊行為與互動.....	74
第三節 資訊世界圖中的人、物、地點出現狀況.....	106
第四節 綜合討論.....	13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35
第一節 結論.....	135
第二節 建議.....	138
參考資料	141

附錄一：知情同意書	150
附錄二：基本資料調查問卷	151
附錄二：訪談大綱	153
附錄三：資訊世界圖繪製說明	154



表次

表 1-1 近六年居住於日本之外國人口數	3
表 2-1 資訊視域、資訊世界與資訊世界圖三項理論之比較	34
表 3-1 受訪者資料表	45
表 3-2 編碼表範例	53
表 3-3 PA08 資訊搜尋歷程編碼表	55
表 3-4 PA07 編碼與訪談表	57
表 3-5 PA07 編碼與訪談表	58
表 4-1 任職前之資訊需求類型與資訊來源	68
表 4-2 未來規劃之資訊需求類型與資訊來源	105
表 4-3 任職前與任職中資訊互動人物	110
表 4-4 任職前與任職中資訊互動工具	119
表 4-5 任職前與任職中資訊互動地點	128



圖次

圖 2-1 採用外國籍地域振興隊員的方式	11
圖 2-2 2009 年至 2024 年歷年參與協力隊隊員之每年度人數	12
圖 2-3 2009 年至 2024 年回答問卷的隊員人數	13
圖 2-4 Kuhlthau 資訊搜尋歷程	24
圖 2-5 Wilson 資訊尋求行為模型(1999)	25
圖 2-6 年輕父母的資訊世界圖範例	39
圖 3-1 研究流程圖	51
圖 3-2 PA07 任職前與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57
圖 4-1 PA02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75
圖 4-2 PA01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80
圖 4-3 PA06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81
圖 4-4 PA07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82
圖 4-5 PA10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83
圖 4-6 PA09 與 PA02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84
圖 4-7 PA01 任職前/中資訊世界圖	89
圖 4-8 PA05 任職前/中資訊世界圖	89
圖 4-9 PA02 任職前/中資訊世界圖	90
圖 4-10 PA03 任職前/中資訊世界圖	90
圖 4-11 PA08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91
圖 4-12 PA03 與 PA06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95
圖 4-13 PA10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96
圖 4-14 PA01 與 PA02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97
圖 4-15 PA01 與 PA03 未來規畫資訊世界圖	99
圖 4-16 PA04 與 PA08 未來規畫資訊世界圖	100
圖 4-17 PA05 未來規畫資訊世界圖	101
圖 4-18 PA02 與 PA10 未來規畫資訊世界圖	102
圖 4-19 PA07 與 PA09 未來規畫資訊世界圖	104
圖 4-20 PA06 未來規畫資訊世界圖	104

圖 4-21 PA06 與 PA01 任職前資訊世界圖.....	107
圖 4-22 PA06 與 PA08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108
圖 4-23 PA10 任職前與任職後的資訊互動對象由原本社交圈擴增至地方社會的角色.....	112
圖 4-24 人物互動頻率與資訊取得難易度.....	114
圖 4-25 PA02 與 PA03 任職前的繪圖，皆使用了 Facebook 與 Google 工具.....	116
圖 4-26 PA03 與 PA07 任職中的繪圖，皆運用了 Instagram、Threads 工具進行向外的資訊分享與推廣.....	117
圖 4-27 PA09 任職中的繪圖以地點（三角形）為主.....	118
圖 4-28 PA01、PA02、PA07 與 PA08 任職前資訊世界圖.....	120
圖 4-29 PA10 任職前資訊世界圖.....	121
圖 4-30 PA10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122
圖 4-31 工具互動頻率與資訊取得難易度.....	123
圖 4-32 PA10 任職前因前工作的地點進而對鄉村有良好印象.....	125
圖 4-33 PA09 任職前於東京的地方特產館短期打工.....	125
圖 4-34 PA10 未來規劃資訊世界圖，前往東京茶館學習未來創業技能.....	126
圖 4-35 PA09 任職中與未來規劃皆畫出臺灣與日本締結姊妹市，未來也志在繼續為雙方兩縣市擔任橋樑.....	127
圖 4-36 PA06 與 PA07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皆標示出研修場域.....	129
圖 4-37 PA03 任職前經常利用語言學校的職涯輔導室（多文化共生教室）求職.....	130
圖 4-38 PA06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標示出公民館、地方企業等.....	130
圖 4-39 地點互動頻率與資訊取得難易度.....	132

第一章 緒論

在全球化與地方化同步發展的背景下，地方創生已成為日本因應人口外流與地方經濟衰退的策略之一。自 2009 年日本總務省啟動「地域振興協力隊（地域おこし協力隊）」制度以來，日本政府藉由該機制招募來自都市地區與海外的青壯年進入地方社區，參與公共服務與地區振興等多元任務，藉此促進地方人口回流與活化地區經濟。

「地域振興協力隊」屬於具薪資與補助的有償職位，性質並非志願服務。隊員通常由地方政府（自治體）聘任，聘期以一年為單位，最長可達三年。工作單位涵蓋地方政府機關（市/町/村役所）或非營利組織，職責內容依地區發展目標而異，其職務性質近似「半公務員」身份。為協助隊員安定生活與執行任務，制度亦提供住宿補助、活動經費及差旅費等支援。另為鼓勵任期結束後定居於當地，部分地方政府設有創業獎勵金制度，最高可提供 100 萬日圓之補助，用以支持隊員從事地方創業。

隨著地方政府日益重視地方的國際化發展，此制度逐步擴大外國籍人士的參與機會。除日本籍國民外，具備日語能力並對地方創生有興趣的外國籍人士也可申請擔任協力隊隊員，成為促進地方多元化發展的一環。對於跨文化背景的隊員而言，在地方社區的生活與工作中，須應對適應環境、建立人際關係、處理職務挑戰與思考生涯發展等多重需求，而這些需求的應對過程與資訊行為密切相關。因此，探討隊員的資訊行為，有助於理解其融入與適應的過程及其所處資訊環境的樣貌。

本研究聚焦於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探討其從赴日前的準備階段至任期中各階段的資訊行為，包括資訊需求的類型、資訊來源的選擇、資訊的使用方式與分享模式等。研究將資訊行為視為一個動態歷程，試圖掌握隊員如何因應不同生活與工作情境，調整其資訊策略與互動方式。

為建構分析架構，研究參考數個資訊行為理論，包括 Wilson (1999) 提出的資訊行為模型，此模型說明資訊需求的觸發機制、行動的動機與過程中的障礙；同時亦採用 Kuhlthau (1991) 所發展的資訊搜尋歷程模型，以掌握受訪者在資訊搜尋過程中可能經歷的情感變化與資訊搜尋策略發展之階段。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採用質性訪談為主軸，並輔以資訊世界圖（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IWM）作為訪談工具（Greyson, 2015）。受訪者將透過繪圖方式呈現其資訊互動的關鍵人物、場所與資訊流動路徑，以具象化其資訊世界的結構與特徵。訪談與圖像資料將進行內容分析，進一步對照理論架構，分析隊員如何透過各種資訊行為應對跨文化與工作環境中的實際需求。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臺灣人口老化、總人口逐漸減少且過度集中於都會區，導致多數縣市人口減少。為應對此挑戰，行政院於 2018 年結合中央政府、地方單位、民間及學者專家，兩次召開「地方創生會議」，並宣布 2019 年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導推動。在全台 368 個鄉鎮中，依據人口規模、變化率及居民收入三項指標，優先選擇基礎生活設施薄弱且難以維持運作的鄉鎮進行地方創生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該計畫目標在於促進人口回流，依據地方特色引進科技及產業發展，推動島內移民，均衡臺灣各地區發展。

相比於臺灣，日本更早進入少子高齡化社會，增田寬也於 2014 年的著作《地方消滅》更進一步強調了對於未來三十年內日本市町村可能面臨的困境；年輕人口大量向三大都市圈（東京、大阪、名古屋）遷移，城鄉之間人口結構嚴重失衡；同時，都市工作競爭激烈，進一步加劇了城市內的超低出生率問題，導致「地方消滅」及「東京一極化」現象的發生（增田寬也，2014）。2012 年，當時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第二次就任執政，開始著手解決這些人口與經濟發展問題，提出了「安倍三支箭」（又稱安倍經濟學）政策，其中之一就是結構性經濟改革和成長策略。這些政策措施中，也包含了激勵地方小經濟圈再生的方案。內閣府於 2014 年「城鎮、人、工作創生本部」推動的〈地方創生法案〉、〈地域再生法修正案〉與相關創生案例，即「地方版安倍經濟學」（日本經濟新聞報，2014），該政策亦希望透過地方自主性地對相關產業發展方案的提出，藉以振興地方經濟，吸引人口移住，以達區域平衡。隨後再提出了地方創生版的「三支箭」（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2015），為推動地方創生計畫提供重要支援。這三支箭包括「情報支援」、「人才支援」和「財政支援」。其中第二支箭培育對象以地方人才的培育為中心，其中就包括「地方振興協力

隊」。

「地域振興協力隊」是一項由日本總務省推動的措施，地方政府招募從城市地區移居來的人任命為「地域振興協力隊員」，他們參與農林畜牧、觀光推廣、教育、醫療與健康照護等工作，推廣當地魅力等各種支援地區居民的活動，以促進這些移居者在當地定居與扎根（一般社團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2009）。而在政府、地方與企業的合作下，如今可以看見許多日本地方創生成功案例；包含因帶動觀光人潮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而被稱作地方創業聖地的「西粟倉村」（Cheers 地方創生，2019）；2015 年 10 月開設的日本第一間公立日語學校的北海道東川町，運用「寫真之町」、「寫真甲子園」事業，尤其是町內透過公立日語學校事業招募外國留學生，外國人進入東川町的人數明顯增加，活絡地方經濟。（谷脇茂樹，2019）。

日本政府為解決人才不足的當務之急，2019 年設立了「特定技能勞動者」（specific skilled worker）的簽證，以招募外國勞動者（朝日新聞網，2021）。招募業種除了傳統的營建業、清潔業、農漁業外，尚有大量人力需求的零售業和旅宿業等。如此透過政策擴大僱用外籍人才和放寬留學生在日工作條件下，以致外國人快速增加。根據日本法務省，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統計，請見表 1-1，直至 2023 年底，持有中長期簽證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數（法務省出入國在留管理庁，2023）將近三百五十萬人，人數遠多於 2020 年爆發之新冠疫情而銳減的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數，可見外國籍人士正大量進入日本的職場或學校中。

表 1-1 近六年居住於日本之外國人口數

年分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6 月末	2023 年底
外國人總數	2,731,093 人	2,933,137 人	2,887,116 人	2,760,635 人	3,075,213 人	3,223,858 人	3,410,992 人
臺灣人數	60,684 人	64,773 人	55,872 人	51,191 人	57,294 人	60,220 人	64,663 人

註：引自法務省出入國在留管理庁（2023），令和 5 年 6 月末現在における在留外國人人数について <https://www.moj.go.jp/isa/content/001403955.pdf>

自 2017 年才有學者開始對外國籍協力隊隊員進行考察（山本訓弘，2017），當時外國籍隊員僅 11 位，從事的工作內容多以行銷觀光資訊為主，提出應向外國人多加推廣協力隊一職之建議；以及提及過去有日籍隊員因職場霸凌而中途退隊之一案例，建議為因應外籍隊員的增加，勢必有文化差異之過渡期，接洽

隊員的行政職員應加強支援外籍隊員上的生活支援。上水流久彥（2024）以地方政府行政機構角度歸納雇用外國籍隊員的理由，包含：（1）為了應對日本社會中對於入境旅遊需求，以及增加外國籍居民；（2）日本行政機構內具備外語能力的日本籍職員非常少；（3）此制度允許不需要終身雇用；（4）能根據社會變化靈活調整工作內容。另一方面，外國籍的隊員則能夠：（1）容易地獲得在日本生活的工作簽證；（2）利用這個工作機會作為思考未來生活去向。該研究同時也提及，臺灣籍隊員占比大宗歸因為，臺灣較親日性的影響之下，同時又推廣日本地方區域觀光主流化（上水流久彥，2024）。各項研究以日本雇用單位角度來衡量，鮮少以實際上任後隊員角度研究，故本研究欲從臺灣籍協力隊隊員的資訊世界圖視角深入探討雇用外國籍協力隊的制度。

另一方面，自 2017 年起，每年度日本總務省會進行地方振興協力隊隊員的問卷調查，調查項目不外乎，基本資料（性別、年齡、任職地、原居住地、委任時期等）、申請理由、資訊獲取途徑、活動狀況（活動內容、活動經費、兼職、副業等）、活動評價（期望度、滿意度）、任期結束後的意向。2024 年最新的一期的報告提出了關於未來「地區振興協力隊」制度充實的幾項建議（總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自立応援課，2024a）：例如（1）「地區振興協力隊實習」制度的活用；（2）地方政府應與過去的協力隊員合作，提供隊員日常支援，解決活動中遇到的問題，從而避免隊員孤立並減少中途退任者；（3）然而，若隊員與過去的協力隊員沒有聯繫，則很難進行諮詢，因此，有必要明確諮詢窗口，並建立都道府縣範圍內的支援組織，提供隊員更方便的諮詢體制；（4）強化針對創業的培訓與推動；（5）建立協力隊與民間企業的網路。

綜合上述問卷調查結果，許多受訪者建議應加強與過往協力隊員或民間組織的資訊聯繫，透過擴大聯絡網路以幫助未來隊員更便捷地獲取所需資訊。然而，目前多數研究以線上問卷為主要調查工具，例如：根據日本公部門之針對地域振興協力隊計畫進行之檢視與討論的調查報告書（国立国会図書館，2024）。儘管問卷調查能迅速蒐集大量數據，該方法在資訊行為研究中的應用仍存在一定侷限性。其結構化問卷設計限制了受訪者的回應範圍，使研究難以充分捕捉資訊行為中隱含的細節與動態。例如：資訊尋求過程中的人際互動模式，以及資訊來源如何受地點或情境影響，往往無法透過問卷深入揭示。

相較之下，質性研究提供了一種更細緻的研究取徑，適用於探索資訊行為中與人、物、地點之間的深層關聯。質性訪談方法能揭示受訪者在資訊尋求、分享與使用過程中的主觀經驗，進一步描繪出資訊行為中促進或阻礙的具體因素。此方法亦有助於分析協力隊員在不同情境下的資訊行為，理解其資訊需求的變化與人際資訊交流的模式。

為補足傳統調查方法在捕捉資訊行為細節上的限制，本研究採用資訊世界圖法作為首要工具。透過引導臺灣籍協力隊員描繪其資訊互動圖像，可視化其資訊來源、資訊共享模式與互動網路，進一步分析其在地方創生工作中所處資訊世界的結構與脈絡。藉此，研究得以更全面呈現受訪者在具體情境中的資訊行為樣貌，並補充現有文獻中對於協力隊員資訊互動經驗的理解。。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臺灣籍隊員關於任職前的迷惘與任職中對工作上遇到困境，分析臺灣籍青壯年在協力隊任務中的資訊需求、行為模式與資訊世界樣貌，歸納出臺灣籍隊員在從事此工作時的資訊需求類型、資訊分享的情形，以及資訊世界中重要的人、物與地點。不僅有助於瞭解資訊搜尋過程中的心理變化，也能揭示社會網路對資訊獲取的影響。研究目的如下：

- 一、瞭解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員從申請到赴任前的資訊搜尋歷程過程。
- 二、探討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員在任職前/後資訊世界中關鍵的人、地與資訊來源，及其在資訊互動中的角色與意義。
- 三、探討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員其資訊世界圖中資訊互動網路的結構，以及資訊行為對未來規劃之影響。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前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為深入瞭解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員在赴日前後的資訊行為歷程與其資訊世界的變化樣貌，本研究擬聚焦以下三項研究問題：

- 一、臺灣籍青年在申請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的歷程中，其資訊需求為何？主要透過哪些方式進行資訊搜尋與確認？此一資訊搜尋歷程如何影響其申請決

策？

二、在任職前與任職期間，臺灣籍協力隊員所處的資訊世界中，關鍵人物、媒介與地點的角色為何？這些資訊互動對象如何形塑其資訊取得、判斷與分享的行動策略？

三、臺灣籍協力隊員在任職期間面對跨文化職場與地方生活時，其資訊行為在資訊世界圖中呈現出何種互動結構？此一結構如何影響其地方適應與未來生活規劃？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 2024 年以前曾經任職或是現在在職於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者為主要研究對象。國籍方面，外國籍隊員國籍雖國籍眾多，本研究將國籍縮小並限制於臺灣籍的隊員，主要考量為便於整理與歸納出一致的遇到困境的處理方式，並志在分享臺灣人至日本地方職場上遇到的文化差異，減少申請上的迷惘與統整未來任職後的去向，給予未來有志於此工作的臺灣人參考方向。

研究方法面，因本研究使用資訊世界圖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為提升圖像資料的一致性與可比較性，並避免受訪者繪圖方式差異過大影響分析效度，故於訪談前即設計並說明繪圖結構與基本符號，並對圖面呈現方式進行適度限制與標準化。雖此舉可能壓縮部分受訪者的自由表達空間，然亦有助於提升圖像資料的分析價值與跨個案比較的可行性。

第五節 名詞解釋

一、 地域振興協力隊 (Chiiki Okoshi Kyōryokutai)

日本總務省於 2009 年訂定的一項制度，地域振興協力隊的隊員需由地方政府（自治體）正式委任，依據自治體給付的月薪不一致，平均約為每月 20 萬日幣，除此之外還可以獲得住宿費、行動費等補助福利。此計畫主要目的是讓隊員在人口外流的市村町與高齡化加劇的地方進行各種地區協力活動。委任期間通常為一年至三年，隊員需將生活據點從日本三大都市圈城市地區遷移至人口外流地、山村、離島或半島等，並將戶籍遷移至當地。此制度旨在積極接納來

自外地的人才，並促進他們在當地定居與扎根。這項制度的目的在於，不僅給對地方生活與社區貢獻有興趣的都市居民需求，同時也維持與強化地方的活絡與發展。

二、 資訊行為 (Information Behavior)

資訊行為一詞用來描述個體與資訊的互動過程，特別是資訊的搜尋與使用 (Bates, 2010)，資訊行為探討人們在不同情境中 (如工作、學習、日常生活)，如何尋求、獲取、評估以及應用資訊的模式。這些行為涉及各種因素，包括個人需求、社會背景以及環境條件對資訊行為的影響。資訊行為範疇廣泛，涵蓋了主動搜尋與被動接收資訊等多樣行為類型。

隨著科技的進步，資訊行為研究的範疇也在不斷擴展，特別是對數位與網路環境中資訊行為的深入探討。理解一個人的資訊行為，首先需分析其資訊需求及其需求背後的驅動因素。這些需求往往源自特定情境中的挑戰，促使個體展開資訊尋求行動，以填補其知識上的不足或解決實際問題。

在資訊行為的研究中，經典理論模型為探索這些行為提供了重要的框架基礎。例如：Kuhlthau (1991) 提出的資訊搜尋歷程模型；Wilson 資訊尋求行為模型 (1999)。這些理論在國內外的資訊行為研究中持續被廣泛應用和討論。這些理論為理解人們如何尋求、使用和分享資訊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三、 資訊世界圖研究法 (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IWM)

資訊世界圖是一種質性研究工具，由 Greyson (2013) 提出並於其博士論文中 (Greyson, 2015) 奠定基礎。資訊世界圖的概念起源於對資訊行為理論的探索，旨在幫助參與者以視覺化方式表達其生活或工作環境中的資訊行為及互動，解決傳統訪談法無法完全捕捉參與者資訊行為及其社會脈絡的問題。該方法結合了「資訊視域圖」(Information Horizon Map)、關係圖 (Relational Map) 與「影像發聲法」(Photovoice) 等視覺化技術，允許參與者繪製出與特定情境相關的資訊來源、人際關係、地點及事物，並將自身納入圖中，從而展示他們的資訊生態系統。此方法能視覺化資訊行為中的社會脈絡，促使研究者深入理解參與者如何使用、尋求及分享資訊。本研究採用了資訊世界圖，要求受訪者繪

製自己作為協力隊隊員時的資訊世界，並透過訪談瞭解他們的資訊行為經驗，藉此豐富研究資料，增強對前往任職協力隊歷程的認識。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第一節先回顧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制度面的發展及至今的變化，介紹工作類型、此制度實施現況，其中此制度的計畫實施包含任期前的招募階段、任期中的、任期結束後定居情況；而此制度實施至今不乏面臨一些困境，其中包含地方政府雇用方無法在應徵階段有效傳遞當地真實資訊與支持資源，導致隊員對生活與工作的想像與現實產生落差，進而影響其工作表現與長期定居的意願；地方政府雇用方對職務說明不具體，導致任期中的協力隊隊員與地方政府職員有理解上的分歧，以及協力隊隊員與地方居民溝通協調等問題等。本研究統整此制度實施上面臨的三大構面以及外國籍隊員在此制度之下工作上目前面臨的難題，有助於本研究探討臺灣籍隊員赴任前與任期中之間將會遇到的狀況。第二節回顧資訊行為中的資訊需求與 Kuhlthau 與 Wilson 提出的資訊行為模式，有助本研究第三章撰寫質性訪談大綱的架構參考；同時於此節也回顧了青壯年赴海外留學、求職與打工度假三種海外生活模式的資訊行為研究，有助於加深本研究回顧青壯年在海外生活面臨困境時，常進行的資訊行為方式。第三節，回顧資訊世界圖的起源與此研究法應用於國內外的文獻中，藉此剖析此研究法應用於本研究上的適切度。

第一節 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制度

一、 地域振興協力隊制度的發展

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制度背景係由前總務省地域力創造審議官椎川忍先生主導推動，自 2009 年 3 月 31 日始，為解決城鄉失衡，作為日本總務省的地方活化政策之一，由總務省創設了被視為劃時代的制度——「協力隊制度」，該制度允許將人事費用用於引進外部人才投入地方工作（小竹森晃，2016）。凡符合人口減少標準的市町村地區（以下簡稱地方），皆可招募「地域振興協力隊」，一旦入選為地域振興協力隊的隊員，必須從都會地區移居到都會區以外的地方自治體（日本的地方自治體係指「都道府縣」及「市區町村」。都道府縣是大範圍的行政區。市區町村則是小範圍的行政區），隊員的薪資、業務執行等費用由日本總務省補助，每年有包含 200 萬至 250 萬日幣的年薪，以及最

高 200 萬日幣的活動經費。此制度旨在吸引青壯年從都市搬至鄉村居住並工作，目的是向內協助地方創生，向外從事觀光推廣或農林水產業產品的開發與販賣，是一項促進地方活化事業的扎根計畫。此外，隊員任期為一至三年，為了提高任期結束之後的定居率，政府更祭出 100 萬日圓創業基金的補助（總務省，2025），讓隊員不僅只是地方過客，更鼓勵隊員任期結束後繼續深根地方。

以 2021 年總務省統計歷年的協力隊隊員資料為例，全日本的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有 6,015 名，參與招募地域振興協力隊的地方自治體有 1,085 個（梶原良樹，2022）。此外，累計十餘年來參與隊員中約有四成女性，七成參與者是 20-39 歲之間的年輕世代，並有六成左右成員在計畫結束後繼續留在當地工作（總務省，2019）。顯見這項政策對於推動年輕人安居鄉村已略有成效。

自 2009 年開始，總務省為擴大隊員人數，除了歡迎有經驗的中壯年應徵，近年也積極推動將徵才目光擴大至「在日外國人」（読売新聞オンライン，2024），圖 2 1 為採用外國籍地域振興隊員的方式，為了協助支援地方政府與有志參加協力隊的外國人之間的配對，總務省提供特別交付稅措施。此舉旨在透過外國人的視角進行觀光推廣，進一步增加地方的入境旅客數量。

圖 2-1
採用外國籍地域振興隊員的方式



註：引自読売新聞オンライン（2024）地域おこし協力隊員に外国人を積極登用 国が財政支援インバウンド期待で増加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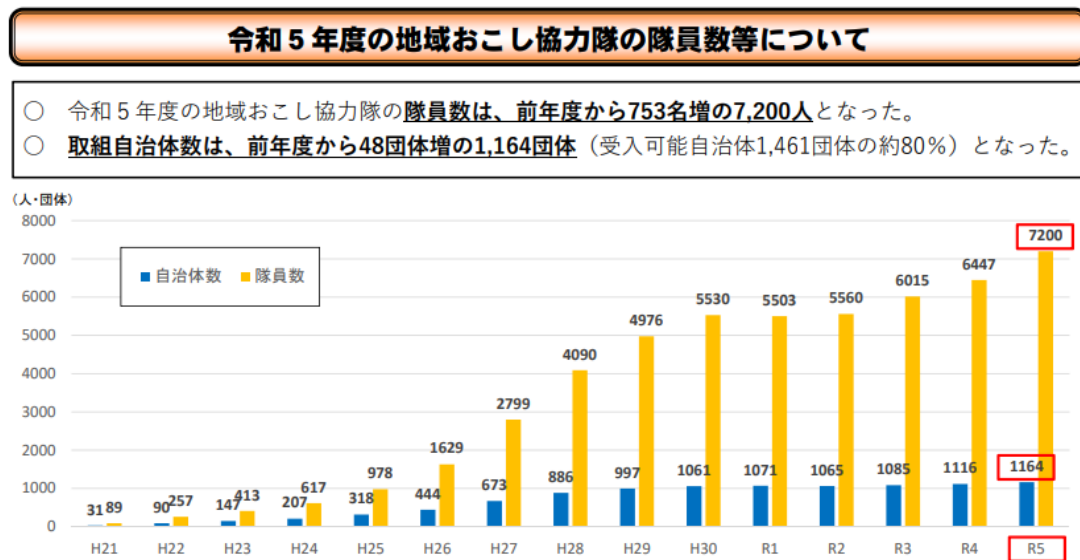
<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40129-OYT1T50102/>

總務省開始這項支援的原因是，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希望利用外國人隊員來促進入境旅客的增長。雖然沒有針對外國籍隊員歷年累積資料的統計，不過根據總務省 2024 年的調查報告表示（總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自立応援課，2024b），全國已有約 150 名外國籍隊員，數量上有逐年增多的趨勢。

今年（2024）年是推動協力隊制度的第 15 年，不論在官方公布資料統計與民間團體進行的問卷調查上，參與協力隊隊員皆有人數逐年增加之趨勢。根據總務省於 2024 年 4 月公布的「令和 5 年度（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3 月）調查報告」中，自 2009 年初辦計畫開始至直至 2023 年，在 2023 年度，10 歲以上、60 歲以下參與中的隊員，有 7,200 位，比 2022 年同期增加了 753 位，漲幅有 11.7%，見圖 2-2；由於每年度的隊員人數皆穩定成長，總務省訂定目標在 2026 年將提升至 10,000 名隊員。（總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自立応援課，2024a）。

圖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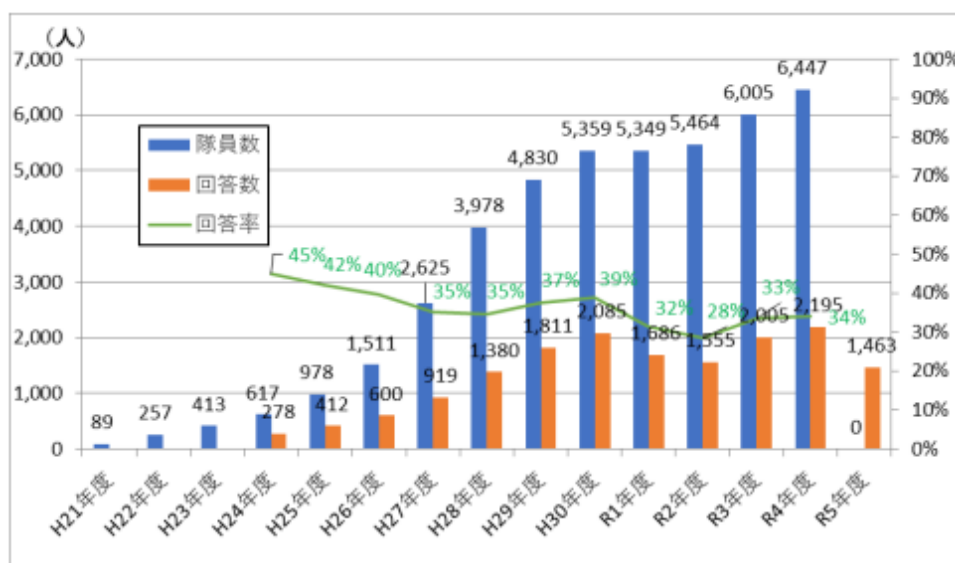
2009 年至 2024 年歷年參與協力隊隊員之每年度人數



註：引自総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2024），令和 5 年度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隊員数等について 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941085.pdf

此外，民間團體在每一年度皆進行線上問卷調查，每年的回答率平均約四成左右。根據 2024 年 2 月公布的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3 日問卷調查結果（見圖 2-3），此份問卷有特別計算到外國籍的協力隊隊員之人數，在 1,463 位回答問卷的協力隊隊員中，有 19 位外國籍隊員，占比第一名的是 9 位臺灣籍隊員（一般社団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2024）。在前一年度問卷裡，在 2,195 位回答問卷的協力隊隊員中，有 39 位外國籍隊員，占比第一名的是 13 位中國籍隊員，臺灣籍隊員有 11 位占比第二（一般社団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2023）。雖然無法就由歷屆調查之中，得知歷年累積外國籍隊員之總數，不過華語籍隊員有占多數的現象。上水流久彦（2024）表示，由於臺灣受推廣日本深度旅遊的觀光，且臺灣民眾較為親日的情況下，是使願意前往日本非大都市工作的臺灣籍隊員占比大宗的主要原因。

圖 2-3
2009 年至 2024 年回答問卷的隊員人數



地域おこし協力隊員数と回答者数の推移
(隊員数は総務省発表の各年度特交ベースによる)

註:引自令和 5 年度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一般社団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2024。(https://www.iju-join.jp/f-join/syousaiban.pdf)

二、 地域振興協力隊の工作

根據一般社団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 (JOIN) (<https://www.iju-join.jp/chiikiokoshi/>) 網站上募集情報檢索欄位，將工作類別分為農業林水產 (例如促進本地農產品生產與外銷)、環境 (例如水資源維護)、醫療/社會福利 (例如高齡者照顧服務)、觀光 (例如地方景點推廣等)、教育 (例如支援學校活動、與兒童的互動活動等)、社區發展 (例如移居推廣與諮詢) 與協助空屋處理等。

總務省 (總務省自治行政局地域自立応援課，2023) 的簡介之中，登載著至今採訪的協力隊隊員們的工作簡介；有些人有著前一份護理師、消防員、空服員的職業經歷，轉職至協力隊從事移居推廣與諮詢的窗口；也有剛畢業的大學生至地方擔任駐派圖書館員 (藤江開生，2024)；除了日籍隊員外，當中也有一個篇幅介紹任職於各地的外國籍隊員，外國籍隊員多半都擔任著觀光推廣 (例如經營社群媒體與撰寫推廣文宣、舉辦線上線下認識該地方的活動以及接待翻譯等) 的工作職位，成為一位自己家鄉與該地方的連結窗口。

三、 現況

地域振興協力隊是日本推動地方創生的重要政策計畫，其運作歷程包含了隊員的招募階段、任期內的活動安排，以及任期結束後的生活規劃。本節將以這三個主要階段為線索，並特別關注外國籍隊員的參與情形，全面探討協力隊制度在推動地方振興與支持隊員適應當地生活及長期發展方面的現況與運作。

(一) 任期前的招募階段

根據 2024 年 2 月一般社團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 JOIN 公佈的調查問卷指出，從 2019 年開始至 2023 年，協力隊隊員初次得知地域振興協力隊的消息是來自親朋家人好友介紹者高達 35% 至 40%；其次是政府等公家機關自治團體的官方網頁，佔 10% 至 21%；第三是一般社團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 JOIN 為 10% 至 21%，僅有少數 5% 至 11% 來自地域振興協力隊前輩的分享與移居相關的展覽或活動。這調查結果顯示，儘管官方網站和社團法人提供的資訊平台有助於擴大協力隊的宣傳，但相較於數位化的資訊傳遞，人與人之間的推薦與分享仍然是最為普遍的資訊來源。這反映出人際網路在資訊傳播中的重要，尤其在涉及生活方式轉變的決策中，人們傾向依賴來自親朋好友的建議。這樣的結果也強調了資訊信任感的重要，透過熟人的介紹，青壯年更容易對地域振興協力隊產生信任和興趣。

該調查進一步指出，申請的動機有 41% 至 60% 來自於「想發揮自己的經驗與能力」、「想促進地方的活化」與「覺得工作內容有趣」，27% 至 37% 「想體驗看看鄉村生活」、「考慮過以此為定居的地點，透過此工作，來準備安排定居」（一般社團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2024）。這表示，地域振興協力隊吸引了許多希望發揮自身經驗和能力，並促進地方活化的青壯年。這部分應徵者看重該工作的社會價值，並視其為一個實現個人理想和回饋社會的機會。此外，有相當比例的應徵者對鄉村生活充滿好奇，希望藉由參與地域振興協力隊，深入體驗鄉村生活，並考慮以此為契機，將鄉村作為長期定居的地點。他們的動機不僅僅是短期的工作安排，而是帶有明確的長期定居計畫，希望通過這段工作經驗來為日後的生活鋪路。

依據該調查來看，地域振興協力隊不僅吸引了那些尋求發揮個人能力、促

進社會發展的青壯年，也為希望探索鄉村生活、準備長期定居的個人提供了一個穩定的過渡平台。

再者，由於 2022 年的調查指出有 30% 回答問卷的隊員在未到任前已經跟其服務之地區的人或是組織有交流與連結，柴原良樹（2022）因而提出重要的建議：由於在上任前已經進行交流是常見的原因之一，因此市町村和地區在接受地區振興協力隊之前，可透過推動地區建設活動與外部人才累積互動，如此有助於增加申請者的數量。有研究也指出（国立国会図書館，2024），在招募過程中設立了「地區振興協力隊實習」等事前配對機制，為申請者與當地社區提供直接接觸的機會，對隊員招募及後續運作產生了正向影響；因為通過實習，申請者能夠在上任前對地區的工作內容有具體的瞭解，並提前與當地居民建立信任與合作關係。透過事前交流活動或是實習，申請者能更具體地掌握工作規劃，減少上任後的期望落差。因此，研究也建議（国立国会図書館，2024）地方政府應加強上任前的交流機制，推動實習及互動活動，幫助申請者適應地區需求並提高參與意願。這些策略不僅能促進地域振興協力隊的有效運作，也能提高計畫的成功率與隊員的滿意度。

（二） 任期中地域振興協力隊、地方政府與當地居民之間的權力與利益關係

地域振興協力隊制度旨在透過外部人才的引入，促進地方發展，活化當地經濟與社區。協力隊隊員的主要透過地方活動獲得成就感、自我實現，以及對鄉村生活的嚮往。然而，實際赴任後，許多隊員表示地方活動的實際情況往往低於他們的預期，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提供的支持與隊員實際需求之間存在落差。這種落差導致隊員們在遇到問題時經常需要向地方政府職員尋求協助，常見問題包括「與當地居民的交流」、「與地方政府職員的溝通」以及「活動目標與內容的具體化和明確度」如此制度運行過程中的權力與利益關係不均衡，使地域振興的實現面臨諸多挑戰（国立国会図書館，2024），隊員三者的互動各自現況如下：

1. 地方政府掌握制度主導權，負責隊員的招募、管理與活動規劃。儘管總務省已發布《地域振興協力隊接納指南》總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自立応援課（2024c），並鼓勵地方政府加強資訊共享，但實務運作中仍存在權力

不對等的問題。部分隊員指出，地方政府的接納體制仍不完善，導致他們的角色與職責受到地方政策變動的影響，有時甚至淪為「臨時人手」，執行行政業務，而非真正參與振興工作。此外，許多地方政府的資訊共享流於形式，隊員僅被要求提交活動報告，而缺乏實質的雙向溝通，導致隊員的想法難以融入當地發展目標。

2. 當地居民的影響力與參與度有限，但他們對協力隊的接受程度將直接影響地域振興的成效。部分地方政府在導入協力隊前，未能充分向居民說明制度內容與目標，導致居民對隊員的角色產生疑惑，甚至出現排斥心理。此外，由於地方政策多由政府主導，居民的發言權相對弱勢，導致他們可能對協力隊的活動缺乏信任或參與感，進一步加深隊員與社區之間的隔閡。
3. 協力隊的處境受到地方政府與當地居民間的權力平衡影響。作為外來人才，隊員的影響力有限，且由於任期通常為 1 至 3 年，難以在短時間內建立長期影響力或改變當地權力結構。當地方政府與當地居民對協力隊的角色認知不明確時，隊員可能陷入「無所適從」的狀態，無法發揮應有的價值。

綜上所述，地域振興協力隊、地方政府與當地居民之間的權力與利益關係，直接影響制度的運行與成效。若地方政府未能建立完善的接納體制，並與隊員及當地居民進行充分溝通，將導致各方的期待與實際運行產生落差，進而削弱地域振興的效果。因此，未來應更加重視三方間的協調機制，縮小權力不均衡的問題，使協力隊真正成為促進地方發展的重要力量。

（三） 任期結束後定居情況

根據總務省 2024 年的統計數據（総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自立応援課，2024），約有 65% 的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在任期結束後選擇在他們服務的地區定居。然而，實現長期定居的挑戰仍然存在，尤其是在保障基本生活條件方面。隊員們不僅需要政策支持，還需要在醫療、育兒、教育和護理等領域獲得基礎設施和服務的保障。因此，追蹤他們在任期結束後的定居狀況，像是長達 10 年、20 年甚至 30 年的情況，以確認政策未來持續實施的可行性。

隊員在任期結束後是否能夠繼續定居，收入保障是一個關鍵因素。許多隊

員會選擇留在與行政或公共服務相關的工作中，如擔任聚落支援員或地區專案經理，這些工作可以延續他們在振興活動中的經驗與專業。隨著創業支持政策的增加，選擇創業的隊員數量也有所增長，涵蓋農業、旅遊、工藝品製作等多種行業。這些創業活動不僅促進了隊員的經濟獨立，還為當地帶來新的經濟活力。一些隊員則繼承了當地已經存在的事業，這樣的接班模式有助於穩定社區經濟，並延續地方產業的發展（平井太郎與曾我亨，2018）。此外，有些隊員會採用多元化收入策略來確保生活的穩定（石川和男，2023），隊員會將行政工作、創業和農業等不同的收入來源結合，以確保在地方生活的延續，這樣的多元收入結構不僅提高了隊員的經濟抗壓能力，還讓他們能夠更靈活地應對地方社區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

然而，僅依賴短期的支持政策是不夠的。研究建議（總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自立応援課，2023），政府應該考慮如何更長遠地支持這些隊員的定居，例如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提供創業資金、設立專業培訓課程等。尤其在隊員開始創業或接手當地事業時，如何順利過渡至新的經濟模式是他們面臨的主要挑戰。除了經濟因素，社會融入也是影響隊員定居的重要元素。即使有經濟保障，隊員若未能成功融入當地社區，可能仍會選擇離開。支持政策應考慮如何促進隊員與地方居民之間的社交互動，幫助他們建立長期的社會網路，這將進一步提高他們的歸屬感，並增強他們的定居意願。

以任期結束後定居情況來說，協力隊員定居的成功取決於經濟保障、政策支持及社會融入的多方合作（房安功太郎，2015）。隨著創業機會的增加和社會支持體系的完善，越來越多的隊員將能夠在地方建立穩定的生活，長期的追蹤調查將有助於瞭解這些政策的長期影響，並進一步調整以支持更多隊員在地方長期定居（藤井孝哉，2020）。

四、 制度實施上的面臨的課題及應對策略

地域振興協力隊制度自推行以來，伴隨著吸引青壯年人才與促進地方振興的政策目標，逐步形成了以招募、任期內活動安排、任期結束後定居為主軸的實施流程。然而，該制度在實施過程中，仍面臨一系列挑戰，包括應徵階段的資訊傳遞與動機連結、任期中的溝通協調與支持機制、任期結束後的進路保障

以及外國籍隊員的特殊需求與適應問題。本節將聚焦於這些議題，梳理這些課題的現況。

(一) 應徵時的動機與對赴任地的想像與連結

隊員應徵協力隊的動機通常包括探索自我、體驗鄉村生活、拓展人際關係、及提升技能。然而，若僅將協力隊制度視為提供「自我探索」或暫時的生活體驗的機會，將無法有效連結到促進地方活化的長期政策目標（石川和男，2023）。因此，除了考量個人動機外，政府需強化對隊員在工作和生活兩方面的支持，使其更具持續性。

研究顯示，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尤其是外國籍隊員，在前往任職後往往會面臨對當地生活的想像與現實之間的落差。羅曉勤（2019）指出，這種現象部分源於跨文化適應的挑戰，尤其是在遠離家鄉的陌生環境中服務時，這種挑戰會更加顯著。跨文化適應常受到人際互動和地方文化的影響；對於協力隊隊員而言，這可能表現為與地方居民及政府職員的溝通困難。由於語言、文化及溝通模式的差異，外國籍隊員更容易在適應當地社會和工作環境時遇到阻礙。若這些問題未能解決，將可能削弱隊員的工作表現，並影響其長期定居的意願。

(二) 赴任期間的持續溝通與協調：隊員、地方政府與居民三方的互動

近年來，地域振興協力隊的運作模式逐漸轉變，隊員從單純進駐社區支援轉向被分派到地方政府或公共事業機構，針對特定議題進行「任務型」活動。這類活動具有更強的目標導向，能幫助隊員明確其角色定位，專注於解決地方面臨的具體挑戰，提高工作效率與成效。

然而，隊員的歸屬感和在地參與感對其滿意度也有顯著影響（宍戶容代與三瓶裕美，2019）。因此，研究也建議，除了政府與居民的基礎支持外，引入「中間支援」的第三方協助是一項策略（石川和男，2023）。中間支援機構在隊員、地方政府及社區居民之間充當協調者，不僅能幫助解決工作中的問題，還能促進隊員對工作的認同感和成就感。持續完善地方政府與居民的支持系統，將有助於減少隊員在任期中的挫折感，進一步提升其滿意度和歸屬感。當隊員感受到來自多方的協助與支持時，更容易在工作中找到意義，進而激發長期留

任或定居的意願。這種協調溝通機制不僅促進了隊員的個人成長，也有助於地方的可持續發展。

為應對上述問題，近年來逐漸提出了一個名為「中間支援」的解決方法（柴原良樹，2022）。在過去，總務省自 2016 年 9 月以來已設立「地域振興協力隊支援中心」（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サポートデスク），由協力隊的 OB 或 OG（已完成任期的隊員）擔任諮詢員，統一處理來自任期中的隊員、地方政府人員等的各種諮詢（国立国会図書館，2024）。然而，由於擔任諮詢員的隊員 OB 或 OG 與任期中的隊員活動地點不同，缺乏對該地區文化背景的深入了解，導致在某些情況下難以充分理解諮詢內容。

因此，總務省自 2019 年度起推動以都道府縣為單位構建支援體系，進行了「地域振興協力隊 OB・OG 線上平台合作」，截至 2024 年，受此項支援設立的組織已有 12 個，顯示中間支援體系的建設已取得進展（地域おこし協力隊全国ネットワーク，2024）。柴原良樹（2022）表示如此引入第三方角色，在隊員、地方政府及居民之間可以提供以下幾個方面的協助：

1. 安排人脈拓展活動以及針對地方活動的培訓，以提升隊員的活動能力；
2. 當隊員與地方政府或居民發生問題時，第三方可擔任調解者，協助雙方有效溝通；
3. 為隊員提供來自國家或民間團體的補助制度及資金支持資訊，減輕其工作壓力。

此外，與過去將隊員直接派遣到地方社區進行支援的方式相比，近年來更多隊員被分配到地方政府或公共事業機構，進行針對特定議題的「任務型」活動。這些活動通常是以解決地方具體問題為導向，能調整隊員的角色，使其活動更加明確和目標導向（宍戸容代與三瓶裕美，2019）

進一步來看，增加隊員在當地的歸屬感和參與感，也是提升滿意度的重要因素。中間支援除了提供具體問題的解決途徑，也能讓隊員感受到來自第三方的持續支持，幫助他們在工作中找到更多意義與成就感。隨著地方政府與居民的支持系統逐漸完善，隊員們的體驗和滿意度應該能夠有所提升。

對於長期的發展來說，隊員、地方政府和居民三方之間的持續溝通與協調，是確保地方振興計畫成功的關鍵（国立国会図書館，2024）。中間支援機制的建立，不僅能促進隊員的工作效率，也能提升地方社區的整體凝聚力，使地方活動更加富有成效。

（三） 長期定居的挑戰與支持

由於協力隊的工作具有任期限制，隊員在期滿後常伴隨著希望與不安的情緒。大多數隊員在任期結束後選擇留在當地，持續從事與協力隊時期相似的工作。然而，根據民間機構問卷調查（一般社団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2024），任期內的協力隊員中約 13% 並無定居意向。他們的原因分別是「原本就不打算定居」（24%）、難以在當地找到工作（23%）、以及因家庭原因需要搬遷至其他地區（14%）。儘管如此，有觀點指出，「家庭原因」這一表面上的解釋可能隱藏著「不再想住在這個地方」的情感（宍戸容代與三瓶裕美，2019）。

除了工作內容，協力隊隊員對長期定居的考量也影響其參與動機。根據資料顯示（総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自立応援課，2024a），約 65% 的協力隊隊員選擇在當地定居。然而，要實現長期定居，不僅需要政府在任期結束後提供持續的政策支持，如醫療、教育、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改善，也需強化家庭生活方面的資源。

許多隊員表示，在任期結束後如何確保穩定收入是影響定居的關鍵因素。研究指出，一部分隊員選擇進一步從事公共服務，如轉任地方行政職員或社區專案經理，或依靠創業支援政策進行創業（平井太郎與曾我亨，2018）。對於這些隊員而言，從協力隊的工作無縫過渡至地方產業或創業，是實現長期定居的重要一環。

（四） 外國籍隊員可能面臨的問題

在地域振興協力隊的制度下，外國籍隊員往往面臨一系列挑戰。山本訓弘（2017）指出，外國籍隊員在融入地方社區和政府體系時，面臨三大主要問題。第一，資訊獲取不足與認識度偏低。外國籍隊員在應徵和初期適應階段的資訊需求顯得尤為重要，像是在了解職務內容、地區生活條件和文化差異等方面。

外國籍隊員對協力隊的瞭解往往依賴個人關係或推薦，缺乏正式資訊的透明推廣管道，導致在資訊尋求行為中更傾向於依賴非正式的社交網路，如親友推薦或前隊員的經驗分享。這種行為反映出外國籍隊員在資訊需求未被充分滿足的情況下，傾向於選擇熟悉且信任的渠道來獲取資訊。為此，建立穩定的資訊共享機制，像是強化前任與現任隊員間的聯繫，不僅能滿足他們的資訊需求，還能促進更有效的資訊行為，對新任外國籍隊員的適應相當重要。

第二，職場適應與心理健康的挑戰。即使是日本籍隊員也可能因遭遇職場霸凌或溝通困難而中途退任。例如，南伊勢町曾報導日籍隊員因職場霸凌問題退任的事件，突顯出隊員在工作場所的適應挑戰（山本訓弘，2017）。這顯示外國籍隊員面臨的問題可能更為嚴峻，需要行政人員在僱用過程中提供更多支持，以減少中途退任的風險。

第三，地方觀光效益的未評估。許多地方政府為推廣觀光及文化交流而引入外國籍隊員。然而，目前缺乏對這些隊員在觀光推廣及地方文化影響上的評估，導致資源的運用效果不明（二階堂裕子，2022；山脇啓造，2019）。若沒有清晰的成效評估，地方政府的觀光推廣策略可能會流於形式，無法達成長期的政策目標。

本研究聚焦於外國籍隊員的資訊尋求歷程，關注其在任職前所蒐集之資訊內容、資訊來源對象與尋求過程中的情感變化，並進一步分析在資訊決策歷程中扮演關鍵影響角色的人物與事件。第二節將回顧資訊行為相關理論作為分析架構，並整理過往針對具海外工作經驗之青壯年族群的資訊行為研究成果，以協助理解外國籍隊員在應徵、赴任及任職期間的資訊行為樣貌。

第二節 資訊行為與青壯年赴外工作

資訊 (information) 是資訊行為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廣義上指人們與周圍環境互動中所留下的印象或知識改變。Bates (2010) 形容人們的日常生活情境中總是在「尋找紅線資訊」(the red thread of information in the social texture of people's lives)，強調資訊與生活的緊密聯繫；也有些學者認為，資訊需求是由不確定感所引發的，Belkin (1980) 提出的「知識渾沌狀態」(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 描述了當使用者意識到知識不足或不確定時，無法具體表達需求

的情況，這種狀態通常觸發資訊搜尋行為，目的是縮小知識的缺口。同樣地，Dervin (1992) 的「意義建構理論」(Sense-Making)，強調人們如何理解他們的資訊需求以及他們為了解決這些需求所經歷的過程。Dervin 指出，人們的資訊需求源自於感知到的落差 (gap)，當現有知識無法應對問題時，人們會試圖填補這一落差以解決情境問題。這種需求觸發了資訊行為，從「狀況—差距—使用/幫助」的模式出發，解釋了為何人們會尋求資訊。

研究人們在獲取資訊時偏好的使用途徑或新技術，此行為的研究也會隨著領域不同而有不同的重點。傳播學領域關注資訊傳播的過程及其對人的影響，而圖書資訊學則側重於資訊傳遞的服務，專注於如何提升資訊傳播的效率與效能。林珊如、許禎芸 (2008) 指出，資訊行為研究已逐步深入探討特定群體或具有特殊身份者在工作任務導向的情境中，特別是在專業職場與學術環境中，例如，圖書館、學術機構或專業組織的資訊行為分析。研究也關注到，為了完成特定目標，如何將資訊視為促進工作成功的關鍵資源，進而展開一系列的資訊行為來滿足需求。林珊如 (2021) 將資訊行為理論模式進行分類，提出情境 (context) 和研究實體 (entity) 架構，將資訊行為理論分為七種類型：通則性理論、工作/任務相關理論、日常生活相關理論、歷程性相關理論、認知心理相關理論、社會網路相關理論及系統使用相關理論。在探討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的資訊行為時，關注於日常生活資訊尋求理論有助於理解隊員的生活方式，不僅包含工作相關的資訊行為，還包括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資訊需求。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是探索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如何尋找、評估、選擇資訊來源。因此，本節以資訊需求概念與相關資訊行為理論模型為基礎，探討概念相關的臺灣人赴日打工度假的資訊行為，點出與臺灣籍隊員在日本擔任地域振興協力隊相似的資訊行為。

一、 資訊尋求行為相關理論

當人們意識到自己無法解決問題時，便會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途徑尋找資訊，直到需求被滿足或放棄。資訊尋求行為包括了從資源蒐集到策略使用的整個過程 (Krikelas, 1983; Wilson, 1999; 賴鼎銘等人, 2001)。

本研究為完整研究青壯年的資訊搜尋行為，參考資訊行為相關教科書

(Case 與 Given, 2016)，回顧 Kuhlthau、Wilson 資訊尋求歷程的相關理論以應用在青壯年搜尋協力隊工作從申請到前往任職中的動應歷程與行為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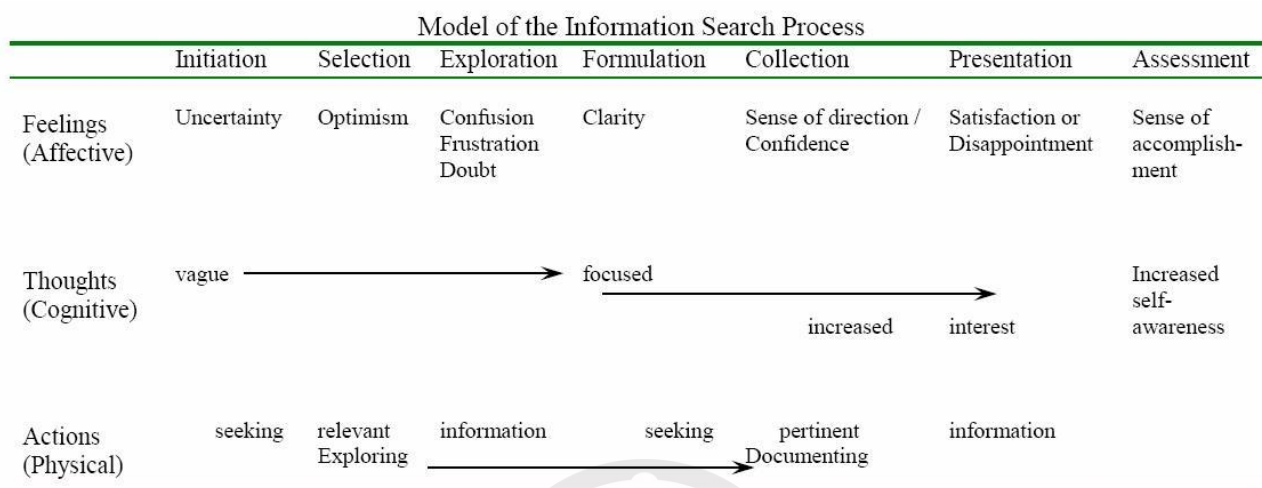
1. Kuhlthau 的資訊搜尋歷程模型

Kuhlthau (1991) 發展資訊搜尋歷程模型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ISP)，係以圖書館場域中的學生為對象，結合圖書館利用教學、行為觀察、自我感受記錄、問卷調查與訪談等多元方法，系統性蒐集其資訊探索過程中的經驗與行為樣態，進而歸納出資訊搜尋的階段性特徵與心理歷程。ISP 模型以 (Belkin, 1980; Kelly, 1963; Taylor, 1986) 為理論基礎，用來描述學生讀者在進行資訊搜尋時，認知、情感和行為的變化過程，此模型有六個主要階段，見圖 2-4，包含：開始、選擇、探索、形成、收集和完成。

- (1) 開始 (Initiation)：在這個階段，使用者意識到需要解決某個問題或尋找特定資訊，但尚未明確其資訊需求。此時，常會感到不確定和焦慮，因為問題的範圍和重點仍不清晰。
- (2) 選擇 (Selection)：使用者開始界定和選擇問題的主題或焦點，並確定搜尋的方向。選擇階段常伴隨著決策壓力，選擇過程結束後，焦慮通常減少，研究者開始對主題有更清晰的理解。
- (3) 探索 (Exploration)：這是搜尋過程中最具挑戰的階段。使用者深入探索各種相關資料，但此時資訊往往紛雜且矛盾，容易引發更大的混亂和不安。這個階段需要耐心與持續努力，才能逐步聚焦出核心問題。
- (4) 形成 (Formulation)：在經過探索階段後，使用者開始整理和統整所獲得的資訊，逐漸形成明確的研究方向或假設。這個階段標誌著資訊需求的具體化，研究者的信心也逐步提升。
- (5) 收集 (Collection)：使用者針對明確的問題或主題進行目標明確的資訊蒐集，專注於取得能夠支持其研究方向的資料。隨著有用資訊的累積，研究者的信心和滿足感進一步增強。

(6) 呈現 (Presentation)：在這個階段，使用者整理所有已獲得的資料，完成研究報告或計畫撰寫。發表階段通常伴隨著釋放和成就感，因為問題已得到解決或論點已充分支持。

圖 2-4
Kuhlthau 資訊搜尋歷程



註:引自 Kuhlthau (1991) . Inside the search process: Information seeking from the user'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42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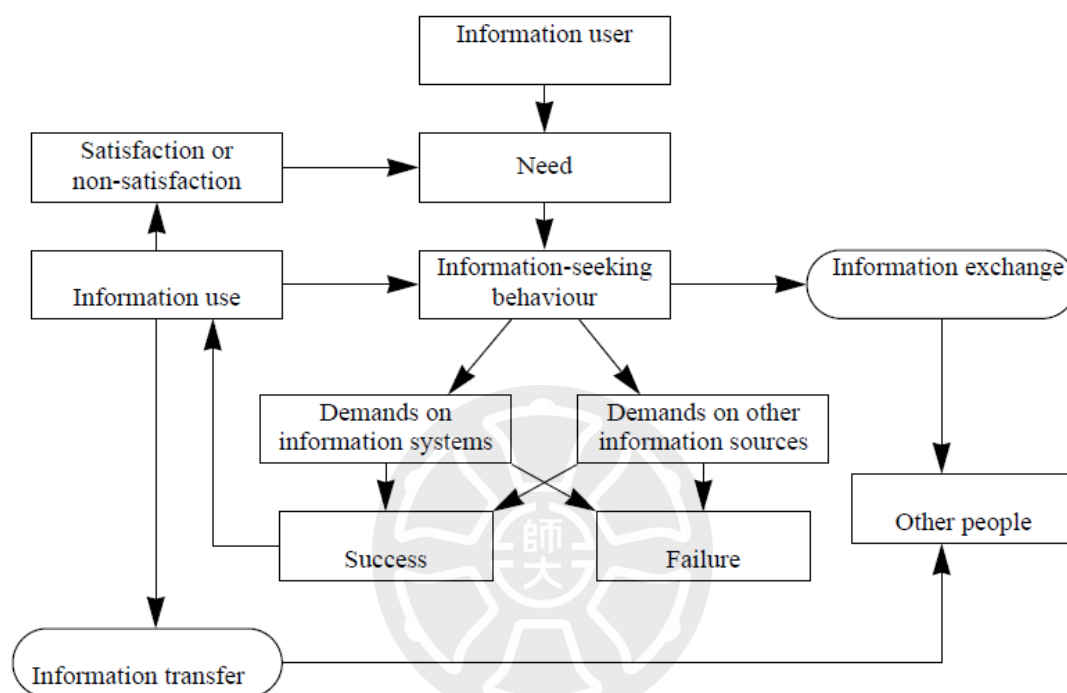
本研究認為若此模型用來分析青壯年在應徵前和任職過程中的資訊行為，ISP 模型則會強調資訊搜尋的階段，並探討個人在搜尋過程中情感、認知與行為的變化。其六個階段——開始、選擇、探索、形成、收集和呈現——反映了資訊需求隨著情感和認知狀態的變化而逐步發展。每個階段伴隨著不同的情感反應、認知挑戰和行為轉變，這有助於理解青壯年在得知地域振興協力隊相關資訊、應對挑戰時的內在歷程與行為變化。

2. Wilson 的資訊尋求行為模型

另外，Wilson 除了界定了上述與資訊使用相關的名詞定義，針對資訊行為則分別於 1981 年、1996 年、1999 年提出不同版本的資訊行為模式。其中，1999 年所提出最新的修正模式顯示（見圖 2-5），資訊行為的產生主要是因為資訊需求者察覺到自身需求，進一步採取行動以搜尋可用的資訊。如果成功搜尋到符合需求的資訊，個人就會開始利用所找到的資訊來滿足自己部分或者全部的需求，如果無法滿足自己的資訊需求，則會繼續不斷的重複搜索資訊的過程，

直到獲得可利用的資訊為止。此外資訊尋求行為可能透過資訊的交換與其他人有所互動，即自身的資訊需求在需求被滿足之後，需求者也可能成為資訊的提供者，將自己認為有用的資訊分享給其他人，可能因此而滿足其他人的資訊需求（Wilson, 1999）。

圖 2-5
Wilson 資訊尋求行為模型(1999)



註:引自 T. D. Wilson (1999) . Models in inform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55(3), p.251

綜合上述資訊需求與行為的回顧，本研究將參考 Kuhlthau (1991) 的資訊搜尋歷程模型與 Wilson (1999) 的資訊行為模型，作為理論基礎來分析青壯年在加入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不同階段中的資訊行為。本研究參照該模型來觀察臺灣籍隊員在探索與形成資訊需求階段的心理歷程，像是在面對資訊不確定時的反應，以及如何逐步聚焦需求並轉化為具體行動。上述理論的整合，為本研究提供穩固的理論基礎，幫助分析臺灣籍隊員在不同階段中資訊行為的演變與影響因素。回顧上述理論有助揭示資訊需求、搜尋與使用，也有助深入理解青壯年在跨文化工作環境中，如何通過資訊行為建立與當地社區和職場的連結，並進一步探索資訊行為對於其個人成長與職涯發展的影響。

二、 赴海外留學與求職之資訊行為研究

為探討青壯年赴海外參與地方創生活動之資訊行為，本研究回顧了涵蓋海外工作、留學、打工度假與地方適應等主題的相關研究，以理解其資訊需求、尋求歷程與影響因素。

(一) 移民或赴海外工作者求職

在新移民或赴海外工作者的就業情境中，相關研究指出，當他們面對陌生的語言環境、制度體系與文化脈絡時，其資訊尋求行為往往展現出依賴性、選擇性與適應性的特質。Shuva (2021) 以加拿大的新移民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就業過程中的資訊行為，並以 Savolainen (1995) 的日常生活資訊尋求模型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ELIS) 作為分析架構，揭示資訊行為如何根植於個人的生活脈絡之中。研究發現，受訪者在尋求工作相關資訊時，會同時倚賴正式資訊來源，例如職業介紹中心、政府網站與社福機構，以及非正式的社會網路，如朋友、家人與前同事等。這些非正式來源在資訊傳遞之外，也提供了情緒支持與文化過渡的協助。儘管許多移民知道正式資訊來源的存在，但由於語言能力不足、制度複雜或難以理解，他們更傾向依賴熟悉且語境相近的社群資源。該研究亦指出，移民在資訊取得過程中常經歷資訊過濾與誤讀的情形，而資訊行為的展現，受到語言能力、社會資本、文化背景、自我效能等因素的交織影響。

Cho (2014) 則進一步指出，在多國籍企業的跨文化職場中，資訊尋求行為並非僅受到資訊尋求者自身文化背景的影響，也受到其對資訊提供者文化背景的感知所左右。該研究針對美國員工在韓國跨國企業美國分公司的資訊尋求行為進行分析，發現員工傾向根據對主管文化背景（如權力距離與不確定性迴避）的感知來調整其資訊尋求策略。特別是當資訊提供者被視為具高權力距離時，受訪者更可能避免直接詢問，而採取觀察等間接方式。研究亦指出，美國員工面對韓籍主管時，因預期可能有較高的社會成本（如損失面子或遭拒絕），往往降低資訊尋求頻率。換言之，資訊行為受到跨文化互動中「權力距離」與「文化理解落差」的影響，而這些認知亦會影響員工的溝通滿意度與資訊獲得品質。

以上兩項研究分別從求職初期與跨文化職場互動的角度，描繪出跨國移動者在資訊行為中面臨的具體挑戰。其資訊獲取歷程並非單向且理性的操作，而是一種受語言、文化與社會條件交織影響的實踐。當面臨跨文化與制度轉換的情境時，資訊來源的可理解性、可親近性與文化相容性，往往比資訊的「正統性」更為重要，反映出資訊行為與個體適應歷程之間的密切關係。移民在求職與職場適應中所展現的資訊行為，不僅體現出對社會網路與語境熟悉度的依賴，也揭示了資訊尋求背後潛在的權力動態與文化調適歷程。類似的挑戰亦出現在其他跨文化脈絡中，下一節將說明國際學生在留學初期的資訊尋求過程。

(二) 留學

在探討青壯年赴海外留學的資訊行為時，許多研究揭示國際學生在學術、生活與文化適應層面皆面臨多元且複雜的資訊需求。Singh 等人（2015）以德里大學的外國學生為對象，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學生在尋求課業資料、住宿安排與日常生活資訊時，主要依賴 Google 等搜尋引擎，亦會參考圖書館資源與親友協助。然而，即便處於資訊資源充足的環境，語言障礙、檢索能力不足與時間壓力等因素，仍顯著影響資訊取得效率，顯示「資訊可得性」與「資訊可用性」之間存在明顯落差。

Sin 與 Kim（2013）進一步指出，社群媒體，特別是 Facebook，在國際學生的日常生活資訊尋求中扮演關鍵工具。學生經常透過社群媒體平台獲取財務、健康、住房與娛樂等實用資訊，且研究顯示資訊效用與社群媒體使用頻率之間具顯著關聯。個人特質的外向度亦被發現與社群媒體參與度呈正相關，反映資訊行為也受人格特質所驅動。此研究呼應日常生活資訊尋求模型（Savolainen，1995）對於生活脈絡與個人因素交互作用的強調，展現其對國際學生資訊行為分析的解釋力。

除了資訊使用階段之外，有些研究進一步探討資訊行為在留學動機與決策歷程中的角色與影響。Goel 等人（2010）雖非典型的資訊行為研究，但其以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與人格理論（Trait theory）為基礎，探討學生的留學動機與行動意圖，間接呈現學生如何在決策過程中評估資訊、衡量可行性與接收來自親友的觀點。這些行為構成一種整合價值判斷與

社會參照的資訊評估機制，也凸顯資訊行為在跨學科研究中的潛在延續。

在探索國際學生初期適應過程中，Hertzum 與 Hyldegård (2019) 運用日常生活資訊尋求模型 (Savolainen, 1995) 模型與資訊互動理論，訪談四位國際學生在抵達異地後十週內的資訊歷程。研究指出，受訪者面對學業與生活的雙重壓力，採用搜尋網路、請教他人、模仿觀察與偶然發現等多元策略以回應知識落差與文化不熟悉感。資訊尋求與心理壓力之間呈現密切關聯，資訊行為不僅影響學生的文化適應程度，也關乎其主觀幸福感與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Oh 等人 (2014) 則結合訪談、問卷與認知地圖 (Cognitive mapping) 等方法，調查二十位初至美國定居的國際研究生在適應階段的資訊行為。研究顯示，學生初期以「生存需求」為主導，例如住宿、交通、購物與學校相關位置等，並運用行動地圖、搜尋引擎、同鄉社群與偶發資訊等混合策略。隨著時間推進，資訊需求逐漸轉向休閒活動與文化探索，呈現動態演化過程。此外，該研究亦指出，學生的國籍與性別會影響其資訊來源選擇與互動方式，顯示文化背景與地理環境為資訊行為的重要調節變項。

在臺灣，陳世娟與鄭宜青 (2022) 針對大學生申請交換學生計畫的資訊行為進行研究，明確呈現資訊行為隨申請階段演進的特徵。學生在準備初期專注於備審資料、姊妹校資訊與語言檢定，而在行前階段則拓展至課程內容、住宿、交通、簽證、保險與當地文化等實用議題。網路資源為主要搜尋工具，輔以社群平台 (如 Dcard、PTT、Facebook 社團)、影音網站與人際網路 (如學長姐與校方承辦人員) 提供關鍵補充資訊。該研究亦強調資訊來源的可信度評估在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學生對於經驗分享的信任高於對官方資訊的依賴。理論方面，結合 Ellis 的資訊尋求行為模型與 Kuhlthau 的資訊搜尋歷程模型 (Kuhlthau, 1991)，強調資訊行為為一歷時性、動態的、與認知—情緒變化交織的過程。

綜觀而言，現有關於國際學生資訊行為的研究呈現出多樣化且具有層次，涵蓋從出發前的資訊評估、抵達後的生活適應，到文化融入與自我定位的多階段歷程。學生的資訊需求不僅限於學術與生活層面，還包含情感支持與身份認同等隱性層面。其資訊尋求行為往往結合主動探索與被動接收，並交織使用正式資源 (如官方網站、圖書館) 與非正式網路 (如同儕、社群媒體)。此外，

研究顯示個人特質，如外向、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文化資本與語言能力，以及制度與地理環境，皆會影響其資訊行為的策略選擇與行動結果。這些研究不僅深化了對國際學生資訊行為動態與適應機制的理解，也為探討資訊行為與跨文化經驗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多元的理論視角與實證基礎。

（三）打工度假

打工度假作為一種兼具工作與旅行性質的海外經驗，參與者在跨文化環境中展現出多元的資訊行為與適應特徵。張峻誌（2015）指出，語言是打工度假者初抵日本時所面臨的首要挑戰，然而多數人在短期內能逐漸克服語言障礙，真正帶來長期壓力的反而是人際互動，尤其是在與日本同事及朋友建立關係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文化隔閡與溝通難題。羅曉勤（2019）對日語系畢業生的研究亦顯示，即使具備語言能力，青壯年在適應日本職場文化時仍遭遇困難，特別是在理解公司流程與職場規則方面。這些發現顯示，語言只是跨文化適應的起點，更深層的挑戰來自對當地文化與社會互動模式的掌握。

徐孟鈴與張承暄（2021）發現，具備正向人格特質與積極處事態度的打工度假者，往往能調適壓力、快速融入新環境，並於工作中展現良好表現。該研究強調，跨文化適應是一個持續學習與調整的動態過程，實際遭遇的挑戰往往比預期更為多樣與複雜。與此同時，參與動機亦影響個體的適應傾向。歐陽宇（2024）指出，體驗異國生活、文化學習與語言能力提升是打工度假者的主要驅動力，多數返國者認為此段經歷對其職涯發展具有實質助益，像是在增進職場抗壓度、語言能力與獨立方面。在資訊行為方面，賴佳柔（2017）則發現，打工度假者的資訊需求主要集中於求職、旅遊與語言學習等領域，並普遍傾向依賴非正式資訊來源，如社交媒體、朋友介紹與網路社群等。隨著在地生活逐步展開，其資訊需求呈現動態變化，生活與工作的適應程度也會直接影響其資訊搜尋策略。研究進一步指出，參與者主要透過搜尋引擎與社群媒體等線上資源建立人際網路，以獲取即時且具實用的資訊；同時，與當地居民或其他打工度假者的面對面互動，則在工作、交通與旅遊等面向的資訊獲取上發揮補充作用，展現出具有彈性與多元並行的資訊行為模式。

上述研究大致描繪出打工度假參與者在資訊需求、策略選擇與文化適應上

的動態變化。為進一步理解這些行為背後的理論脈絡，亦有學者採用日常生活資訊尋求模型進行延伸探討。Naveed 等人（2021）透過 Savolainen（1995）的日常生活資訊尋求理論（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ELIS），探討學生在生活中的資訊來源與偏好。研究指出，學生在求職等實務問題上，主要依賴非正式社交網路，如同學、宿舍夥伴與朋友，這些社會資源提供相對可靠的建議。同時，雖然網路資源亦被廣泛使用，受訪者對其資訊品質與更新頻率存在疑慮，顯示資訊評估能力與來源信任感是影響資訊搜尋行為的重要因素。

綜合上述研究可見，打工度假者的資訊行為與跨文化適應歷程具有動態性與仰賴情境。語言能力固然是初期的重要挑戰，但有深層的壓力往往來自對當地職場文化與人際互動規範的理解與調適。在面對不確定與變動的生活情境時，參與者普遍展現出靈活運用資訊資源的傾向，並在正式與非正式、線上與線下資訊來源之間進行策略的選擇。社會支持系統在人際互動與情緒調適上提供重要支撐，尤其在人力資源有限與制度熟悉度不足的情況下，非正式網路更成為關鍵資源。此一過程亦顯示，個人特質如正向的態度，將強化資訊評估與應變能力，有助於參與者持續修正其資訊行為與適應策略。可見打工度假不僅是工作與旅行的結合，更是一場橫跨文化適應、制度與生活領域的複合型學習實踐，而資訊行為則在其中發揮連結個人與外部環境的橋樑作用，協助參與者因應挑戰、調整策略，並逐步實現自我適應與成長。

回顧赴海外留學與求職之資訊行為相關研究，無論是赴海外就業、留學或打工度假，青壯年在異地生活中所展現的資訊行為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著所處的情境變化，以及時間與經驗的累積而改變。資訊來源的選擇往往受限於語言能力、文化熟悉度與社會網路的可及性，而非僅取決於正式管道的來源。這些研究不僅揭示資訊行為與跨文化適應之間的密切關聯，也為後續探討臺灣青壯年參與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的資訊歷程提供了實證與理論的參照依據。

第三節 資訊世界圖研究法

資訊世界圖（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IWM）是一種基於藝術性質的參與式質性研究方法，用於讓受訪者能夠更豐富地敘述日常生活中的資訊實踐（information practice），並幫助研究者進行檢證影響人們日常資訊行為或是資

訊實踐的情境因素。受訪者透過繪製其資訊世界，呈現與其情境相關的資訊來源、人、事物及場所（Jaeger 與 Burnett, 2010）。此方法不僅豐富了傳統訪談法所蒐集的資料，還有助於研究者挖掘訪談過程中可能被忽略或未能顯現的資訊（Greyson 等人, 2017b）。資訊世界地圖的優點包括使用便利性與靈活性，且已被廣泛應用於國際上多元領域的研究，如公共衛生、教育、人口老化研究及資訊科學。

本節回顧資訊世界圖研究法之理論基礎、發展脈絡與此研究法的操作方式，最後提及應用於各領域的相關研究。

一、 理論基礎與發展背景

資訊世界圖緣起自 Greyson（2013, 2015）為探索資訊行為而發展出的參與式視覺引談法，最早在其博士論文研究中運用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針對 15 至 24 歲的年輕父母進行調查。Greyson 希望在常見的訪談技術的基礎上，加入藝術相關的方法來探討年輕父母的資訊實踐，期使其方法適用於不同年齡、心智成熟度、讀寫能力及英語流利程度的參與者，給予受訪者有部分受訪內容控制權，且具有研究者便於攜帶、操作的低技術門檻。

資訊世界圖根源於多個已建立的理論與研究方法。理論上，Greyson 等人（2017b）研究提及，為了使資訊活動發生不僅於實體空間上，也延伸至資訊行為中四項「地域空間概念」（conceptual geographies）理論要素，用來描繪資訊實踐中的多元場景和人際關係（Chatman, 1999; Jaeger, & Burnett, 2010; Nardi, & O'Day, 1999; Pettigrew, 1999; Sonnenwald, & Wildemuth, 2001）：

1. 資訊場域（information grounds）（Pettigrew, 1999）：將資訊行為與實體場域結合，主張資訊交流往往在特定的社交場所中自然發生。這些實體場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促進資訊互動的環境，無論是有意或無意，人們會在這些社交氛圍中分享和獲取資訊。
2. 資訊視域（information horizons）：資訊視域圖法是 Sonnenwald, & Wildemuth（2001）在訪談研究中發展出來的工具，讓參與者不僅以口頭描述自身的資訊行為，還能藉由繪圖或文字的方式來具體呈現資訊來源和尋求

路徑。此「視域圖工具」，讓參與者在訪談過程中繪製其常用的資訊來源圖，說明每一來源的角色與功能，進一步展示資訊尋求的路徑和偏好。這種關係圖示化的訪談方法，能更揭示資訊來源與使用模式之間的互動，有助於捕捉資訊來源之間的相互關聯與動態互動，從而揭示個人的資訊世界如何運作且理解個人如何在動態社會環境中管理資訊需求。資訊視域的出現使資訊尋求行為具有社會性和合作性，且依賴情境因素。資訊視域不僅適用於日常生活中的資訊行為研究，也廣泛應用於教育、圖書館與專業工作者的資訊尋求行為分析。在不同的情境下，個體根據需求會選擇多樣的資訊來源，如朋友同事、網站與媒體、書籍與圖書館員與專家等，這些來源共同構成資訊視域。

3. 資訊生態系 (information ecologies) (Nardi, O'Day, 1999)：使用生態學作為比喻，將資訊行為視為由人、價值、技術和實踐構成的系統。該理論強調系統中的元素之間共生互動的重要，如人們如何在圖書館等場所中整合科技與資訊服務，形成資訊共享的生態環境。
4. 資訊世界 (information worlds)：探討資訊如何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流動與交換，並揭示資訊在個人與社群生活中的不同角色。從 Elfreda Chatman 的「小世界」(Small Worlds) 微觀視野中發展，強調特定群體內部的社會常規和資訊交換模式，指出個體在各自的小世界中會遵循群體的規範與期望 (Chatman, 1999)。這些小世界包括家庭、工作和朋友等不同社交圈，而成員在穿梭於不同小世界時，會根據各自的社會規範來篩選與分享資訊。資訊因此不僅是個人需求的產物，更是群體行為和社會規範的結果。Jaeger, Burnett (2010) 進一步發展了資訊世界理論，將微觀的社會互動與宏觀的公共領域聯繫起來。他們強調，資訊行為受到五個核心元素的影響：社會常規、社會型態、資訊價值、資訊行為，以及資訊交換的邊界。這些元素相互影響，並塑造了人們如何在社會中感知、傳播和使用資訊。故資訊世界則從社會規範與文化價值的角度切入，強調資訊行為不僅受個人需求驅動，也受限於群體間的社會規範與期望。

同一研究中 (Greyson 等人, 2017b)，Greyson 在研究方法為了捕捉日常生活中資訊的形態與意義，需要使用如繪圖、攝影和關係圖之視覺方法的精髓，

探索了以視覺化方法輔助訪談過程的影像發聲法（photovoice）與關係圖法（relational mapping）。其中，影像發聲法是透過由研究對象產製照片或影片等方式，理解其眼中的世界樣貌；關係圖法也是透過圖像繪製蒐集資料，但主要關注人與人的關係及辨識社會世界中的重要人物。Greyson 整合上述四項資訊場域、資訊視域、資訊生態和資訊世界的概念，還擴展了資訊行為的範疇，從單純的資訊尋求拓展到涵蓋資訊分享與交換的實踐。這些要素的結合，不僅描繪了人與資訊的互動模式，還體現了資資訊行為中的情感、社會規範及互動。

Greyson 參考 Charmaz（2015）所提出的建構主義扎根理論（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主張研究者在資料分析中可納入自身的知識背景與主觀理解，視扎根理論為一種具彈性的研究工具。透過將蒐集到的資料與研究者的實務經驗進行對話，不僅擴展了原先源自社會學的扎根理論在其他領域的應用性，也強調「親身參與」的知識建構歷程，使研究更貼近複雜且具脈絡性的現實情境。這種主張「實踐中學習」的資訊實踐（information practice）強調資訊行為是一個受社會與文化因素形塑的過程，參與者的行動反映其特定情境中的需求和價值觀（Savolainen, 2007a, 2007b）。資訊世界圖透過鼓勵參與者親自繪製與資訊相關的圖像，使其具備豐富的表達力及探索度。由此可見，資訊世界圖法以資訊視域為核心，結合多重理論要素，為研究者提供了深入剖析資訊行為的工具，下表 2-1 為三項理論比較之表。

表 2-1

資訊視域、資訊世界與資訊世界圖三項理論之比較

	資訊視域 (Information Horizons)	資訊世界 (Information Worlds)	資訊世界圖 (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IWM)
提出者	Sonnenwald (1999)	Jaeger, Burnett (2010)	Greyson (2013)
核心概念	個人根據具體情境選擇和使用多樣資訊來源，這些來源構成了其「資訊視域」。視域隨需求變化而動態調整。	不同社群或群體內部的資訊規範、價值觀和文化，影響資訊的流動、使用與共享。強調群體之間的資訊隔離與連結。	參與式視覺化工具，透過地圖呈現資訊來源、使用方式和社交互動，揭示日常資訊實踐的細節。
研究焦點	研究個人如何動態選擇資訊來源，根據需求、可得性和信任程度建立其資訊搜尋策略。	探討資訊如何在社會群體內外流動，以及如何受社會規範、價值觀影響。分析資訊隔離與互動。	呈現資訊如何在特定社會與物質脈絡中使用和流動，強調資訊實踐與社會互動的情境化。
理論背景	受認知行為理論影響，強調情境脈絡對資訊來源選擇的影響。	Chatman 的「小世界理論」的延伸，並結合社會規範理論。	建構於藝術參與式方法上，並融合資訊行為理論與視覺化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強調個人在特定情境中的資訊行為，如決策過程中的資訊來源選擇。	適用於社群與封閉小世界的資訊行為，如邊緣群體或地方社區中的資訊交流。	適用於需要詳細探索日常資訊實踐與社交互動的情境，如健康、教育。
資訊來源	強調個人如何根據需求調整多元資訊來源，例如官方管道、網路或人際網路。	正式與非正式資訊，依群體規範決定資訊流動的方向和限制。	可視化資訊的正式與非正式來源，同時分析其在特定情境中的影響。

資訊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資訊世界圖法之實務操作與資料分析

Greyson 等人 (2017b) 在文章中詳細說明了資訊世界圖法在針對 15 至 24 歲年輕父母的縱向研究中的應用。以下為實施的步驟：

- (一) 簡介與準備：資訊世界圖嵌入於 90 分鐘的半結構式訪談中段，訪談涵蓋住房、教育、職業規劃、育兒、托兒及健康等主題。在訪談開始時，研究者會先向參與者介紹資訊世界圖方法，說明其目的是幫助參與者視覺化並分享與他們資訊世界相關的經驗。隨後邀請受訪者先將自身位置標示於圖上，研究者會強調繪圖活動沒有「正確或錯誤的方式」，參與者可隨意表

達，並建議受訪者使用符號、簡單圖案或文字來代表資訊尋求、資訊分享以及意義建構過程中涉及的「人、地點和事物」。此整合方式讓參與者能在繪圖前反思他們的社會資訊世界及健康資訊實踐。

- (二) 繪製工具的提供：繪圖時間約 15 分鐘。參與者將獲得 A4 空白紙張和彩色筆等繪畫工具，讓他們可以靈活選擇使用顏色或符號進行表達。材料的多樣有助於參與者根據自身偏好選擇最適合的表達方式。
- (三) 繪圖中的提示：邀請參與者開始繪製他們的健康資訊世界，過程中可選擇安靜完成或邊畫邊說出想法。研究者可在參與者需要時給予提示，例如：「回憶一下您曾經需要找健康資料時的經歷」，或「您依賴哪些人或資源獲得資訊？」這些提示能幫助參與者清楚地描繪其資訊行為。
- (四) 追問與釐清：繪圖完過程中或是完成後，研究者會對圖中於訪談時沒有挖掘到的內容進一步追問，深度探索參與者在資訊世界中的具體經歷，瞭解他們在尋求和使用資訊時的情境與動機。例如，詢問「圖中的這個符號或文字代表什麼？」或「您為什麼會選擇這些特定的資訊來源？」
- (五) 資料收集與分析：研究者將參與者對繪製資訊世界圖的過程口頭描述進行錄音，並轉錄為文字資料，以進行後續的質性內容分析。資訊世界圖所產生的資料可與問卷或訪談紀錄進行三角驗證 (triangulation)，亦即針對同一研究現象採用多種資料來源進行交叉比對，從不同角度理解事件的全貌，進而提升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Greyson 等人, 2017a)。
- (六) 持續反思與調整：根據參與者的文化背景、表達偏好及舒適程度，研究者應保持彈性，適時調整方法。例如，在面對低讀寫能力或對繪圖不熟悉的群體時，將繪圖活動設為選擇性並提供範例，以減少參與者的焦慮感。此外，研究者自身的訓練也至關重要，應熟悉資訊世界圖的概念並進行充分的實操練習，以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Greyson 在文末也提出資訊世界圖法具有一些顯著的優勢與劣勢。下列分析出四項優勢：

- (一) 低門檻與靈活性：其執行過程提供了不依賴電子設備的藝術性工具，可以

輕鬆融入傳統的訪談中，讓參與者使用紙張和彩繪畫筆創作視覺化資料，繪製的圖像也能簡易轉為數位格式進行保存，便於後續分析。對於在長時間的訪談中，能夠在訪談與繪圖活動的相互切換能舒緩受訪者的壓力，使研究對象在參與過程中保持投入，減少疲勞感。

- (二) 可靠的交叉檢證：讓研究法能夠在單次訪談中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有彈性地調整訪談內容，讓研究者從多個角度探索資訊行為。
- (三) 從旁觀察參與者行為：研究者透過參與者的繪圖過程瞭解他們的資訊行為，例如：他們是否快速確定資訊來源、對文字熟練程度等。這種自由表達的方式可以揭示參與者的潛在資訊行為，補充訪談的文字數據，並提供記憶輔助。
- (四) 促進參與者的自主詮釋：強調讓參與者親自定義並解釋他們的資訊世界，透過支持參與者理解和闡釋自己的資訊世界，研究者能重新檢視資訊行為模型，反思既有的分類方式與假設。上述優勢可以看出，資訊世界圖法以「資訊視域」為基礎上延伸，其在訪談中使用類似的步驟來產生繪圖，但具有更廣泛的應用範圍和更加以參與者為中心的導向。同時也作為「影像發聲法」的延伸，提供邊緣化群體一個自我定義「資訊世界」的低門檻工具，適用於無法穩定使用攝影設備、不願參與後續數據解釋的群體。

然而，資訊世界圖法在應用上也有需要克服的挑戰，包含：

- (一) 時間需求：繪圖完成至少需10至15分鐘，可能因時間有限或需照顧幼兒的參與者而言難以進行。此外，部分參與者對繪圖活動可能有抗拒，研究者需強調活動不需藝術技能，並給予各種表達方式的選擇。
- (二) 繪圖提供的資訊量不多：當某些參與者的地圖顯得過於簡單時，研究者需探究是因為其資訊世界簡單，還是因為參與者在表達上感到不適。若是後者，研究者可能需要通過進一步的訪談來補充資料。
- (三) 研究者的訓練：成功實施資訊世界圖法需要對研究者進行充分的練習，尤其理解抽象的資訊世界概念。建議研究者在實地研究前，先試圖自己繪製地圖，並進行測試。

(四) 給予預料之外的繪圖方向：在少數訪談中，可能導致意料之外的結果。例如，有參與者 Lila 繪製了一幅田園風景，並未直接關聯資訊行為。事後分析發現，Lilah 以田園景象表達對「自然生活」的信仰，並對醫療和大眾媒體資訊的不滿。這種意外發現既是資訊世界圖法的優勢，也可能限制其在某些分析方法中的應用。

在後繼的文獻中，Greyson 等人（2019）為了評估視覺數據資料分析的適用性，以及特定方法是否符合資訊世界圖法的目標，Greyson 測試了四種不同的分析方法：質性內容分析、構圖釋義、概念分析和情境分析。

(一) 質性內容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研究者從研究問題出發，建立並測試一套編碼框架，進而對視覺或口頭資料進行客觀解讀。透過內容編碼，反覆修正以形成新的編碼架構，進而識別出資料中的主題與模式。

(二) 構圖解釋（Compositional Interpretation）：類似由上而下的編碼方法。它強調從視覺作品的結構出發，解釋其中的元素（如框架、排序、結構和形狀）。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依據既有的理論或框架來指導對視覺元素的解讀，而不是只依靠直接的歸納或觀察。因此，這是一種基於已有知識或理論框架進行的詮釋過程。

(三) 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也類似由上而下的編碼方法。儘管它在某些方面類似於歸納法，但其是基於現有的理論框架或學術文獻來解釋和分析資料。具體而言，概念分析著重於檢視參與者的資訊世界圖是否符合資訊行為理論模型，並強化研究框架，而非從資料中完全歸納出新的見解。因此，研究者會先有一個理論性框架，然後根據該框架對資料進行分類、重組和命名。

(四) 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是由下而上的編碼方法，是最耗時的，這是因為情境分析強調從資料本身出發，深入探討參與者資訊世界中各元素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元素如何嵌入特定的社會脈絡中。研究者不會從預設的框架或理論出發，而是基於資料進行探索，通過細緻的分析來理解複雜的情境，並揭示其中的社會聯繫。因此，情境分析注重從資料中挖掘並建立新的理解和關聯，而不是直接應用已有的理論或框架。這使得它具

有由下而上的歸納特徵。

研究結論指出，因為資訊世界圖法格式與內容的多樣使得歸納編碼的分析方法能清楚分析。例如：概念分析強調反映參與者資訊行為的模型；情境分析則揭示了圖像上社會結構元素之間影響；內容分析方法提供了參與者資訊世界的概述，並能比較不同研究領域的地圖。研究者應與參與者合作，進行三角檢證和驗證，避免偏見影響詮釋。

三、 資訊世界圖相關研究

資訊世界圖法 (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IWM) 是一種視覺化與參與式的研究方法，廣泛應用於資訊行為研究領域。根據 Kitzie 等人 (2022) 的大量文獻回顧，該方法已被運用於多種主題與情境中，從家庭照護 (Dalmer, 2017) 到難民 (Martzoukou & Burnett, 2018)、移民與學生 (Mabi, 2020) 的資訊行為轉變，顯示其在多元文化與多樣化生活情境中的研究潛力。

(一) 國外研究

Dalmer (2017) 探討失智症長者的家庭照護者在資訊搜尋與使用過程中的經驗。透過資訊世界圖，研究揭示照護者如何在資訊邊界模糊與需求複雜的情境下，發展出應對策略與資訊實踐方式。該方法的參與性特質，特別適合探索弱勢群體的資訊行為脈絡。

Martzoukou 與 Burnett (2018) 則以敘利亞難民在蘇格蘭的資訊適應為題，運用圖像化方式讓語言能力受限的受訪者得以描繪其資訊需求、障礙與支持資源。透過視覺刺激，促進了資訊行為細節的表達與訪談互動的深度。

Mabi (2020) 研究在加拿大的非洲裔移民求職過程中的資訊行為，發現參與者在具體繪圖引導下能清楚表達其資訊來源與挑戰。文化與性別角色也在圖繪過程中浮現，例如偏好口語表達與女性受訪者需兼顧家庭照護的狀況。

Greyson 一系列針對年輕父母的研究 (2013, 2015, 2017; Greyson 等人, 2017b) 則顯示，資訊世界圖能揭示個人如何在健康資訊不對稱情境中建立自身資訊世界，圖像表達有助於理解其資訊來源的正式與非正式結構，並呈現文化價值與社會支持的影響 (圖 2-7)。

圖 2-6
年輕父母的資訊世界圖範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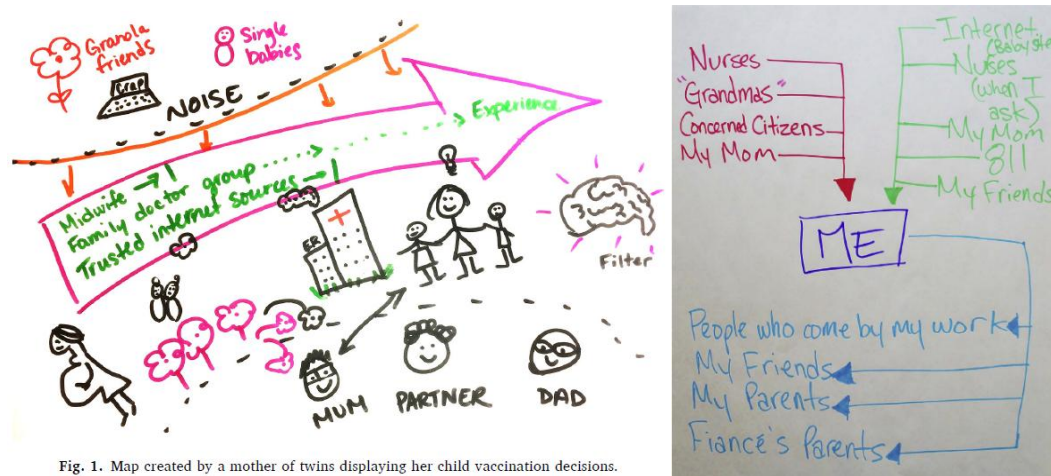


Fig. 1. Map created by a mother of twins displaying her child vaccination decisions.

註:引自 Greyson, D., O'Brien, H., Shoveller, J. (2017). 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A participatory arts-based elicitation method for information behavior interviews.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39 (2), p.151

(二) 國內研究

在臺灣，Tsai 等人 (2019) 以資訊世界圖追蹤碩士生在撰寫論文過程中的資訊行為變化。研究發現學生隨研究進度發展，資訊來源從多元轉向集中，互動對象也逐漸減少，反映出一種資訊孤立化的現象。圖像中的顏色使用亦呈現對資訊來源重要性的主觀評價。

吳智琪 (2019) 透過資訊世界圖法研究赴日留學生的日常資訊行為，歸納出四大類主要生活資訊需求，凸顯留學生在跨國生活中所面臨的適應挑戰與資訊資源配置狀況。

戴辰軒 (2021) 則聚焦於自閉症兒童主要照顧者的健康資訊行為。研究指出，除醫療相關資訊外，心理支持與日常生活資訊亦為重要需求來源。資訊的分享與轉化往往需建立在心理穩定與自信的基礎上，資訊世界圖揭示了這類心理因素對資訊行為的影響。

綜觀前述研究，資訊世界圖法作為一種視覺化工具，能夠揭示參與者在面對複雜資訊環境中的資訊需求、行為模式、社會文化背景以及面對的挑戰；從研究者面也能理解參與者的日常資訊行為，尤其是在面對資訊行為的複雜度和動態的時間方面，還能夠捕捉到他們在特定情境下所遇到的挑戰與支持網路，

從而為政策制定、社會支持網路建設及跨文化適應等領域提供有益的啟示。上述研究中的研究對象背景不盡相同，如居家照護者、難民、移民、碩士生以及年輕父母等群體，也顯示出資訊世界圖法在多元文化及多樣化生活情境中的應用潛力。本研究選擇採用資訊世界圖法，是因為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同樣身處複雜的資訊環境中。他們在跨文化情境下，面臨適應地方社區文化、解決工作問題及建立長期生活規劃的多重挑戰，這些因素使資訊世界圖法成為適合的研究工具選擇，用以挖掘隊員的資訊行為特徵及其在多樣化情境中的資訊實踐方式。

第四節 小結

綜合前述文獻，在政府積極擴大地域振興協力隊徵才規模的背景下，針對外國籍隊員之資訊行為的實證研究仍屬有限，像是在其應徵契機、資訊來源管道以及任期中資訊行為等面向的探討較為欠缺。基於此，本研究聚焦於外國籍隊員的資訊尋求歷程，關注其在任職前所蒐集之資訊內容、資訊來源對象與尋求過程中的情感變化，並進一步分析在資訊決策歷程中扮演關鍵影響角色的人物與事件。

此外，外國籍隊員在實際被委派至地方進行振興活動後，往往會隨著工作進展，逐漸產生關於地方發展、社區需求與政策理解等方面的資訊需求。資訊需求的主題呈現出隨時間與任務內容變化而動態調整的特徵，資訊來源的選擇則受到個人特質、文化背景與職務角色等因素的影響。然而，目前對地域振興協力隊員在任期中資訊行為的整體性描述仍較為不足，尤其是針對其所處資訊世界之結構，以及資訊世界中各要素之關聯性之研究亦不多見。

本研究選擇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為分析對象，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並輔以 Greyson 等人 (2017b) 所提出之「資訊世界圖」作為輔助工具，以強化資料的多面向呈現。該工具有助於辨識隊員在日常工作中與資訊相關之人員、物品與場域，並進一步勾勒其資訊互動網路與資源運用方式，從而理解其資訊世界的具體樣貌。

理論方面，本研究參考 Kuhlthau (1991) 的資訊搜尋歷程模型觀察隊員在資訊搜尋過程中的認知、情感與行為轉變，特別是在面對不確定性與適應新任

務的情境中，其情緒波動與資訊策略的轉變；而 Wilson (1997) 所建構之資訊行為模型則提供理解個人在面對資訊障礙時的反應機制與行為選擇，協助理解隊員在跨文化與制度轉換脈絡下的資訊行為特性。

透過上述理論與方法的應用，本研究著重於描繪外國籍隊員在地域振興協力隊任務中資訊行為的整體面貌，從資訊需求的產生、來源的選擇，到行動策略的形成與調整，進一步揭示其資訊行為背後所牽涉的社會文化脈絡與個人經驗。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在實際工作中所面對的資訊需求、獲取方式，以及其在地方社會中的資訊互動樣態。研究立基於質性研究取徑，採用「資訊世界圖」(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IWM) 與深度訪談作為主要資料蒐集方法。

近年來，資訊行為研究逐漸從個體資訊使用的角度，轉向關注資訊行為與社會脈絡、身分關係之間的互動關係，「資訊實踐」(information practice) 的研究取向因而受到越來越多關注 (蔡天怡, 2021)。相較於傳統著重個體行為的模式，資訊實踐強調資訊活動在特定社會文化條件下的展現方式。

呼應這樣的研究趨勢，本研究結合半結構式訪談與資訊世界圖的描繪與詮釋，分析協力隊員如何在地方創生與行政體制交織的情境中，進行資訊交換、建立關係網路，並因應工作中所遭遇的資訊挑戰，以呈現其資訊實踐的動態與複雜樣貌。

本章內容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參與者的招募方式與基本背景概述；第二節介紹研究設計，包括質性研究的取徑、半結構式訪談的執行，以及資訊世界圖的繪製準備與訪談引導綱要；第三節概述整體研究流程；第四節則說明本研究的資料分析策略，包括紮根理論的編碼程序與資訊世界圖的視覺詮釋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招募

本節說明本研究的受訪者範圍與招募方式。研究採用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選擇符合條件的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作為受訪者，並透過網路搜尋與官方聯繫方式尋找適合的對象。此外，在受訪者協助下，研究亦透過滾雪球取樣 (snowball sampling) 擴展招募範圍，涵蓋更多地區的臺灣籍隊員。以下將詳細說明受訪者的範圍與招募過程。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進行受訪者招募。立意抽樣適用於三種情況：(1) 選擇能提供豐富資訊的個案；(2) 針對難以接觸的特殊群體；(3) 當研究者希望深入探討特定個案時，可根據研究需求自行選擇符合條件的受訪者

(Neuman, 2000)。依據此標準，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為在日本全國各地任職滿三個月以上的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

由於本研究最初僅認識北海道地區的臺灣籍協力隊隊員，人脈範圍有限，因此2024年10月透過更改為日本地區的Google搜尋引擎設定，檢索關鍵字「地域おこし協力隊 出身地台湾」（中文：地域振興協力隊 出身地臺灣），並瀏覽每一個網頁頁面，確認臺灣籍隊員任職人數現況。於2024年12月本研究便主動聯繫該區負責的日本公務員，說明自身研究背景與目的，請對方轉達相關訊息，並協助提供臺灣籍協力隊隊員的聯絡方式。本研究共寄出21封郵件，其中8位已結束任期無法聯繫，直至2025年2月，9位同意受訪，其餘則未回覆。

此外，當本研究成功聯繫上日本東北地區的一位臺灣籍協力隊隊員時，該隊員表示東北地區的臺灣籍協力隊成員有一個LINE群組，涵蓋東北六縣的隊員。該隊員對研究表示有興趣，並主動協助將本研究的招募表單轉發至群組內。透過此方式，東北地區的受訪者招募得以透過滾雪球取樣（snowball sampling）進行，進一步擴展了受訪者範圍，使研究得以涵蓋更多地區的臺灣籍協力隊隊員。

在訪談進行前，研究者需先向受訪者說明本研究之目的，並詳細解釋錄音、錄影等隱私相關的研究需求及後續資料處理方式，以確保受訪者充分理解研究過程及其權益。研究者亦會提供知情同意書，並請受訪者於閱讀後簽署，以確認其自願參與本研究並同意相關研究要求。研究者承諾嚴格保護受訪者之個人隱私及訪談資料的安全。

本研究之訪談主要透過Google Meet進行線上錄影通話，並使用OBS軟體進行錄製，以確保訪談內容完整保存。訪談時間約90分鐘，實際時間將依訪談進行狀況而有所調整。在正式訪談前，研究者亦會向受訪者再次說明錄影過程及資料用途，以確保受訪者對研究流程充分理解並同意參與。

一、 研究對象背景資料

本研究共訪談 10 位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 ($N=10$)，受訪者年齡介於 21 至 40 歲，其中女性 5 名，男性 5 名。年齡與性別分布；受訪者年齡範圍為 21 至 40 歲，其中 21 至 30 歲區間有 5 人，31 至 40 歲區間有 5 人。性別方面，女性占 50%，男性占 50%。學歷背景與專業領域；受訪者皆為大學以上學歷，所

學科系涵蓋環境教育、文學、外國語文、動畫藝術、資訊管理及餐飲管理等領域。其中，3 人畢業於與語言或文化相關的科系（文學、外文），2 人為管理或資訊相關（資訊管理、餐飲管理），1 人為環境教育，1 人則為動畫藝術領域，3 人則未特別歸類。任職地區與年資；受訪者分布於日本東北、北海道、九州、關東及近畿地區。東北地區最多（3 人，30%），其次為北海道、九州、關東及近畿地區各 1 人。在地域振興協力隊的年資；1 位隊員已服務 3 年，2 位隊員為第 2 年，7 位隊員為第 1 年。工作內容；所有受訪者的工作內容皆與地方觀光推廣及國際交流相關，主要職責包括社群經營、訪日外國人旅客推廣、多文化共生活動及參展等。日語能力與學習經歷；受訪者的日語學習時間範圍為 4 至 27 年，平均約 12.9 年。9 位受訪者取得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1，其中 1 人學習日語長達 27 年。另 1 位受訪者取得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3。日本留學與工作經驗；9 位受訪者曾有日本留學經驗，主要為交換留學或研究所就讀，地點涵蓋東京都、北海道、兵庫縣及沖繩縣。此外，所有受訪者皆有日本工作經驗，其中 4 人曾於日本從事正式職位，6 人則有短期打工或約聘工作經驗。赴任前是否曾拜訪任職地區；大部分受訪者（9 人）在成為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之前，便曾造訪過其現任職地區，僅 1 人在赴任前未曾造訪過當地。

本研究受訪者為具備不同背景的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其中大多數具備日語能力，並且曾有日本留學或工作經驗。受訪者的學歷背景、工作經歷以及語言能力等特徵，提供了多樣的經驗和視角，有助於本研究從不同角度分析受訪者在日本的資訊行為及在地適應歷程。

表 3-1
受訪者資料表

編號	年齡	性別	畢業科系	任職地點	任職時間	工作內容	接觸日語時間/語言證照	是否有在日本留學的經驗	從事協力隊工作之前是否有在日本工作的經驗	任職前有无實際拜訪預計任職地點的經驗
PA01	26~30 歲	女	環境教育	東北地區	2022 年 5 月起，今年為第三年	社群經營與觀光推廣	14 年、JLPT N1	有，大學時期於東京都交換留學，碩士也就讀同一所	有，於東京都有在大學的約聘工作半年	有，參加兩天一夜體驗
PA02	36~40 歲	女	文學	中部地區	2023 年 7 月起，今年為第二年	社群經營與觀光推廣	27 年、JLPT N1	有，大學與碩士皆於東京就讀	有，前職於東京都有進口貿易業正職工作十年	有，參加兩天一夜體驗
PA03	21~25 歲	女	外文	北海道地區	2023 年 10 月起，今年為第二年	社群經營與觀光推廣	4 年、JLPT N1	有，於北海道就讀語言學校一年半	有，於北海道的道路休息站有打工經驗一年	有，為期兩週的實習
PA04	31~35 歲	女	外文	九州地區	2024 年 7 月起，今年為第一年	社群經營與觀光推廣	10 年、JLPT N1	有，大學時期於沖繩縣交換留學一年	有，前職於奈良縣從事旅遊服務業約聘事務員	有，事前至當地考察
PA05	36~40 歲	男	動畫藝術	關東地區	2024 年 10 月起，今年為第一年	訪日外國人旅客觀光推廣	17 年、JLPT N1	有，大學時期於東京都交換留學	有，前職於東京有觀光運輸業正職工作一年半	有，旅行短暫停留拜訪
PA06	26~30 歲	男	資訊管理	近畿地區	2023 年 4 月起，今年為第二年	國際交流多文化共生，舉辦交流活動	9 年、JLPT N1	有，碩士於兵庫縣就讀	有，於神戶市有餐飲打工經驗一年	有，碩士於當地做研究
PA07	21~25 歲	男	餐飲管理	東北地區	2024 年 5 月起，今年為第一年	觀光推廣與參展旅展	9 年、JLPT N3	無	有，大學於靜岡縣飯店實習一年	無，面試也完全線上面試
PA08	36~40 歲	男	醫科學	東北地區	2019 年 9 月起，2024 年 3 月迄，因疫情影響得以延長至四年半	原為奧運舉辦地而招攬外國籍隊員協助當地，轉而拍攝影片、舉辦活動	14 年、JLPT N1	有，碩士於仙台市就讀	有，前職於仙台市從事社會福利身心障礙中心約聘事務員兩年	無，僅有最終面試時為第一次到訪當地
PA09	26~30 歲	男	日文	東北地區	2022 年 3 月起，2025 年 3 月迄	國際交流促進員。在日本擔任與臺灣宜蘭縣的國小雙方國際交流	14 年、JLPT N1	無	有，前職為擔任臺灣宜蘭縣的國小雙方國際交流窗口	有，當時在臺灣擔任交流員，對日本窗口是熟面孔
PA10	31~35 歲	女	日文	九州地區	2021 年 4 月起，2024 年 3 月迄	情報發信(廣宣)，社群媒體平台的經營推廣	15 年、JLPT N1	有。大學時期有透過暑期參訪至久留米兩週	有，來日時第一份為食品業務，第二份為網路電商	無，但對從第一份工作至今都一直待在九州，熟悉此地

資訊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工具

本節將說明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流程，包含質性研究設計、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的使用，以及研究工具的應用，包括訪談大綱的設計與資訊世界圖（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IWM）法的導入與操作準備。

一、 資訊世界圖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運用「資訊世界圖」（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IWM）作為主要研究工具，以探討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在實際工作脈絡中的資訊需求與行為。資訊世界圖法由 Greyson 等人（2017）提出，原用於探討健康資訊行為，後續如 Tsai 等人（2019）、吳智琪（2019）、戴辰軒（2021）、陳世萱（2022）等亦將其擴展應用於教育與跨文化資訊行為研究，展現其在捕捉資訊情境與社會脈絡層面上的高度延展性。此方法結合深度訪談與視覺化繪圖，透過與受訪者在自然情境中的互動，協助其反思並具體描繪自身的資訊實踐樣貌，進一步補足傳統訪談難以掌握的資訊結構與脈絡。受訪者在繪圖與語言雙重表達中，得以更清晰地呈現其資訊行動的複雜性，亦有助於研究者對其個人資訊行為進行更深入的理解與詮釋。

根據鈕文英（2021）的說法，質性研究強調研究者與參與者之間的直接互動，並重視整體性的資料理解，從而獲得對研究對象更深入的認識。資訊世界圖法正體現了此質性取向：透過圖像與訪談並行的方式，受訪者能主動建構並說明其資訊來源、交流方式、使用情境及其社會互動背景。研究者則在過程中，根據受訪者的表述進行彈性引導與深度追問，使資料蒐集的過程中有探索性。

本研究在訪談設計上，參考 Kuhlthau（1991）的資訊搜尋歷程模型與 Wilson（1999）的資訊尋求行為模型，據此擬定圖面引導與問題提綱，使受訪者能在繪圖與敘述過程中，能描繪其資訊行為的發展歷程與面臨的挑戰。

（一）訪談與繪製流程設計

本研究採用 Google Meet 遠端訪談的方式進行 90 分鐘的深度訪談，訪談前請受訪者自備 A4 紙、鉛筆及多色筆，作為繪圖工具。訪談開始時，本研究透過 Google Meet 畫面分享一款平面設計線上平台——Canva 簡報，先進行知情同意

書說明，再者說明資訊世界圖的基本概念、繪製步驟、符號意義與範例圖例，協助受訪者充分理解接下來的繪製方式。

而在本研究進行完 PA01 訪談時，受訪者反映因繪製的資訊量甚大，在同一張紙上繪製不易，故從 PA02 調整為一個時間軸一張 A4 紙繪製。以及，本研究在進行 PA09 的訪談中，PA09 提出欲加入 Canva 中一起編輯並繪製，故 PA09 的資訊世界圖呈現方式為數位繪圖模式。因前者呈現效果佳，本研究也向 PA10 提出加入 Canva 簡報繪製的邀請，故最後兩位受訪者呈現的資訊世界圖為數位繪圖版本。

(二) 繪圖標準化設計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口試計畫書初稿階段，尚未明確規劃訪談過程中資訊世界圖的實際操作流程，設計相對空泛。隨著研究進行與計畫書的修正，考量到研究樣本數較少 ($N=10$)，若受訪者繪圖方式差異過大，可能導致圖像資料無法具備足夠的分析價值，因此本研究發展出一套標準化的繪圖樣式與操作規範，作為受訪者繪圖時的參考，期能提升資料的一致性與可比較性，亦利於後續進行視覺化分析與跨個案比較。

由於本研究亦設計圖例，輔助受訪者更有系統地描繪其資訊互動樣態，以降低繪圖過程的模糊性與主觀性。然而本研究的標準化設計雖有助於資料整理與分析，但也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受訪者自由表達其資訊世界的多樣性與個別差異，為本研究在方法設計上的一項潛在限制。

在訪談繪圖過程中，受訪者以自以為核心，標示出資訊互動的重要元素，包括資訊對象（人）、資訊媒介（物）及資訊發生場域（地點），並使用星星符號、單向／雙向箭頭標示資訊行為的流動。為呈現資訊行為的時間性變化，依時間軸分為三個階段：「任職前」、「任職中」與「未來規劃」，進行資訊世界圖的繪製。具體設計如下：

1. 三大構成要素：

「人」：資訊交流對象（如地方政府人員、當地居民、同事等），以圓形標示；「物」：資訊載體（如網站、社群平台、紙本資料等），以方形標示；

「地點」：資訊互動場域（如社區中心、辦公空間、線上平台等），以三角形標示。

2. 資訊流動：

單向箭頭代表接收資訊（例如獲取公告、聽取建議）；雙向箭頭代表資訊交換（例如互相討論、共同規劃）。

3. 互動頻率的顏色區分：

星號可標示最關鍵的資訊來源。綠色：高頻互動（如每日接觸）；藍色：中頻互動（如每週聯繫）；紅色：低頻或情境性互動（如臨時協助）。

如前述，標準化設計亦可能帶來某些限制。由於圖面設計採預設繪圖結構與符號規範，可能壓縮了部分受訪者自由表達資訊經驗的空間、影響受訪者對其資訊實踐的詮釋方式。本研究在資料分析階段將透過放大具有故事性的情境或案例，挖掘其背後的文化、組織與人際脈絡，從而豐富對資訊行為的詮釋。

二、 訪談大綱

綜合以上，本研究根據先前文獻分析得到的理論概念作為參考依據，使用資訊世界圖法作為工具進行資料的蒐集，以深入瞭解臺灣青壯年協力隊員在地方振興中的資訊行為與其資訊需求和獲取方式。

訪談流程如下：

- (一) 說明訪談流程。
- (二) 受訪者填寫背景調查問卷（訪談大綱第一部分，參見附錄一）。
- (三) 訪談受訪者赴任動機、困境與其中的資訊行為（訪談大綱第二部分）。
- (四) 說明資訊世界圖繪製流程與工具。
- (五) 受訪者繪製資訊世界圖（訪談大綱第三部分）。
- (六) 回到訪綱中反問受訪者資訊世界圖中的圖像、文字與符號的意義（訪談大綱第四部分）。

第二部分 訪談臺灣籍隊員任前至任職後的資訊世界與其資訊搜尋歷程

下表是以研究目與問題的為基礎設計訪談大綱：

研究目的：瞭解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臺灣籍隊員任前至任職後的資訊搜尋歷程，包含任職前資訊需求面相與行為、任職中對新工作的適應過程以及對未來任期期滿後的規劃，在資訊搜尋歷程的同時，其資訊世界關連到的重要的人、物與地點。		
研究問題： 一、臺灣籍青年在申請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的歷程中，其資訊需求為何？主要透過哪些方式進行資訊搜尋與確認？此一資訊搜尋歷程如何影響其申請決策？		
訪談問題	參考理論來源	理論內容及應用方式
任職前的資訊需求與搜尋歷程		
接觸與初始認識 1. 您是透過什麼管道得知地域振興協力隊的資訊？申請這項計畫的原因是什麼？在決定申請此計畫之前，您有做哪些相關功課以及關注哪些資訊？（如地方創生計畫內容、工作地點、待遇等）	Kuhlthau (1991) 資訊搜尋歷程模型、 Wilson (1999) 資訊行為模型、 Greyson 等人 (2017) 資訊世界圖法	探討從模糊到明確需求的轉變過程，理解資訊來源的角色與多樣性。
搜尋與評估 2. 請您分享搜尋這些資訊時，您曾經遇到找不到需要的資訊的情況，或者在查找或取得資訊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 3. 請您分享曾經很容易就找到所需資訊的情況。哪些類型的資訊比較容易查找或取得？您覺得為什麼查找或取得這些資訊較容易？		探討資訊搜尋中的障礙（心理、資源、文化差異），解析這些障礙如何影響資訊行為，並探索受訪者在面對挑戰時的應對策略與調適方式。
決策與準備 4. 在準備申請時，請問哪些人幫助您找到需要的資訊（如朋友、前輩、相關業界人員）？您偏好和認為重要的人或資訊來源管道為何？		探討資訊搜尋歷程中的人際互動，觀察社會網路如何影響資訊獲取、決策與情感變化。

<p>研究問題：</p> <p>二、在任職前與任職期間，臺灣籍協力隊員所處的資訊世界中，關鍵人物、媒介與地點的角色為何？這些資訊互動對象如何形塑其資訊取得、判斷與分享的行動策略？</p> <p>三、臺灣籍協力隊員在任職期間面對跨文化職場與地方生活時，其資訊行為在資訊世界圖中呈現出何種互動結構？此一結構如何影響其地方適應與未來生活規劃？</p>		
訪談問題	參考理論來源	應用方式
任職期間適應跨文化職場的資訊世界		
<p>資訊需求與取得</p> <p>5.在您任職期間，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難是哪些？這些困難通常與哪些方面相關（如專業知識不足、語言障礙、文化差異、與人互動等）？</p> <p>6.您是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的？談談您通常透過哪些管道或人尋求資訊支持（如前輩、朋友等）？這些來源如何幫助您解決問題並促進您的適應過程？</p>	<p>Kuhlthau (1991) 資訊搜尋歷程模型、 Wilson (1999) 資訊行為模型、 Greyson等人 (2017)</p>	<p>分析影響隊員資訊行為的內外因素（如職場文化、社會角色、情境壓力等），並探討如何透過資訊尋求來因應這些挑戰。</p>
<p>資訊交流與互動</p> <p>7.談談您經常透過哪些地點或平台獲取或分享資訊？這些交流和地點對您的工作適應有何幫助？</p>	<p>資訊世界圖法</p>	
未來規劃相關資訊需求		
<p>8.任期結束後，您目前對未來的規劃有哪些？（如是否留在當地、返回臺灣、或其他選擇）考量這些因素的同時，會透過何種管道詢問與評估相關資訊？</p>		<p>探討隊員在未來規劃中的資訊需求如何從模糊的需求逐步形成具體計劃。</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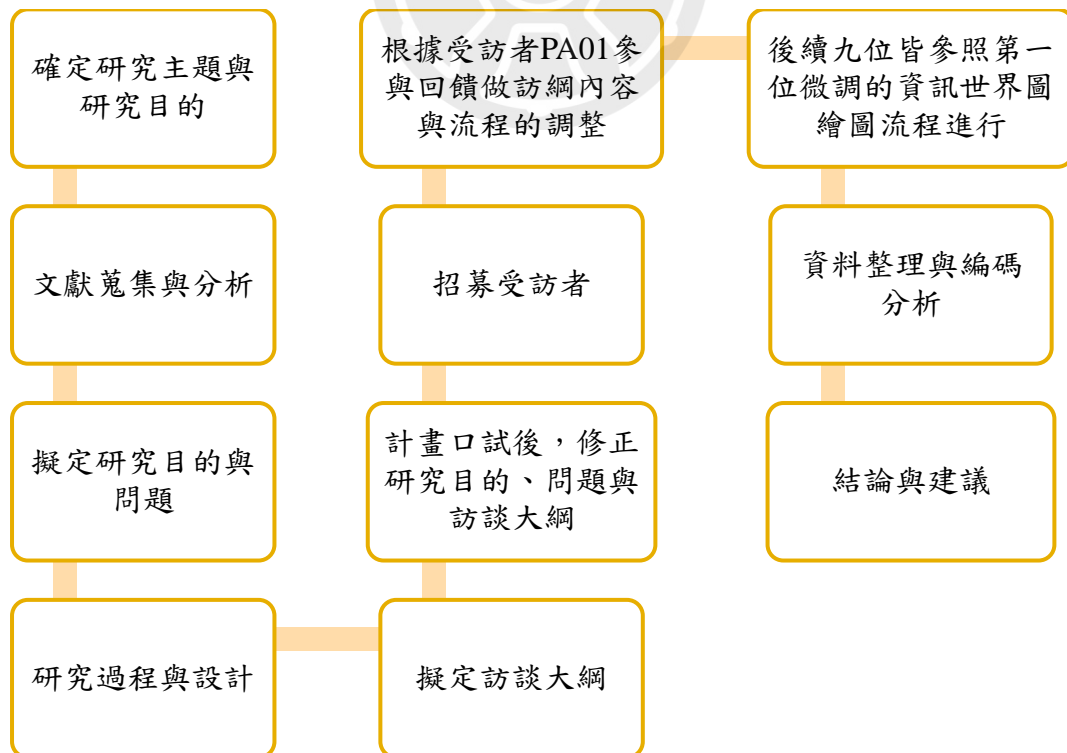
資訊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於參與計畫的準備階段至任期中的資訊行為特徵，包括契機與資訊來源、地方文化適應、工作問題解決及長期規劃。研究首先依據研究者的興趣與專業背景發想研究方向，確認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並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掌握當前研究議題與發展現況，以建立理論基礎與研究架構。根據文獻結果設計初步訪談提綱，經與教授討論修訂後形成正式內容。接著，擬定訪談大綱並進行前導研究測試，確認訪談問題的適切度與可行性，並根據測試結果修正訪談問題。

在受訪者招募階段，透過搜尋公開資訊與滾雪球取樣方式聯繫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並安排正式訪談。訪談採半結構式進行，當訪談數量達到資料飽和後，停止受訪者招募，並進行質性資料整理與編碼分析。訪談逐字稿及繪圖結果將進行編碼分析，並結合文獻探討與資訊行為理論進行詮釋，分析隊員的資訊行為特徵。研究將根據數據收斂結果發表具體的結果與建議。

圖 3-1
研究流程圖



第四節 資料編碼

本節將說明本研究的資料分析過程，包含訪談逐字稿的編碼步驟與資訊世界圖的整合分析方式。研究資料包含訪談錄音所轉寫的逐字稿內容，以及每位受訪者繪製的三張資訊世界圖。本研究參考Greyson等人（2019）與Tsai等人（2019）對資訊世界圖的分析策略，兩者結合有助於理解受訪者在不同階段中資訊行為的變化與趨勢。

一、質性內容分析

本研究採用質性內容分析法（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QCA）進行資料處理與詮釋。分析首先從逐字稿資料的整理與匿名化開始，每位受訪者依代碼如「PA01」標記，以確保受訪者隱私與研究倫理。

編碼過程參考鈕文英（2021）所建議，從原始文本中找出話題（topic），初步標示不同資訊行為的來源或是現象，即依循開放編碼（Open Coding），例如「正式資訊來源:官方網站」與「非正式資訊來源:朋友」、「資訊尋求行為:開始/選擇」等。訪談資料經過反覆閱讀後，並將其分類為不同的類屬，即焦點編碼（Focused Coding），進行標註、類別概念化，以確立受訪者在任職前的接觸與職場過程中的困難所反映的資訊行為。在焦點編碼的基礎上，進一步透過主軸編碼（Axial Coding）進行主題分類，進一步建立不同資訊行為間的關聯性，並歸納出受訪者在不同階段（任職前、任職中、未來規劃）中資訊行為的情境脈絡與變化趨勢。

資訊世界圖則作為輔助分析材料，幫助研究者對照文字內容，進一步理解資訊來源的組成、交流方式與資訊流動的方向與頻率。本研究在編碼過程中，也會特別留意圖面中出現但訪談中未提及的元素，或受訪者強調的重要資訊接觸經驗。

為確保資料分析的準確度與信實度，研究過程中持續進行資料的交叉檢核與反覆比對，確保每一類別與詮釋皆忠實反映受訪者觀點。在引用受訪者語句時，為維持文本一致性與區辨原始資料，本研究將使用「新細明體」字型呈現受訪者逐字稿內容，並於引述段落末附上受訪者代碼。例如：

我遇到蠻多障礙的，第二則是文化衝擊。日本鄉下的文化主要是靠刷臉的，就算有時候給他們(町民)錢也不會理你。像是我第三年的時候有舉辦活動帶臺灣的教授與學生來(我們町參訪)。我覺得如果我前面兩年我不在(這裡工作)的話，他們(町上地方政府職員)應該不會讓我這樣玩。(P01, 訪談逐字稿)

透過開放編碼與主軸編碼的分析(表3-2)，本研究將進一步梳理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隊員在日本任職期間的資訊行為模式，並搭配其資訊世界圖中標示出的部分輔以驗證，以揭示資訊需求、取得方式與分享途徑的脈絡。

表 3-2
編碼表範例

編碼			訪談內容
主軸編碼	焦點編碼	開放編碼	
人脈管道	老師或教授	教授認識協力隊人員，教授引薦	這個職缺是我大學院(碩士)教授介紹的。他認識我現在所在的I町的地方協力隊，之前他們曾經有過交流與合作活動。當時，教授提到這個機會，地方協力隊也問我是否有興趣來看看。(PA01)
		老師為N縣出身，從而打聽參與活動	其實那時候我有在學「三味線」。我的老師是N縣人，他在東京和N縣都有教室，我在東京跟這位老師學(樂器)....，透過老師的緣分。我們這些在東京學樂器的學生們，到N縣幫忙種田。(PA02)
		教授做研究而得知、引薦	我是在大學院(碩士)的時候常常來這邊(K縣)的K町做研究。然後在大概畢業前兩三個月，教授就開始跟我說這邊有這個工作，問我有沒有興趣。(PA06)
	朋友或職場人士	聽朋友的消息得知	本來是想找跟遊戲業相關的工作，但一直不太順利。後來就在簽證快到期的時候，我的學姐跟我說，I縣K市的協力隊正在徵才，且他們特別希望找臺灣人。(PA08)
		與前職場人士互動而得知	其實我來日本之前就已經知道協力隊，因為我之前在臺灣的旅行社工作，當時參加一些商談會，曾遇到一位中國籍的人，他當時就在做協力隊的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協力隊這個工作(PA04)
		職場上司直接提供職缺	當時，我協助臺灣宜蘭縣的小學與M町的小學進行交流活動，主要負責口譯工作。在這次拜訪過程中，M町町長跟我提及這個職位，並問我有沒有興趣擔任地方振興協力隊隊員。(PA09)
	第三方中介組織/地方公所(役場)人員	第三方中介組織直接告知職缺，並給予協助	不過，對我幫助最大的是I町裡有一個專門負責對接地方協力隊的第三方中介組織。這個第三方中介組織在東京有一位工作人員，算是教授吧，他們一起合作。當時我報名參加地方協力隊時，他馬上就聯絡我，幫我在申請過程能夠順利進行。(PA01)
		來自地方公所(役場)人員的直接協助	至於我做的功課，我開始申請前，先寫了郵件詢問G市的諮詢窗口，安排了30分鐘的線上的諮詢。他們問了我為什麼想來應徵，同時也介紹了G市的基本情況。諮詢結束後，我就需要在隔天把報名表提交上去。(PA02)
		求職仲介給予引薦	我是大學時期認識了一位從事日本工作的一位仲介，從他那裡了解到協力隊這個工作...之後，藉由仲介的幫助，聯絡到當地役場人員，仲介並幫我安排了線上的面試。(PA07)

資訊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任職前之資訊搜尋歷程分析

例如受訪者PA08的經驗（表3-3）即顯示出資訊取得與決策過程之間的密切關聯。他原先計畫投入遊戲產業，積極投遞相關履歷，但求職未果，產生了不安與焦慮。在簽證即將到期的壓力下，他開始考慮其他可能性。此時，一位學姐主動推薦了I縣K市的地域振興協力隊職缺，並表示當地希望招募臺灣人，引發了他的興趣，於是開始進一步搜尋相關資訊。

在查詢過程中，PA08透過Hello Work的就業媒合系統進一步得知，M縣的R町也正在招募協力隊，並且條件較為明確。在兩地之間猶豫之際，他選擇親自到K市與R町進行面試，藉由實地觀察協助決策。K市網路連線品質不佳、環境較為偏遠，令他感到不安；相較之下，R町的面試中不僅提供了更具體的工作內容與福利說明（如薪資、補助與後續創業支持），且整體環境較為友善與透明，最終使他選擇加入R町的協力隊。

值得注意的是，PA08在決策過程中，資訊來源相當多元，包含學姐的介紹、Hello Work仲介人的建議、面試官的說明，以及自身對面試地點的實地觀察與感受。他對協力隊職缺的初步了解多來自人際管道，正式資訊取得反而偏少。面試過程中的親身體驗與感受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資訊來源，顯示在資訊不對等或資訊不充分的情境下，感官經驗與信任關係在資訊判讀中扮演關鍵角色。

此外，這段經歷也呈現出在資訊行為的變化軌跡：從被動接收學姐資訊開始，到主動查詢與比較，最後透過實地觀察做出選擇，揭示了協力隊員任職前的資訊應對策略。

表 3-3 PA08 資訊搜尋歷程編碼表

Kuhlthau (1991, 2004) 資訊搜尋歷程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ISP)	資訊需求	PA08訪談內容	資訊來源	搜尋策略	情感變化
開始 (Initiation) 初步接觸資訊，但不確定要如何行動	模糊的職涯規劃，對協力隊沒有明確概念	「學姐跟我提到協力隊的機會，但當時對這個工作不太了解。」	- 學姐	- 被動接收資訊 - 聽取他人經驗	不確定、焦慮 (這工作適合我嗎?)
選擇 (Selection) 決定探索哪些資訊，確定方向	開始認真考慮協力隊的可能性，尋找適合的地點	「決定投遞K市與R町的協力隊申請。」	- Hello Work仲介 - 學姐 - 官方網站	- 瀏覽官方網站 - 參考前輩經驗	信心增加 (對可行的選擇有一屬希望光芒)
探索 (Exploration) 搜尋各種資訊，但可能感到資訊混亂與焦慮	研究不同地點的職缺與生活條件，但資訊片段化	「之前對K市的了解主要來自晨間劇《小海女》，僅始於此而已。」	- 電視 (晨間劇) - 社群媒體 (Facebook) - 役所網站	- 觀看媒體介紹 - 瀏覽政府資訊	困惑、焦慮 (資訊很雜，無法更具象)
形成 (Formulation) 開始組織資訊，資訊不確定性降低	進一步縮小選擇範圍，確認個人條件是否符合	「去面試時，才開始真正了解兩個地方的差異。」	- 面試機會 - 當地役場人員 - Hello Work仲介	- 實地面試 - 詢問當地人	信心提升 (有信心可以投遞看看)
收集 (Collection) 針對決策重點蒐集資訊，準備行動	針對薪資、生活環境、發展機會做最終確認	「確認薪資與福利、工作內容，並比較兩地生活機能後做決定。」	- 官方網站 (薪資資訊) - 其他隊員 (生活分享) - 當地房仲 (租屋資訊)	- 比較數據 - 詢問當地人	安心、自信
呈現 (Presentation) 做出最終選擇，確定最終決策並行動	做出最終選擇，確定未來發展方向	「最後選擇了R町，因為K市網路不便，影響工作與生活。」	- 役場人員	- 提交申請 - 準備搬遷	滿足、確信 (這是一個可行的機會、想把握)

資訊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任職前至任職中之資訊行為變化分析

除了基本的編碼與歸類外，本研究也特別關注受訪者在工作實務中所面臨的資訊挑戰，並進一步描繪其因應策略與互動情境。例如受訪者PA07的案例顯示（表3-4、表3-5與圖3-2），在任職前期，他主要透過Facebook等社群媒體與仲介人取得關於協力隊的初步資訊，並結合大學同儕的人際網路，進行資訊的比對與確認。雖然他有接觸官方網站資料，但資訊內容較為簡略，因此主要仍仰賴非正式的資訊來源進行判斷。

然而在實際任職後，PA07面臨前任協力隊員未完整交接資料的困境，導致初期無法掌握工作流程與地方活動脈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採取了兩種策略：一方面向町役場的前輩口頭詢問過往做法，另一方面透過社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Threads）搜尋前任隊員的線索，進而主動建立聯繫並取得活動紀錄。這樣的行動不僅展現出資訊尋求的主動性，也說明社群工具在資訊補足中的關鍵角色。

此外，PA07也透過參加研修活動認識來自其他町的協力隊員，逐漸建立跨地域的資訊網路。這些非正式的互助網路成為他解決問題、設計活動與推廣資訊的重要支援來源。他提到，許多資訊都是透過隊員群組中彼此分享與回饋，才能即時掌握各地協力隊的動向與經驗。

這樣的例子反映出協力隊員在地工作的資訊實踐往往處於正式與非正式、地方行政與社群之間的交錯地帶。他們需在制度結構與人際互動中穿梭，尋找資訊的空隙與通道。這類資訊行為也呈現出地方職場中資訊不對稱與自主探索的特性，為本研究理解協力隊隊員在任職中的資訊流動。

表 3-4

PA07 編碼與訪談表

編碼		開放編碼	訪談內容	研究者對應圖的筆記
主軸編碼	焦點編碼			
任職前的資訊來源與取得方式	人脈資源、設群媒體工具	行為:求職 主要資訊來源:仲介 地點:大學 工具:FB社團	基本上,仲介只是告訴我它是個公部門的工作,剩下的資料我還是自己查了一下,也詢問了身邊的朋友。我也有在Facebook的社群上看到一些相關的工作資訊,了解了一些工作內容。我還有上了這個町的網站,去查看他們的大概情況自己進行了資料收集。(PA07)	一開始為被動接受協力隊相關資訊,而後有透過非正式的朋友管道與Facebook社群尋問與查找,也有瀏覽過官方網站的資料。 IWM中呈現矩形的FB社團工具、圓形仲介人物、三角形的大學地點。

資訊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2

PA07 任職前與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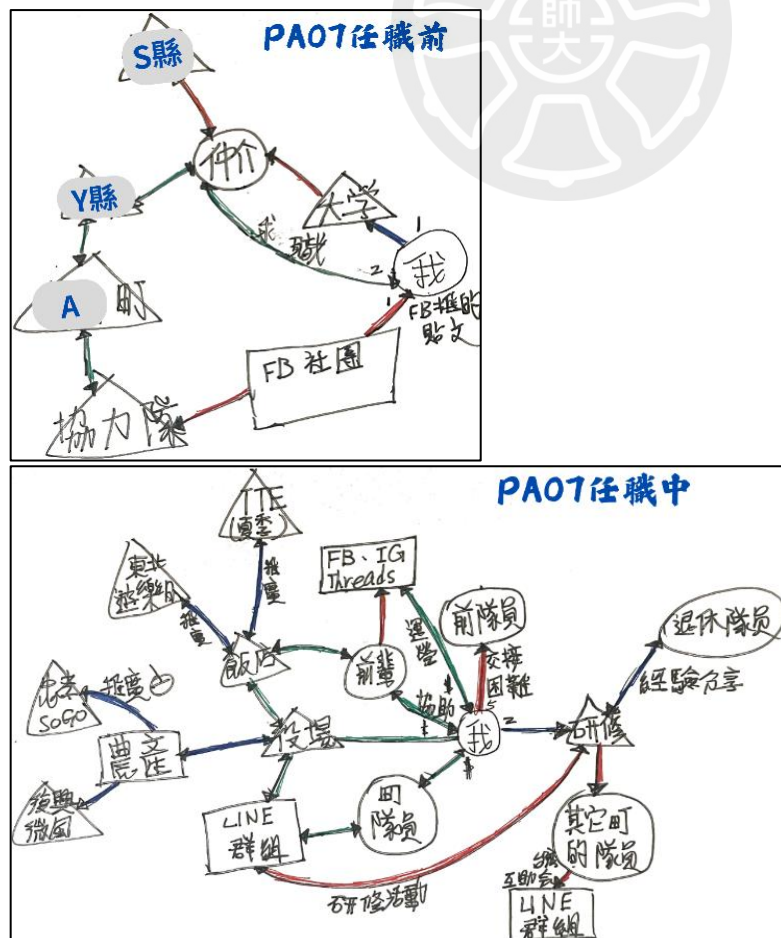


表 3-5
PA07 編碼與訪談表

編碼		開放編碼	訪談內容	研究者筆記
主軸編碼	焦點編碼			
透過向外尋求資源解決阻礙	任職中遇到的阻礙	行為:遇到交接阻礙 資訊來源:前輩、退休/其他町隊員 地點:研修場所 工具:社群媒體(FB、IG、Threads)	這邊的新舊交接並不順利，資料也比較零散，很多事情我得自己摸索。偶爾需要東西時，我會問役場前輩之前是怎麼做的。但因為有社群，我才知道前任隊員是誰，才可以找到他問他有沒有留下什麼資料，不然我真的是從零開始。 (PA07) 目前有遇到其他協力隊隊員，我們町內的協力隊員基本上會互相交流或推廣活動。基本上大家都是互助互相幫忙，當有活動的時候，大家會互相協助。會有一個群組，大家會分享各自的活動。比如說某個隊員辦了活動，會把活動消息放到群組裡，大家看到後評估時間是否合適，若可以就會參加，或者幫忙推廣活動。目前在Y縣，我只遇過一位來自臺灣的人，他在隔壁町。雖然東北地區這裡有不少臺灣隊員，但大家的領域都分得蠻散的，偶爾還是可以透過研修的時間遇到跟交流。(PA07)	點出任職中遇到的困難，資訊需求為找先前的辦活動資料，於是PA07的尋求方式是向內先問役場的前輩，向外參與協力隊研修場合遇到其他隊員。 IWM中呈現矩形的社群工具(FB IG Threds)、圓形前隊員人物、三角形的研修場所。

資訊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結合10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與資訊世界圖，呈現協力隊員在不同任職階段中所經歷的資訊互動樣態。透過圖面中標示的人物、媒介與場域元素，以及資訊流動方向與頻率的圖像表現，試圖捕捉受訪者在實際情境中資訊取得、分享與交換的歷程，並進一步釐清其背後的資訊網路與行為脈絡。

分析中可觀察到，協力隊員往往位處地方行政制度與在地文化交會之處，需於制度規範與人際互動之間進行協調，形成具適應性的資訊策略。部分資料亦顯示，自治體居民的態度與理解程度，可能影響協力隊員獲取地方性資訊的難易與速度，進而形塑其資訊接觸的社會環境。

此外，資訊世界圖所輔助呈現的非正式資訊網路——如LINE群組、社群平台互動、在日臺灣人社群與研修場合中的人際聯繫——亦成為理解資訊流通與

補足的重要視角。在這些互動中，資訊行為中的「人」、「關係」與「地點」三者的交織樣態，逐漸浮現。

圖面資料亦提示，某些受訪者在面對資訊不足或角色模糊時，傾向運用數位工具補足正式制度資訊的缺口，展現出資訊行為的主動性與調節特質。資訊可及性與語言能力、社會地位等因素間的關係，也透過圖像資料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差異性。

整體而言，本節透過質性內容分析與資訊世界圖的圖像輔助，支撐本研究的資料詮釋及更具脈絡性地解讀訪談內容，並建立個案間資訊行為的歸納架構。這一分析策略旨在為後續研究發現與討論的整理鋪陳基礎，並提供實證資料與理論連結之初步方向。



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章旨在呈現本研究之實證資料分析結果，並結合相關文獻與理論脈絡進行討論。研究透過半結構式訪談與資訊世界圖蒐集與分析臺灣籍協力隊員在日本地方工作過程中的資訊行為與身分轉變經驗，進一步探討制度脈絡、文化差異與資訊互動之間的關聯。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聚焦於協力隊員在任職前的資訊搜尋歷程，分析其資訊需求類型與實際獲取來源，並探討資訊可得性與其參與動機之間的關聯。第二節探討協力隊員任職期間在地方現場的資訊交換行為，進一步剖析其身分認同與地方關係的演變歷程。第三節則透過資訊世界圖分析各受訪者圖像中人、物、地點的出現狀況，揭示資訊行動如何具體嵌入在制度、文化與空間脈絡之中。最後，第四節綜合上述分析結果，針對研究問題進行整體討論，反思協力隊制度中資訊行為的關鍵意涵，並回應跨文化資訊行為研究之可能拓展方向。

第一節 任職前資訊搜群歷程與其需求與來源管道

本節針對受訪者 PA01 至 PA10 在進入地域振興協力隊前的資訊搜尋行為進行細緻分析，透過資料編碼，歸納出隊員任職前資訊行為的發展軌跡，並探討隊員的資訊需求、資訊來源、資訊掌握程度差異，以及交流與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因素。

一、 任職前資訊需求與來源管道

(一) 任職前來源管道

在加入協力隊之前，受訪者的資訊需求與來源多元，這些資訊的獲取方式主要受到個人背景與機緣影響，形塑了各自的資訊搜尋行為。本研究發現，受訪者進入協力隊的管道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1. 人際網路、2. 網路與社群媒體、以及 3. 實地體驗。

1. 人脈管道

與 2024 年問卷調查的結果一致（一般社團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2024），人際網路在資訊獲取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人脈關係來自於主要三大

來源：(1) 老師或教授、(2) 朋友或職場人士，以及(3) 第三方中間組織/地方公所（役場）人員。

(1) 老師或教授

部分受訪者透過學術環境中的老師或教授得知協力隊的機會，並進一步輔以網路搜尋相關資訊（如：PA01）。然而，也有受訪者完全依賴教授與學校提供的研究資訊，而未積極探索其他來源（如：PA06）。前者在獲得人脈資源的訊息後，會主動透過網路查找相關活動，以進一步了解協力隊的內涵；後者則較少主動搜尋資訊，資訊來源較為單一，僅依據教授的推薦申請特定地區的協力隊職缺。

這個職缺是我大學院（碩士）教授介紹的。他認識我現在所在的I町的地方協力隊，之前他們曾經有過交流與合作活動。當時，教授提到這個機會，地方協力隊也問我是否有興趣來看看。（PA01）

其實那時候我有在學「三味線」。我的老師是 N 縣人，他在東京和 N 縣都有教室，我在東京跟這位老師學（樂器）....有一年黃金週的時候，透過老師的緣分。我們這些在東京學樂器的學生們，到 N 縣幫忙種田。（PA02）

我是在大學院（碩士）的時候常常來這邊（K 縣）的 K 町做研究。然後在大概畢業前兩三個月，教授就開始跟我說這邊有這個工作，問我有沒有興趣。（PA06）

(2) 朋友或職場人士

部分受訪者是透過朋友介紹而認識協力隊這個組織（如：PA08），也有人因職場或人際關係而接觸到相關資訊。某些受訪者在工作中與協力隊員有所往來，因而進一步了解協力隊制度（如：PA04、PA09）。

本來是想找跟遊戲業相關的工作，但一直不太順利。後來就在簽證快到期的時候，我的學姐跟我說，I縣 K 市的協力隊正在徵才，且他們特別希望找臺灣人。（PA08）

其實我來日本之前就已經知道協力隊，因為我之前在臺灣的旅行社工作，當時參加一些商談會，曾遇到一位中國籍的人，他當時就在做協力隊的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協力隊這個工作，因為協力隊有很多不同的領域，例如農業、空屋管理、移住定住等等。（PA04）

當時，我協助臺灣宜蘭縣的小學與 M 町的小學進行交流活動，主要負責口譯工作。在這次拜訪過程中，M 町町長跟我提及這個職位，並問我有沒有興趣擔任地方振興協力隊隊員。（PA09）

(3) 第三方中間組織/地方役場人員

第三方中間組織或地方役場人員也是協力隊招募的重要資訊來源。根據日本官方文獻（国立国会図書館，2024），第三方中間組織可作為橋梁，協助首都圈人士應徵地方協力隊職缺（如：PA01），呼應糸原良樹（2022）強調的「事前接觸機制」價值。此外，臺灣的人力仲介機構亦是一種特殊的中介來源，部分受訪者透過這類機構取得職缺資訊（如：PA07）。

不過，對我幫助最大的是 I 町裡有一個專門負責對接地方協力隊的第三方中介組織。這個第三方中介組織在東京有一位工作人員，算是教授吧，他們一起合作。當時我報名參加地方協力隊時，他馬上就聯絡我，幫我在申請過程能夠順利進行。（PA01）

至於我做的功課，我開始申請前，首先寫了郵件詢問 G 市的諮詢窗口，因為他們有一個服務，如果你有疑問，可以線上進行 30 分鐘的諮詢。我發了郵件給他們，他們很快就回覆了我，並安排了線上的諮詢時間。這個諮詢有 30 分鐘，他們問了我為什麼想來應徵，同時也介紹了 G 市的基本情況。諮詢結束後，我就需要在隔天把報名表提交上去。（PA02）

我是大學時期認識了一位從事日本工作的一位仲介，從他那裡了解到協力隊這個工作...之後，藉由仲介的幫助，聯絡到當地役場人員，仲介並幫我安排了線上的面試。（PA07）

PA08 則因當地生活資訊有限，需仰賴其他管道，如前輩或仲介的介紹，來獲取更多在地職缺資訊。最後是從 Hello Work（日本政府的就業服務處）轉職的諮詢處，協助轉職的仲介人因自身為 R 町地區出身，提供 PA08 了直接有關協力隊的資訊，使 PA08 更容易掌握協力隊計畫資訊。

我的學姐跟我說，I 縣 K 市的協力隊正在徵才，且他們特別希望找臺灣人。學姐建議我去應徵看看，所以我就投了履歷。在準備投遞的時候，我去日本的 Hello Work，當時的仲介告訴我，他看到我投了協力隊的資料，然後說他是 M 縣 R 町的居民，發現利府町也有協力隊在徵才。他建議我也可以應徵看看，反正兩邊都差不多，所以我就兩邊都應徵，結果兩邊都錄取了。（PA08）

2. 網路與社群媒體

除了透過人際網路獲取資訊，一些受訪者則是透過社群媒體或網路平台偶然發現協力隊的職缺資訊（如：PA05）。這類求職者的資訊來源較具偶然性，可能是在社群媒體瀏覽時無意間看到相關訊息，進而產生興趣。此外，PA10 受訪者則是在轉職過程中，透過 Facebook 搜尋地方創生創業者的理念，進而

得知該創業者曾為協力隊隊員，並透過總務省官方網站進一步查找協力隊職缺。PA10 也提及，該官方網站資訊豐富、易於閱讀，並提供明確的職缺募集資訊，因此成為其主要的資訊來源。

其實，我只是在臺日交流的 Facebook 社團裡，然後今天不小心看到了求人的資訊，就儲存了一下。可能是臺日交流或是日本打工度假這類的資訊社團。我就是 Facebook 社團看到求人的資訊就儲存了一下。(PA05)

一直以來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幫助到人，所以就查了一下地方創生相關的工作。後來，我開始查到「協力隊」這個名稱，並且在（總務省的）網站上找到了相關資料...發現網站做得不錯，還蠻新的，職缺相關的資訊也很多。(PA10)

3.實地造訪當地或參加體驗營

另一類受訪者則是透過實地造訪或參加體驗營的方式，接觸並進一步決定加入協力隊。這種管道亦是日本官方文獻推崇的一種方式，即透過體驗營活動，使參與者實際感受當地生活，進而評估是否適合加入協力隊。受訪者 PA01、PA02 和 PA03 皆先是透過人脈資源得知地方活動與文化交流，並透過參與當地的實體體驗活動，加深對協力隊的理解，最終促使他們決定報名當地協力隊。對這類求職者而言，除了人際關係因素外，實體活動的參與更是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將這類型的接觸歸類為透過參加體驗營的方式認識協力隊，並在實地體驗後做出應徵決定。他們透過與當地居民或職場同事的互動，獲取第一手資訊，進而影響其決策過程。

後來，教授跟我說了這件事後，我就上網查了一下，發現他們有提供一個「兩天一夜試體驗」的行程，叫做「お試し地域おこし協力隊体験ツアー」。.....我就參加了這個試體驗活動。當時是冬天，天氣很冷（笑）。其實當時我有兩個選擇，另一個地方是茨城縣的大洗町，我也有去參加試體驗。(PA01)

最初接觸這個名稱是在臉書上看像地方創生活動，邀請都市圈的人去長野縣體驗兩天一夜試體驗。當時參加種田活動讓我覺得很新奇，後來大家在那裡吃飯聊天時，有人提到說「現在在招募協力隊」這件事。那時候我看到了一份小小的當地刊物，裡面就有關於五泉市的募集資訊。(PA02)

最開始我知道協力隊這份工作是因為當時我在打工的地方，遇到了一位臺灣前輩，他當時正在協力隊工作，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協力隊這個名詞.....語言學校的「留學生職涯教室」老師跟 N 町役場職員聯繫，N 町有提供我實習機會，大約是 14 到 16 天左右。這個實習計劃也是總務省推動的，主要是要看看我和這個地方是否合適。(PA03)

此外，部分受訪者則是透過觀光走訪的方式，先行了解當地的生活環境，進而考慮加入協力隊。PA04 受訪者即表示，在工作期間曾與某縣的協力隊隊員有所接觸，後來因觀光造訪該地，對當地環境產生好感，進而決定申請協力隊職缺。

之前因為在 O 縣工作接觸了 O 縣的協力隊隊員。當時，我有去觀光過 Y，我很喜歡離島，因為我是臺灣離島出生長大的。Y 的人當時告訴我，他們非常希望有臺灣人來，因為他們和花蓮縣已經有四十多年的姐妹市關係，每年都有一些合作。(PA04)

(二) 申請過程中的資訊需求

在決定申請協力隊後，受訪者的資訊需求變得更加具體，主要聚焦於三個領域：1. 工作內容與環境，2. 生活條件評估與津貼（住宿、交通、社交）以及 3. 簽證辦理。資訊來源的可得性與透明度，影響求職者篩選、評估相關資訊的方式，進而影響最終的決策。

1. 工作內容與環境

受訪者對於工作內容的資訊需求，主要關注職責範圍的明確度及未來發展。然而，由於協力隊的工作類別多樣，雖皆與觀光推廣相關，部分受訪者指出，該地方政府因首次聘用外國籍協力隊隊員，缺乏前例可供參考，導致職務資訊透明度不足，反映石川和男（2023）及羅曉勤（2019）對於願景與現實落差的警示。

部分求職者直到面試或錄取後才得以確認具體職責（如：PA05、PA01）。甚至有受訪者在前往當地面試時發現，實際工作內容與原先預期存在落差。部分受訪者表示，面試時對於職務內容僅有模糊概念，錄取後才意識到需自行規劃所有工作內容，而地方政府提供的指引相對有限，顯示部分求職者在資訊掌握不完全的情況下做出決策，呼應文獻對中間支援的需求（石川和男，2023）。

S 市職員覺得 I 溫泉是他們想要重點推廣的觀光熱區，但由於 K 縣的地理位置的關係，他們（S 市職員）面試時告訴我說請我負責海外遊客觀光推廣，但據我的來旅遊的觀察，這裡的遊客九成以上都是日本人。如果有外國遊客，大部分是來自臺灣的遊客，或者講華語和粵語的旅客。我也觀察到來自南亞的遊客，像是印尼和印度人也不少。所以他們（S 市職員）可能希望從這邊拓展，吸引更多外國遊客，但我也不能確定上任後能做什麼。(PA05)

工作內容方面的資訊還是很空泛。雖然我面試的職位是觀光推廣，但他們（役場職員）告訴我所有的工作內容都要自己決定，役所並不會給你明確的指示，感覺就是「你想做什麼就去做」。(PA01)

還有一個困難是，曾經在公司工作時，公司會給我明確的目標或業績，要我朝這個目標前進。但面試時市役所人告訴說我們有這一筆費用，要我做撰寫 SNS 來網路宣傳，詳細的得自己企劃。(PA10)

唯有少數參與者透過實地體驗獲取職場資訊，例如 PA03 曾參與為期 16 天的實習，以評估未來的工作環境。然而，這類機會對受訪者而言並不普遍。PA04 指出，由於仍有正職工作，難以請假兩週參加實習，因此無法透過短期體驗獲取未來職位的相關資訊。

對而且那時候會答應這邊的內定的很大一個原因也是因為現在的同事們。就是因為參加了那個 16 天的實習，有和他們互動過，才覺得對(未來職場的想像)比較安心。(PA03)

我覺得那個 intern 有一個比較奇妙，也比較難參加的地方，除非你可以請到長期的假期。但一般人其實很難請到長期假，要不然就是你已經離職了，才有辦法參加。(PA04)

少部分受訪者曾參考前任協力隊隊員留下的資料。PA02 和 PA07 提到，他們曾在社群媒體上瀏覽已退任學長姊過去舉辦活動的貼文，並以此作為參考。

之前的畢業學長姐通常會在臉書上分享一些活動和取材的內容，當時我就常常去查閱這些文章。(PA02)

因為有臉書，我才知道前任是誰，才可以找到他問他有沒有留下什麼資料，不然我真的是從零開始。(PA07)

2. 生活條件評估與津貼（住宿、交通、社交）

關注此類資訊的受訪者表示，決定申請協力隊時，影響他們願意離開都市、搬遷至鄉村的主要因素為當地生活環境與人際適應，這對求職決策具有關鍵影響。

他們面試時還跟我說：「如果你參加研修或考證照，費用可以從活動費中支出。」這對我來說很有吸引力，因為這樣我就不需要自己花錢，而且可以實現自己想做的事。當時我已經有一定的未來規劃，來這裡等於是試走自己想走的方向，像是如果以後想創業，我可以從活動費裡面支出來準備。(PA04)

主要是生活上的補助多，房租電費、油錢等，還有可以擁有更多自己的時間。我也可能有些嚮往更偏向田園的生活吧，畢竟東京的生活有點膩了。(PA05)

當時我很喜歡 K 市的生活，現在也是很喜歡這裡。我就想，這樣一直住在這個地方，我能過得下去嗎？後來教授跟我說，因為我在 K 町這邊住宿是用協力隊的經費支出的，所以不需要自己付住宿費。然後他又說：「既然 K 町不需要付錢，那就去 K 市租一間房子，這樣不是更好嗎？」所以我就被老師說服了。(PA06)

離職後，由於疫情被鎖在市區內，覺得市區很擁擠、煩躁。當時我在想要找什麼工作.....一直以來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幫助到人。那時候不太知道為什麼會知道「地方創生」這個詞，所以就查了一下地方創生相關的工作，一直對於幫助他人、到鄉下去幫忙的事情很有興趣，於是開始搜尋地方創生的工作。(PA10)

此外，部分受訪者因與當地居民有所連結 (PA02)，或有伴侶陪同 (PA03)，產生歸屬感，因此選擇申請該地區的協力隊職位。

認識的人是很重要的。我們現在有兩位協力隊成員，除了我之外，另外一位協力隊成員的丈夫是 G 市人，他們帶著三四歲的小孩過來。對於我來說，我當時是處於一個群體的狀態，最初的連結點主要是我（學樂器）的老師，以及當時參與種田活動的農家。那個農家現在住得離我很近，雖然我們不常見面，但偶爾會聯繫。(PA02)

剛好那時候我的男朋友考上了公務員，並且被分發到我現在工作的 N 町。當時我就想，能不能看看 N 町有沒有合適的工作。(PA03)

由於許多協力隊職缺位於偏鄉地區，受訪者普遍對當地的生活條件、交通便利性及適應問題感到不安。例如，PA01 透過 Google 搜尋地名，但發現相關資訊極為有限，進一步加深了對當地生活條件的不確定感。PA08 提及，在前往當地面試後發現網路通訊品質不佳，因此最終選擇其他地點。另一方面，PA04 擔心住宿問題，然而當地公所職員積極提供協助，使其感到安心。

當時我在找 I 町的相關資訊時，發現直接 Google 這個地方，幾乎找不到任何資料，這讓我有點害怕。在這個網路資訊發達的時代，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地方資訊這麼少？真的有點可怕。(PA01)

至於為什麼選擇 R 町而不是 K 市，主要是因為我去 K 市的時候，租來的行動 Wi-Fi 完全沒有訊號，真的太偏僻了，沒有網路讓我感到很不方便，所以最後選擇了 R 町。(PA08)

總的來說，來之前的主要問題是住宿。對我來說，比起做功課，反而是當地的人幫我處理了很多事情。.....那裡的住宿基本上不公開，原本我計畫住他們專為移住者準備的房子。當地政府提供了預算，幫助有意參加地域振興協力隊的隊員直接來現場考察。我是在三月來到那裡，實地了解島上的狀況，並查看自己將來要住的地方。但住的地方有點讓我驚訝，因為開門後居然看到蟑螂。我非常討厭昆蟲，當時我明顯表現出來不想住在那裡，結果他們幫我找了另外一個地方住。那地方很新，還有家具，這樣我就不用再重新購買家具了。(PA04)

3. 簽證問題

由於外國人在日本工作須持有合法簽證，因此簽證條件成為大多數受訪者關心的首要問題。PA05、PA06 及 PA09 指出，協力隊隸屬於地方政府的公家機關，屬約雇人員，其簽證申請流程與一般日本企業的工作簽證辦理方式有所不同，導致申請過程中遇到一定困難。

相較之下，PA07 透過熟悉的仲介順利完成簽證辦理，減少了相關困擾。此外，部分受訪者已持有日本永久居留權或配偶簽證（如 PA02、PA10），因此無須面對簽證更新問題。

因為我是外國人嘛，所以我比較擔心的是役場能不能幫我更新簽證。
(PA05)

因為協力隊的工作性質比較特殊，它不是一般的公司，它算是公家機關。那申請簽證時，申請表格的分類只有公司這一類。因為我們不是賺錢的組織，所以我就跑去入國管理局詢問。.....也正因為這個同學幫忙，我才順利申請到簽證。(PA06)

由於當時（2021 年）地方政府首次聘用外國籍協力隊隊員，對簽證事宜並不熟悉，因此他親自前往臺灣的日本交流協會詢問。此外，因疫情影響，從臺灣入境日本擔任協力隊面臨諸多限制，他最終透過當時短暫開放的打工度假簽證進入日本。由於協力隊制度要求申請者需從大都市遷移至地方戶籍，地方政府亦協助他於首都圈的地域振興商店短暫工作，並最終順利在地方政府的協助下取得正式簽證。(PA09)

簽證的部分是透過仲介幫我處理的。他們幫我填資料，然後負責跑簽證的手續。(PA07)

對，我覺得有幾個原因。首先，我並不需要擔心簽證問題，因為我在之前的工作中已經拿到了永住權。協力隊的薪水雖然不高，但對我來說，不必擔心簽證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優勢。雖然其他地方可能會幫助外國人辦簽證，但那可能只是一個三年的簽證。(PA02)

對，後來我就換成配偶簽證，所以沒有什麼問題。(PA10)

最後，資訊的獲取與選擇影響了應徵者對地方振興協力隊的認知與期待。人脈、網路、社群媒體，以及實地體驗，都是應徵者在決策過程中的重要資訊來源。而生活條件、薪資與福利、人際氛圍等因素，則在求職者的選擇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透過這些資訊的蒐集與評估，應徵者能夠做出更符合自身需求的決定，進一步影響地方創生協力隊的發展與人才流動。任職前來源管道與資訊需求的對應圖如下。

表 4-1
任職前之資訊需求類型與資訊來源

任職前之資訊需求類型		工作內容	生活條件評估與津貼	簽證
資訊來源				
人	教授／老師	✓		
	朋友／同事／前輩		✓	✓
	第三方中間組織 役所／地方政府人員	✓		✓
物	網路資訊 (Google、官方網站、社群媒體)		✓	✓
	實體刊物(廣報、宣傳手冊)	✓		
	申請文件(履歷、面試準備資料)	✓		
地點	學校(研究所／語言學校)	✓		
	實地走訪當地(參與試體驗或實習)	✓	✓	
	地方公所(役場)	✓	✓	✓
	日本入國管理局			✓

資訊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任職前的資訊搜尋歷程

(一) 資訊行為發展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在申請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的資訊行為，大致符合 Kuhlthau (1991) 所提出的資訊搜尋歷程模型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ISP) 之基本架構，亦即從資訊需求的產生、探索、決策形成，直至最終選擇。然而，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受訪者的行為樣態亦展現出前往任職協力隊一職脈絡下其調適特徵。

鑑於研究對象樣本數為十人，本研究依據受訪者實際經驗，將原 ISP 模型之六個階段整合為三個主要階段：「開始與選擇」、「探索與形成」以及「收集與呈現」，以較貼合協力隊申請歷程中資訊搜尋行為的真實樣貌。

1. 開始與選擇 (Initiation+Selection)：接觸協力隊資訊，開始篩選方向

在初期階段，受訪者對協力隊的資訊接觸多為偶然，尚未明確將其視為主要的求職選項。資訊來源包括朋友推薦、社群媒體演算法推播或參加地方體驗活動。此階段的資訊需求尚不明確，受訪者多以好奇與期待的情感狀態，進行初步搜尋與認識，尚未形成具體申請意圖。例如，PA05 和 PA10 透過 Facebook

社團演算法接觸到協力隊應徵資訊或前人分享；PA08 與 PA10 則是在轉職考量過程中，將協力隊列入可能選項。另有受訪者（PA01、PA02、PA03）則因老師或朋友的推薦參加地方試驗活動，加深了對協力隊制度的理解。

在任職前，我接觸過的資訊主要來自於 Facebook。(PA05)

離職後，由於疫情被鎖在市區內，覺得市區很擁擠、煩躁。那一陣子找工作還蠻辛苦的，網路上投履歷也沒有什麼讓我感興趣的工作。我就開始想，我到底想做什麼，開始查找相關工作。一直以來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幫助到人，所以就查了一下地方創生相關的工作。.....對，就是被打廣告這樣子，但我也透過臉書才看到創辦人。(PA10)

當時參加種田活動讓我覺得很新奇，後來大家在那裡吃飯聊天時，有人提到說「現在在招募協力隊」這件事。那時候我看到了一份小小的廣報，應該算是一個當地刊物，裡面就有關於 G 市的募集資訊。(PA02)

隨著興趣提升，資訊需求也逐步明確化，受訪者開始比較不同地區的職缺條件與申請資格，並透過官方網站、教師建議、社群媒體及人脈進行初步篩選。此時，受訪者的情感狀態轉為期待與不確定感並存。例如，PA02 指出官方網站雖提及退任後可能的發展，但資訊簡略，不足以支持生涯判斷；PA05 與 PA07 表示主要透過 Facebook 了解訊息，但內容多為經驗分享或由即將離任者主動招募後繼人，資訊缺乏結構性。

在 G 市的官方網站上，退任後的出路沒有寫得很詳細，只是提到有些前輩留在 G 市生活。這樣的資訊比較簡單，並沒有說明具體的職業發展或機會。(PA02)

其實在 Facebook 上有很多社團，像是臺日找工作或者打工度假之類的社群。我會大概看一下這些社團的內容，了解他們在推什麼。有些是當地即將卸任的人在幫忙招募後繼者，會把招募資訊放在 Facebook 上。(PA07)

2. 探索與形成 (Exploration+Formulation)：加深了解與確認申請決策

進入此階段，受訪者資訊需求集中於實際職缺內容、工作條件、地區生活環境與簽證等具體面向。此時資訊的不透明與片段化開始造成焦慮與不確定感，尤其對於工作內容與待遇的落差，以及外籍身分所面臨的制度限制。例如，PA01、PA02、PA03 均有比較多個地區職缺的經驗，發現資訊透明度不足，選擇報名參加地方試驗營以彌補資訊可及性不足。PA07 嘗試蒐集過去協力隊員經驗，卻發現資訊零散、矛盾，增加了決策困難。

.....的確，網上找到的資料大部分是針對日本人設計的工作內容，對於外國人，像臺灣人的協力隊員資訊其實很少。到了當地後我發現，大概九成以

上的隊員都是日本人，臺灣人可能只有一兩個。所以在網上找到的資料也非常有限，通常只能從官方網站了解大概的情況，知道這個地方在推廣什麼以及未來的推廣計劃。(PA07)

當時我在找 I 町的相關資訊時，發現直接 Google 這個地方，幾乎找不到任何資料，這讓我有點害怕。在這個網路資訊發達的時代，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地方資訊這麼少？真的有點可怕。.....工作內容方面的資訊還是很空泛。(PA01)

當時那對臺灣夫妻確實有先查過他們應徵的協力隊職位工作內容，但其實看的不太清楚，因為不同地方的協力隊工作內容差異很大。後來我也問了很多其他做協力隊的臺灣人，但因為他們都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無法提供我具體的建議，這讓我無法了解更多關於工作內容的實際情況。所以這方面的資訊很難在線上找到。(PA03)

我應徵的是 N 町的職缺，但具體分發到哪個部門還是要看 N 町町長的安排。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在我打工的地方，有一位臺灣前輩，他當時報到時才知道自己會在哪个地方工作。當時我還蠻擔心的，擔心我會被分發到我之前曾經打工的休息站，要做服務業，推銷伴手禮等。(PA03)

隨著申請行動的推進，部分受訪者透過面試、實地走訪、與地方政府聯繫等方式獲取正式資訊，資訊焦慮逐步下降，申請決策逐漸成形。

當時能獲取資訊的方式不多，身邊的朋友不瞭解這個制度，於是我主要依靠上網查詢與最上町公部門直接接洽，遇到不懂的地方就直接問當地的相關單位，這樣效率較高。(PA09)

面試時他們(S 市職員)覺得 I 是他們想要重點推廣的觀光熱區，但由於 G 縣的地理位置的關係，他們(S 市職員)面試時跟我說，也正是我觀察到的，這裡的遊客九成以上都是日本人。如果有外國遊客，大部分是來自臺灣的遊客，或者講華語和粵語的旅客是最多的。我也觀察到來自南亞的遊客，像是印尼和印度人也不少。所以他們面試時提及希望請我從這邊拓展，吸引更多外國遊客。(PA05)

當地政府提供了預算，幫助有意參加地域振興協力隊的隊員直接來現場考察。我是在三月來到那裡，實地了解島上的狀況。.....即使事前做再多的功課，面試時我也有被提醒過這份工作的一些困難。面試我的人非常詳細地跟我說明，他甚至問我知道這裡的飛機是螺旋槳飛機嗎？(PA04)

3. 收集與呈現 (Collection+Presentation)：最終決定與赴任實踐

在完成資訊評估與申請流程後，受訪者進入「決策與行動」階段。此時，資訊需求趨於具體且行動導向，受訪者開始針對最終赴任所需的行政準備與生活安排進行確認，包括簽證、住宿、交通、搬遷計畫、與當地角色的初步想像等。與前一階段相比，此階段的資訊搜尋已非為了「是否申請」，而是為了「如何實際赴任並開始新生活」。

受訪者多與地方公所（役場）進行更密切聯繫，確認工作內容、住宿安排、簽證辦理細節，並可能透過聯繫已錄取的協力隊員收集當地生活與工作經驗。此外，對於身為外籍身份者所面臨的簽證與遷居制度限制，此階段亦是具體解決的關鍵時點。例如 PA09 提及，由於疫情期間無法持觀光簽證入境，他與地方政府多次協商，最終以打工度假簽證進入日本，並暫時居住於東京，由役所安排至「東京地方特產館」（東京アンテナショップ）打工，以緩衝生活與制度限制。他表示這段過渡不僅解決生活問題，也讓他從都市角度理解地方產業，彌補了過去資訊不足帶來的不安：

關於打工度假簽證，M 町方面其實也不確定應該用哪種簽證來聘請外籍協力隊，因為過去他們只招募過日本人，沒有處理過外國人申請的案例。因此，我也上了日本交流協會的網站查詢簽證相關資訊。

當時，協力隊的規則要求隊員需從都市遷居到鄉下，這對日本人來說沒問題，但外國人原本就沒有日本的住址，因此產生了一些限制。為了符合這個條件，我選擇先用打工度假簽證赴日，再與最上町協調後續的身份轉換。為了解決住所問題，最上町方面聯絡了他們在東京認識的大學，讓我住進學校宿舍。生活費的部分，則安排我在「東京アンテナショップ」（販售地方物產的店鋪）打工，這不僅幫助了我的生活支出，也讓我從都市的角度觀察人們如何看待地方產品。某種程度上，這也像是一種實習，讓我學習到不少東西，還同時解決當時的生活費問題，這讓我安心許多。（PA09）

隨著實際赴任日期接近，受訪者也開始展開對當地生活的心理建構與文化想像。有些人在剛到任時即主動參與地方活動，顯示其從資訊搜尋轉向實際行動，進入協力隊的生活與社群互動之中：

剛到那時，我很喜歡祭典，結果我剛到的時候恰好有一個祭典，大概是十天後吧。這個祭典不大，但有很多攤位。當時我問了幾個人這個祭典的由來，結果沒有人能回答，所以我還去採訪了主辦方。（PA02）

此階段的資訊行為已由探索與比較，轉為落實與實踐，標誌著求職資訊歷程的收尾與生活轉折點。受訪者不僅完成了決策，也邁出與地方社會建立連結的第一步。

（二） 非線性的資訊行為發展與決策中的類型

透過 Kuhlthau（1991, 2004）提出的資訊搜尋歷程（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ISP）模型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六個階段——開始、選擇、探索、形成、收集與呈現——在受訪者的資訊行為與情感變化中大致可辨。然而，實務

分析顯示，實際的搜尋歷程並非完全線性展開，而是呈現跳躍、反覆與階段間交錯的動態發展，尤其在「探索」與「形成」階段尤為明顯。

1. 資訊搜尋的跳躍與反覆

受訪者的資訊搜尋過程並非完全線性，而是可能在第一階段「開始與選擇」與第二階段「探索與形成」階段之間來回切換。求職者對於工作內容、地方鄉下適應、簽證規範等關鍵資訊的不確定性較高，使得資訊搜尋行為更具有挑戰。由於資訊來源較為分散，求職者往往需要透過多種渠道，如前輩經驗、社群討論，甚至參與體驗型的經驗來填補資訊缺口。例如，PA05 發現協力隊相關資訊有限；PA01、PA02 透過參與兩地點的體驗營活動獲取更多資訊。此外，即使資訊已收集與選擇完成，部分受訪者仍可能因外部因素重新搜尋資訊；例如，PA08 則在參與兩個地點的協力隊面試後，發現其中一地較不適合，進而重新考慮適合的任職地點；而 PA10 則因面試其他地區環保相關職位沒有錄取，因此回到選擇階段重新評估其他求職機會，最終才確定申請協力隊。

在找的過程中，我認識到協力隊，就是在搜尋地方環保團體工作的時候，看到臉書廣告，裡面有一家公司在招募人員去鹿兒島縣工作。這家公司在那裡推廣回收率很高的環保項目，我對環境保護有興趣，所以就投了履歷。後來我面試了這家公司，與創辦人聊了不少，但最終面試沒上。不過，面試過程中，我對創辦人有很深的印象，並藉由他們的臉書了解到了「地方創生協力隊」這個組織的名字。（PA10）

其實當時我有兩個選擇，另一個地方是茨城縣的大洗町，我也有去參加試體驗。（PA01）

有點像以在地大學的那種感覺，我們去那邊做一些學習，做一些交流。剛好那個時候那個地方有一個協力隊的隊員然後他也來就是有點像協助吧，對然後我才說哦原來還有這樣子的一個工作這樣子然後。然後那個時候去長野縣的最南邊，叫天龍村的地方。（PA02）

2. 面試在資訊決策中的關鍵作用

根據 ISP 模型，求職者在第二階段「探索與形成」通常透過比較不同選項來決策。然而，本研究發現，在求職協力隊一職的情境下，「面試」階段成為獲取關鍵資訊的重要時機。受訪者往往在面試時才確定薪資與福利、未來將負責的工作內容等詳細資訊。例如，PA04 透過地方公所（役場）的說明會確認工

作範疇與地點後，才決定申請；PA05、PA08 在探索階段無法獲得足夠資訊，直到面試時才明確具體職務描述，並據此決策。

我曾經去過長野縣和沖繩縣的移住定住相關的招攬活動.....最後我接觸到了 O 縣的協力隊隊員，透過他我報名參加了現地考察，去了 O 縣勘查，也聽了地方政府職員的說明這裡工作的相關業務。(PA04)

去 R 町面試的時候，面試官有提到薪水，還有行動費，並且總務省會提供補助。我記得面試時有聽到這些還有跟我說請我負責奧運會場的宣傳。(PA08)

這些情境顯示，協力隊的資訊公開性仍有侷限性，求職者必須親自走訪、參與面試，才能獲取具體、可信賴的第一手資訊。

3. 資訊搜尋與決策歷程的類型

在分析受訪者的資訊搜尋歷程時，雖然多數受訪者的資訊歷程可大致對應資訊搜尋歷程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ISP) 階段 (Kuhlthau, 2004)，然而實務上顯示，實際資訊行為常出現跳躍、反覆與階段間交錯的情況，整體過程呈現出非線性與動態回饋的特性。

為進一步理解這些資訊歷程的異質性與多樣樣貌，本研究從資訊搜尋的主動程度、來源多元性與決策參與深度三個面向進行分析，歸納出三種類型：計畫導向型、機會導向型與依賴型。這些類型不僅展現不同的資訊策略選擇，也反映出個人特質、社會情境與外部條件等多重因素在資訊行為中的交互作用。

(1) 計畫導向型

計畫導向型的求職者通常對地域振興協力隊有明確的職涯目標，資訊搜尋行為具高度計畫性與主動性，能廣泛蒐集與比較多元資訊來源，並在決策過程中積極參與。

例如 PA04 長期關注地方創生議題，於求職前即參與官方辦理的體驗活動，並主動聯繫窗口了解制度細節，以確認是否符合個人預期。此類型受訪者對資訊的評估與使用具有高度意識，並能主動建立資訊網路。

(2) 機會導向型

此類型的資訊行為較具偶然性，往往是在生活事件、人際互動或參與活動中無意間得知協力隊職缺，進而開始展開搜尋行為。

例如 PA02 在朋友邀約下參與農業活動時，意外接觸到市政府的招募資訊；PA03 則是因伴侶工作的地點而被介紹至地方單位，開啟資訊搜尋歷程。儘管起點較為被動，但這類型的受訪者能迅速動員可用資源完成評估與決策，顯示出人際網路與情境觸發在資訊行為中的重要性。

(3) 依賴型

依賴型受訪者的資訊搜尋行為相對被動，主要仰賴他人建議或社群平台的簡略資訊做出決策，但也較樂觀與隨緣分。

PA05 則是在 Facebook 社團中點擊連結後即應徵，未進一步查證職務背景與制度內容，導致實際任職後與預期落差甚大，需持續修補早期資訊不足所造成的影響；PA01 也是經由教授推薦而認識該職缺，實際資訊多半靠體驗行程與第三方組織補足。此類型往往因時間壓力、資訊素養差異，形成對特定來源的高度依賴，影響後續決策的完整性與信心。

這三種類型的資訊搜尋與決策模式，不僅反映個體在資訊行為中的主動程度與策略差異，也呈現出實際求職情境中所產生的資訊能力、社會網路與制度條件交織影響著資訊獲取的方式與深度，進而形塑出多元的求職行動與決策結果。

第二節 任職協力隊中的資訊行為與互動

一、 任職中的互動場域與行為對象

協力隊員在地方任職期間，需面對多元的資訊互動場域與關係對象。根據訪談資料，協力隊員的主要工作聯繫單位包含市役所、町役場與觀光協會等地方政府與半官方組織。實際互動的對象則包括地方公所（役場）內的同事、所屬課室的負責人（役場擔當）、小組長（係長）、地方居民及在地業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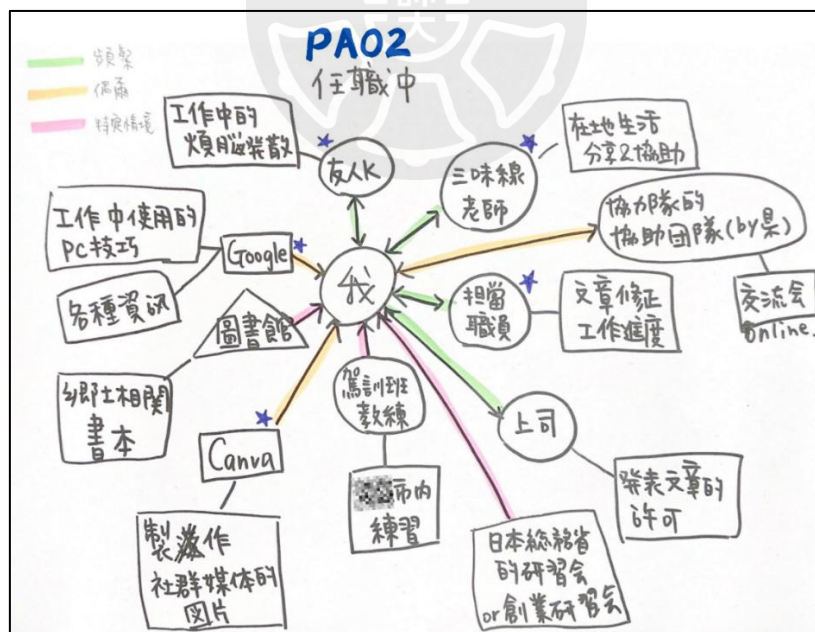
這些場域與對象共同構成協力隊員日常工作與生活中的資訊行為網路。資訊交換的過程不僅涉及行政執行上的知識傳遞與任務協調，也受到當地文化規範、語言使用方式與社會互動習慣的影響。尤其在跨文化溝通的情境下，資訊

流動的效率與品質，往往與語言能力、社會信任與身分認同有著密切關聯。

以下為 PA02 協力隊員繪製之資訊世界圖（圖 4-1），呈現其任職期間於在地工作與生活中所面對的資訊來源、互動對象與實際挑戰。其中人物以圓形表示、物品與工具以矩形表示、互動場域則以三角形表示。此圖亦反映資訊行為如何與其在地社會角色相互連動。

從圖中可見，PA02 的資訊互動對象涵蓋上司、承辦人（擔當職員）、地方協力隊支援團隊、前輩與朋友等，橫跨正式與非正式網絡；而圖書館、社群媒體製圖工具（如 Canva）與 Google 等工具則代表其自我學習與實作支援來源。此外，圖中也出現「交流會（online）」與「駕訓班」等場域，顯示隊員的資訊行為亦連結至縣市外部的交流與制度性研習空間。整體而言，此圖揭示協力隊員在制度、社群與自我發展之間穿梭的資訊行動樣貌，並反映出跨文化任職情境下，資訊互動與角色建構之間的連動性。

圖 4-1
PA02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二、 在地方行政體系中的資訊互動經驗

透過對 PA01 至 PA10 協力隊員訪談資料的質性內容分析，本研究歸納出協力隊員在地方政府、民間單位與居民社群中所經歷的資訊交換經驗與行政實務挑戰。分析結果顯示，資訊交換的過程受到行政制度與文化的深刻影響，並在

不同地區與任務配置下呈現多樣化的互動模式。將依照三類互動背景說明：

(一) 地方公所制度與行政文化對資訊流通的影響；(二) 地方協會與居民社群在資訊交換中的角色；(三) 外籍協力隊員如何因應制度脈絡調整其溝通與行動策略。本節亦將在後段統整不同案例的共通性與差異。

(一) 地方公所（役場）文化與行政制度對資訊流通的影響

地方政府的行政體系，包括申請、審核、批准等流程，以及決策權限的分布，深刻影響著協力隊在與政府部門或其他單位互動時的資訊流通與溝通效率。受訪者多指出，地方政府常見的層級化管理與冗長決策機制，導致資訊交換延宕，進而阻礙計畫推動與預算管理。多位受訪者（PA01、PA02、PA06、PA07、PA09）指出，役場內部層級繁多、決策流程緩慢，資訊往返效率低落，進而影響協力隊工作進程。

很多事情都需要按照特定流程走，像是預算的使用方式啊，這是我一開始沒想到的困難點。（PA09）

PA02 指出，在社群媒體經營上，需經多重審核與報備，使原本應具有彈性的內容推廣過程變得僵化。PA06 亦提到役場偏好紙本文書，顯示行政文化對科技與效率的低接納度，增加了日常工作的溝通成本。

還有一個困難是 G 市公所的文化。我不是說我負責（社群媒體）發文嗎？每篇內容都需要經過審核。文章需要經過役所的人確認，確認後大家蓋章才能投上去。因為我現在都是用日文宣傳，所以日文內容的修改也是有我的擔當（負責人）會去確認。（PA02）

這裡效率真的很低，日本很多東西還是紙本的。像是當我請隔壁同事幫我檢查文件，若是日文內容比較長的時候，臺灣的話一般都是 email 文件，但他就告訴我：「你幫我把文件印出來，我來看。」我當時心想：「你就在我旁邊而已...」後來也就習慣了。（PA06）

PA02、PA06、PA07 的訪談道出，協力隊員在地方的經費運用受到嚴格制度規範。PA02 說明預算申請需提前數月準備，並附詳細資料與表格；PA06 則指出即便是小額經費也須事前申請與報備，顯示財務程序的制式化；PA07 補充說明，工作計劃抽象與預算審核具不確定性，常造成協力隊與役場所屬單位間的摩擦。

想要有預算，就必須要提供所有詳細資料，包含你希望花的錢是多少，分配到哪些項目，需要先索取報價，還要填寫固定的表格來提案。.....這些都需要經過財政部門的確認。通常在每年的四月開始新年度，如果想要新的預算，就要在前一年的七月左右開始提出相關資料，最遲八月底前必須提交。去年我也提出了一個活動的預算申請，我的擔當也很努力地幫忙寫這些資料並提交。（PA02）

其他協力隊在使用經費上比較自由。比如說，我如果想買一些小東西，之前我可以先付錢，再拿收據來報銷。現在則變得比較嚴格了，必須提前至少三天申請購買的物品，然後會先給我錢去買。如果有多出來的錢，我需要再寫一張單子，說明為何會有多餘的錢，然後把多出來的錢還給財務部。如果少了錢，則需要再次申請。（PA06）

我的工作內容比較抽象，像是需要先確定明年的工作計劃和預算，但預算不一定會通過，且活動內容不易具體化，這讓我在經費申請時感到困難。有些隊員也因為這些原因，與公家單位之間會有不愉快的摩擦。（PA07）

PA04 則談到在跨國貨幣處理上，因役場所屬單位過去無類似經驗，導致處理流程歷時一至兩個月，顯示地方行政在面對非常規事務時應變能力不足。

當時剛好回去臺灣參加 H 市的活動，並順便帶了一些臺灣的商品回來.....但當時匯兌方面有些問題，因為他們之前沒處理過這種事，所以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核算台幣。結果這部分需要溝通很久。匯兌的處理花了大約一到兩個月，這本來不是我應該要負責的問題。但我早早就提醒過他們這會是問題，兩三個月前就跟他們說過這些可能會發生的問題，並提供了幾種解決方法。如果會計上沒問題，我就可以去買東西。因為我也不想自己買的東西最後變成公家的東西，結果自己卻拿不到核銷的錢。當時我就已經確定了才去買，結果回來後還是遇到了這些小困難。這些都是很小的問題，但還是被迫處理不該由我處理的瑣事，這讓我感到無奈又有點委屈。（PA04）

以及 PA01 曾申請提前離職，但因薪資預算已事先編列而遭拒，顯示協力隊的契約與人事安排亦受限於地方政府財政管理。

其實我原本想提早辭職，但他們拒絕了，所以我就...好吧（笑），繼續留下來。.....因為他們（職員）將年度預算都編列好了，如果我提前辭職，我不僅需要將剩下的幾個月薪水退回，還會因為預算縮減而讓總務省（中央政府）認為 I 縣不再需要這麼多預算，這樣他們未來得不到太多預算。（PA01）

PA07 與 PA09 指出，日本行政文化的層級制度與程序導向，使協力隊在資訊交換與決策推進上遭遇制度性限制。

雖然現在也在慢慢改變，但日本的行政效率並沒有像臺灣那麼高。臺灣現在很多事情可以線上申請，甚至連文件都可以線上申請並印出來，但在日本，很多文件仍然需要親自跑到區公所處理。雖然他們也在推進線上化，但推的很慢。即便他們換了一些流程，還是有很多事情要親自到場辦，特別是公家機關或銀行，辦理一些事還是需要親自排隊，抽空去辦。這些在臺灣的話，早就被罵爆。.....然後，審核（預算）後他們會告訴你沒經費，等於是白跑了一趟。臺灣人的話就會覺得「你在跟我開玩笑？」前面的努力都白費了。（PA07）

但是日本的話是遇到狀況，上面沒有下達指令，下面的人就等死。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覺得很大的台日職場差異.....我那時候也是剛來（日本）沒多久，所以我的做事方式還是手跟腳都有一顆大腦（臺灣人方式）。所以那時候在這個組織裡面覺得有點...就是「啊～還需要跟他講，我會覺得怎麼那麼麻煩...」然後一個來往我就是，明明在臺灣就是我把計畫書提供出去就好，就可以自己做事，可是他們要這樣一層一層呈報上去，再一層一層呈報下來，那個一來一回的時間就花很多。.....我總歸一句話，可能就是臺灣跟日本的做事方式不同，是我當初任期期間工作中遇到的第一個讓我比較需要克服的一個課題。（PA09）

PA07 更形容自己在地方工作中宛如「夾心餅乾」，需在中央議會、地方公所（役場）與町民之間權衡與調整，角色處境模糊且承擔多重壓力。

雖然我們是契約制的半公務員，但我們的每一項活動和行為都會受到監督。像是每年有議會審查，我們的工作和預算也會受到審查。這使得我們在做任何事情時，都要考量到中央議會、地方役場和町民三方的關係，這樣的角色其實有點像夾心餅乾，在中間被夾著，不知道要聽誰的話好。（PA07）

然而，也有部分受訪者（PA03、PA04、PA08、PA10）提及所屬役場所持彈性與開放態度，對協力隊提出的計畫與預算大多能迅速核准，顯示地方行政文化存在差異。

由於我在做觀光推廣，前輩們不會干涉我做什麼，只要我提出預算和企劃，基本上都可以進行。所以這很看當地的需求，因為即使經費由總務省撥款，但各町可決定分配的預算。（PA03）

我們這個單位其實運作比較鬆。像去年我主導的臺灣祭，經費的估算和審批也很快。.....今年要辦的臺灣祭，也是町役所那邊會全額支援，因為他們有這個預算。.....而且我們單位運作很自由，經費只要沒太大差異，基本上都會同意。（PA04）

我的情況算是比較幸運吧。每年一月左右，他們會問我：「明年有什麼計畫嗎？」如果沒有特別的打算，就會照例年那樣編列預算給我。像是拍攝

的經費等等。如果我需要使用這些預算，只要提出請款即可。至於預算的使用，我需要先自己計劃一下，寫出大概的項目和費用預算，然後跟他們溝通確認。他們如果覺得可行，就會說「ok 啊 ok 啊」，然後就照這樣安排。（PA08）

但現在在市役所，變成我得自己找事情做。剛進來的時候，我問他們這裡有外國人嗎？他們說市役所裡沒有外國人，我就問那住在這裡的外國人怎麼樣。U 市的人口大約只有兩萬七，人口其實不多。他們說路上會看到外國人，但沒有什麼交流。我提議：「那我們可以辦個活動讓大家認識一下嗎？」他們一口答應我辦一個活動，讓大家有機會認識彼此。我就開始用經費辦活動，邀請外國人和日本人一起來 U 市認識對方。（PA10）

1. 變化趨勢

協力隊員在初期對日本地方公所（役場）的行政文化與決策流程多不熟悉，推動企劃時常遭遇冗長的程序、責任歸屬不清與溝通障礙，造成資訊傳遞效率低落，甚至影響計畫的順利執行。原先預期協力隊能靈活推動地方創生，然而實際運作中，行政層級制度與預算規範成為資訊流通與自主決策的主要限制，對計畫落實產生明顯影響。

隨著服務時間增長，協力隊員逐漸熟悉役場內部的結構與行政方式，開始學習選擇合適的窗口與時機提出建議，並以更貼近「內部人」的方式融入行政體系。一些隊員亦善用役場作為中介平臺，連結地方資源、促進協調，進而提升資訊交換的效率與精準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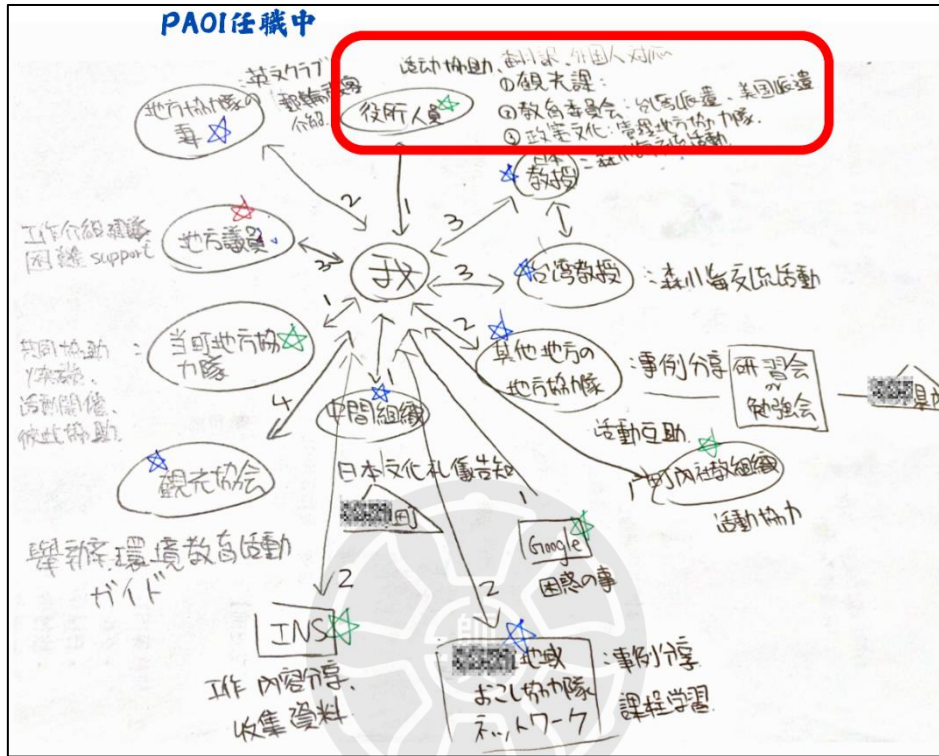
本研究觀察到，多數協力隊員由初期的被動適應，逐步發展出策略性的配合模式與主動行動的能力，使資訊交換過程變得更具彈性與可行性。整體而言，協力隊的行政支援程度與行動自由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當地地方公所（役場）的行政文化與運作方式。

2. 資訊世界圖任職中的呈現

PA01 表示，其所屬市役所對協力隊的工作給予其自主性，鼓勵自由發揮與企劃活動（圖 4-2）。故在三年的任職期間，PA01 主動提出並舉辦多場活動，與市役所內各單位交流頻繁，資訊交換內容涵蓋觀光推廣、地方教育、文化資源整合等領域。其繪製的資訊世界圖條列出如觀光課、教育委員會、政策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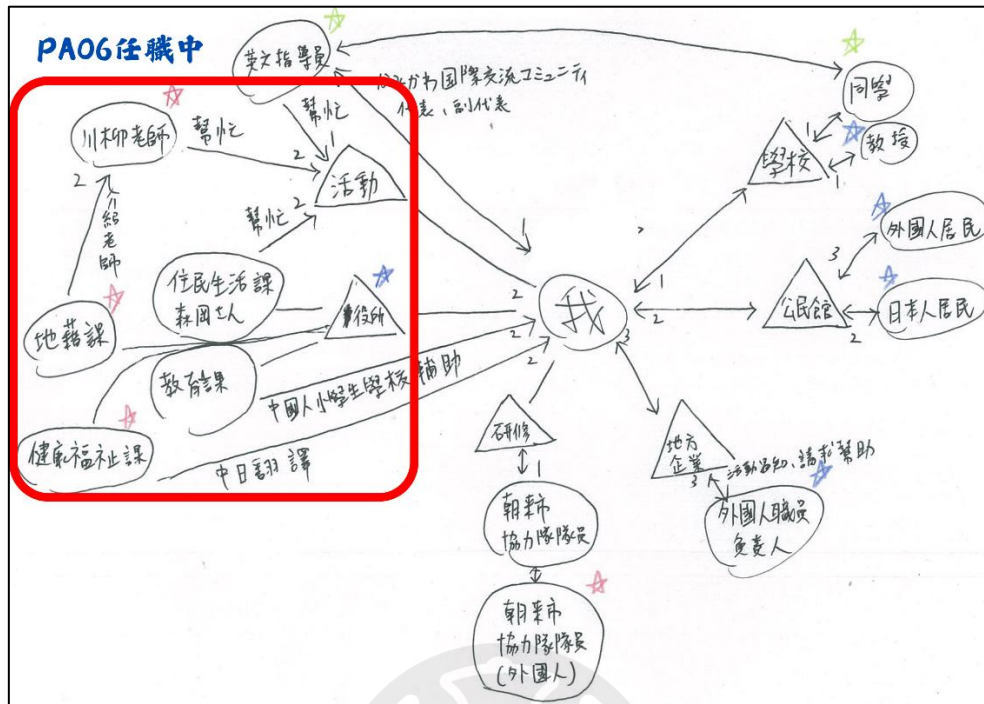
課等部門，並標示各單位提供支援的具體內容，例如提供場地協助、協辦活動、或媒合社區資源等，顯示其角色已深度嵌入地方行政體系中。

圖 4-2
PA01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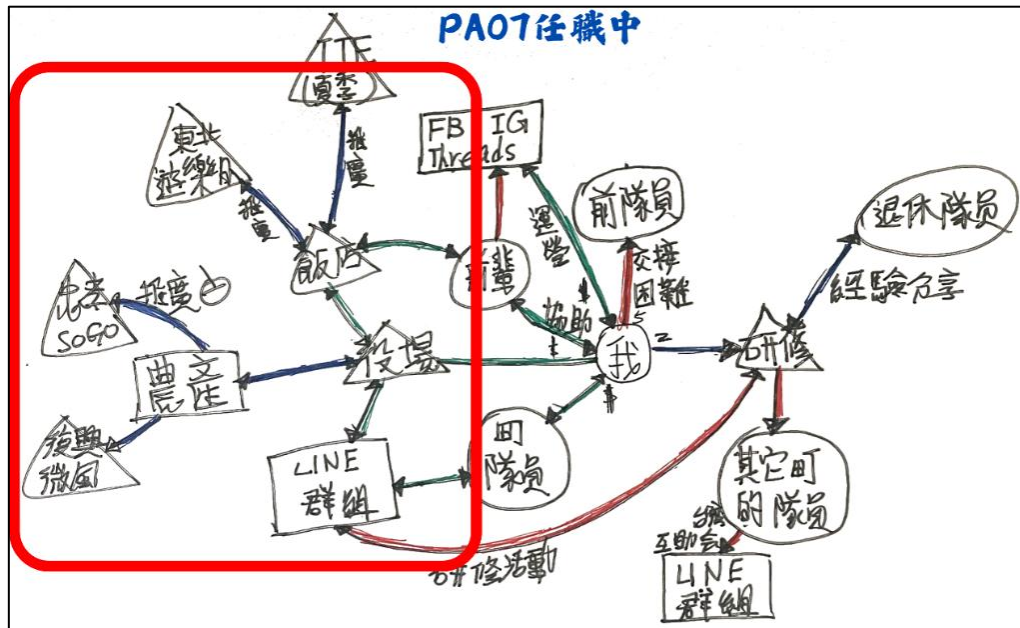
PA06 與 PA01 同樣屬於需要頻繁舉辦活動的協力隊員角色，其繪圖（圖 4-3）顯示與町役場各課室有密切互動，並延伸出與多個在地部門的合作關係，例如住民生活課、教育課、地籍課、健康福祉課等。圖中詳細標示出與這些單位的資訊交換歷程，例如透過住民生活課邀請社區成員參與活動，或由地籍課介紹當地川柳老師，協助其舉辦文學活動。這些資訊世界圖上的標註不僅顯示其資訊流通的節點，也反映出 PA06 透過人脈串連，將地方資源整合進自身企劃中的操作。

圖 4-3
PA06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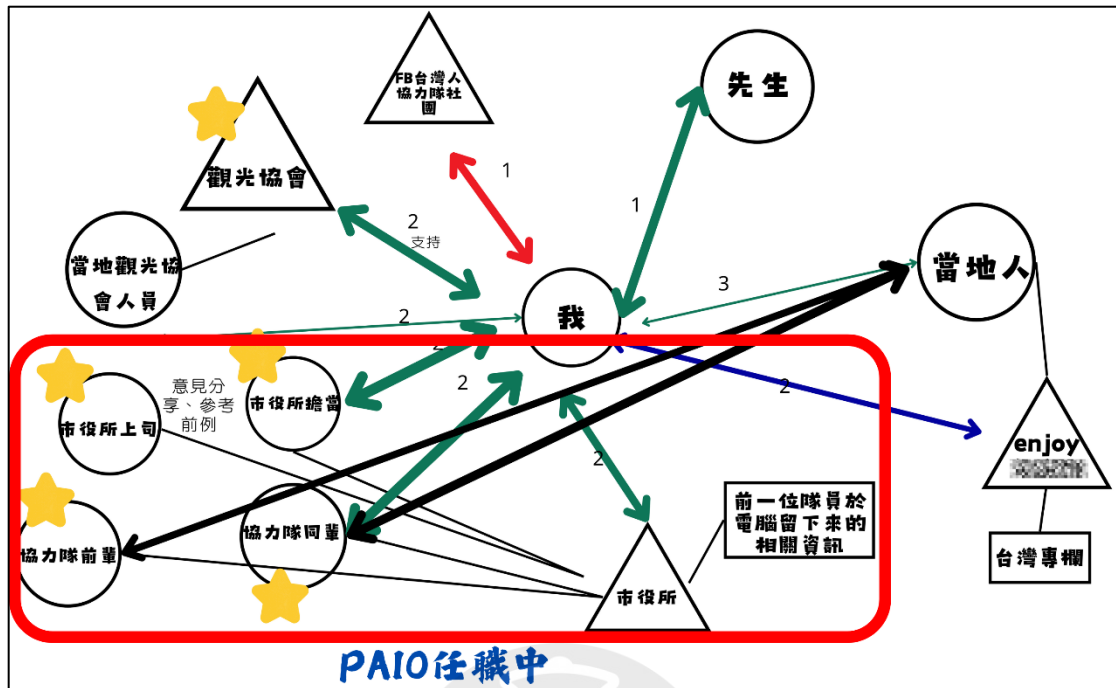
PA07 的隸屬單位是 10 位受訪者中相當特殊的，其主要任務並非舉辦居民交流活動，而是被派駐至町出資設立的飯店，負責公關與行銷工作。其資訊世界圖（圖 4-4）明確描繪出飯店與町役場之間的連結，同時顯示其工作內容偏向對外輸出，例如參加各地展覽、推廣町的農產品至臺灣百貨的日本展。資訊交換主要集中在外部行銷與 A 町農產品牌建立層面，反映出其資訊網路更偏重於向外的串聯，而非地方內部的交流活動。

圖 4-4
PA07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PA10 則與 PA01、PA06 同屬可自由發揮型的協力隊員，其資訊世界圖（圖 4-5）由市役所延伸出多條人脈連結線，標示出與協力隊前輩、同期隊員、上司、擔當（即單位內的負責人）之間的資訊流動與合作關係。圖中也出現許多與組織互動記錄的線條，顯示 PA10 擅於透過經驗分享、案例諮詢與意見交換等方式，主動尋求地方公所（役場）單位的合作資源並調整自身策略，形成一套具有彈性且多元來源的資訊獲取機制。

圖 4-5
PA10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PA09 則屬於 M 町中工作職責明確的協力隊員，負責臺日雙方國際交流協會之間的聯繫與交流任務。其任職中的資訊世界圖（圖 4-6 左）多以三角形符號——地點為主要呈現方式，如：M 町役場、當地交流協會，以及臺灣方面的交流協會。繪圖中呈現 PA09 主要扮演橋樑角色，資訊交換的內容集中在資料彙整、訊息轉達等事務性任務。例如，負責將日方政策或活動資訊整理後清楚轉達給臺方，也協助將臺灣方面的需求與建議準確回報至 M 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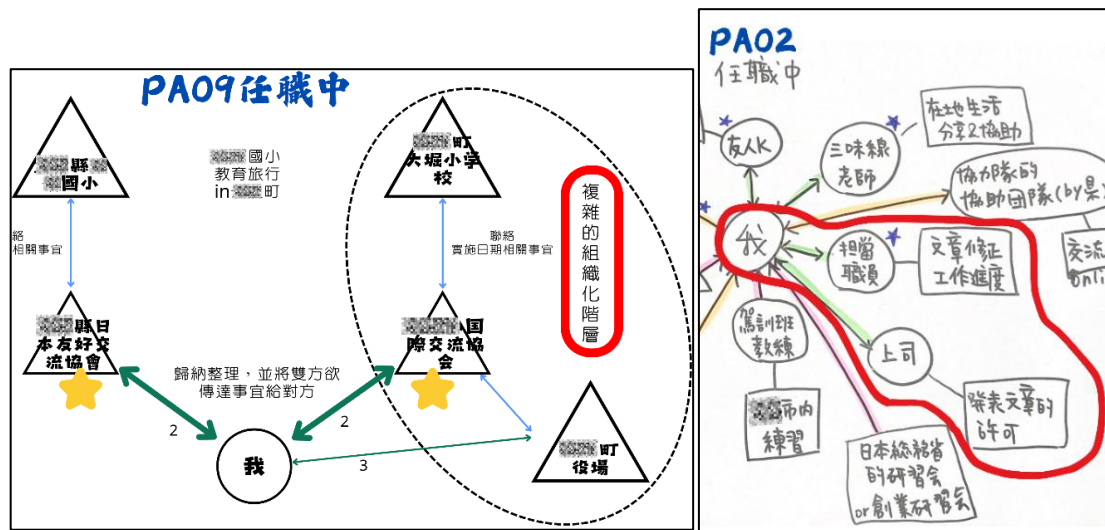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PA09 在訪談中多次強調 M 町役場內部的階層化，組織結構明確且決策流程較為嚴謹，這使得即使只是單純的資訊確認或簡單的業務討論，也往往需要較長的溝通與審批時間。這樣的制度性特徵，對於擔任中介溝通角色的 PA09 而言，是資訊流通上最大的挑戰之一，也限制了其在處理突發或臨時需求時的應變空間。

類似的制度現象也出現在 PA02 的經驗中。其資訊世界圖（圖 4-6 右）明確描繪出發文審核的機制，如：需將撰寫好的文章先請「擔當」（即單位內的負責人）協助修正，接著再提交給上級主管核可才能發佈。這樣層層把關的階層化流程，也反映出地方公所（役場）在資訊控管上的嚴謹態度，進一步強化了

制度結構對資訊交換的規訓與限制。

圖 4-6

PA09 與 PA02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綜觀上述，資訊世界圖揭示協力隊員在不同任地、工作內容與行政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資訊交換模式。PA01、PA06、PA10 等具活動發起能力者，其圖像多呈現由自身向外延伸的人脈與資源網路，展現主動性與行動彈性；而 PA02、PA09 等負責特定任務的隊員，其圖像多表現出由上而下的行政流程，雖亦存在雙向互動，但資訊交換受制度框架明顯約束。

這樣的觀察結果與本研究透過資訊世界圖與訪談結果的對照，發現協力隊員多於初期面臨層級制度、資訊不透明與行政流程制約，但隨著對地方行政文化的理解加深，逐步發展出策略行動方式，如建立信任關係、運用中介資源等，以提升資訊獲取與交換的效率。資訊世界圖的圖像輔助，不僅呈現出協力隊員在制度環境中的操作方式，也揭示地方組織文化如何實質影響其資訊行動與人際互動策略。

(二) 地方協會與居民社群在資訊交換中的角色

相較於地方公所（役場）的正式行政體系，協力隊員在實務工作中，往往更依賴與在地居民、朋友、商店、小型組織等所構成的「非正式網路」，獲取在地知識、彈性資源與人脈連結。這些非正式資訊交換路徑，不僅補足了役場制度僵化的限制，也在地方融入與角色認同建構中發揮關鍵作用。

地方觀光協會或商店街自治會等「半正式／半民間」的組織，雖不屬於公部門，卻常是協力隊推動活動的重要窗口。部分隊員的任務即與這些組織密切相關，如協助地方觀光協會企劃行程、撰寫旅遊文案、採訪店家、製作網站與宣傳海報等。然而，這些組織的開放程度與合作意願差異甚大，直接影響資訊流通與任務推動的順利與否。PA01 提到，地方觀光協會對於新提案普遍抱持保留態度，認為現有的觀光景點已具知名度，無需再進一步開拓，造成隊員推動新活動的困難。PA02 也提到，地方觀光協會對前所未有的企劃案採取謹慎態度，使計畫難以推進。PA01 與 PA08 在推動觀光推廣活動時也發現，協會對外來者存有戒心，需投入更多時間與精力建立人際信任，才能進一步促進資訊交流。

觀光協會的態度讓我覺得他們不太願意做新的嘗試。這裡有個知名觀光景點——R，他們（職員）的想法就是：「我們有 R 就夠了，不需要再多做什麼。」他們的心態是：「過去這樣就可以了，為什麼現在不行？」如果有新的提案，他們的第一反應幾乎都是否定：「喔，不需要啦，我們不用做這個吧。」之前有個第三方組織的人提醒我，說這邊的人可能不太願意接受新事物，但當時我還覺得「應該沒那麼誇張吧？」結果後來發現，他真的沒誇張……（苦笑）。（PA01）

.....那時候我想邀請臺灣的人來參加短期觀光的新企劃，大約一個禮拜。計畫是讓他們在這裡進行一些宣傳工作，期間進行拍攝，這些素材可以用來做宣傳。因為做從來沒做過的企劃幾乎不可能順利實行，G 市協會怎麼講偏保守，他們認為實施的可能性不大，沒被認可，（我的企劃）就夭折了。（PA02）

文化衝擊也是一大挑戰。在日本鄉下，很多事情是靠「刷臉」（建立人脈）來推動的。就算你願意出錢，協會還不一定會鳥你，因為這裡的協會在乎對我熟不熟。像是我在第三年時舉辦了一場大活動，與臺灣的教授合作，帶了一個 15 人的團來這裡進行環境教育相關的行程，環繞岩手縣一圈。如果我前面兩年沒在這裡工作，沒建立關係，這個計畫根本不可能成行...因為協會已經習慣了我的存在，對我的企劃也比較放心，所以才願意讓我來主導這些活動。（PA01）

溝通非常困難。以我提到的桌遊和解謎遊戲為例，這些在 R 町協會可能對當地來說太新穎了。比如，要辦桌遊活動，我就得先跟他們（協會職員）解釋什麼是桌遊；同樣，解謎遊戲也要花時間解釋到底是什麼。這一開始的溝通就變得比較繁瑣。而且，因為這些活動是我自己提出來的，所以還需要向他們說明做這些活動的好處是什麼，讓他們理解為什麼這些活動能夠吸引人，能夠對當地有正面影響。（PA08）

相對地，也有部分隊員遇到合作意願高、運作彈性的協會。PA04 所屬地區在協力隊進駐初期即明確設定任務為促進臺日觀光交流，因此在活動推動上，能快速取得認可、人力與資源支援，顯示地方組織的態度與結構設計對資訊流動具有決定性上的影響。PA10 也指出，觀光協會不僅提供資訊協助，還給予 PA10 創業過程中的心理支持，協助其順利適應當地生活與工作。

役場的人會很積極處理這件事，因為他們最想辦的就是這個臺灣祭。因為我之前有辦過相關活動的經驗，所以當役場找我過來後，他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辦臺灣祭。因為這是他們自己很想辦的活動，所以他們也很主動處理這件事。（PA04）

觀光協會給我的支持，除了提供資訊，更多的是心靈上的支援。他們鼓勵我：“加油！要開店了！”此外，如果我開店，觀光協會也會幫我宣傳。……還有和我同輩的交流分享。……U 市役所會除了用經費讓我和同輩去東京學泡茶，還提供創業諮詢。（PA10）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隊員在任職前便透過地方中介角色、參與體驗活動或碩士研究建立初步人脈，對任職後資訊交換產生積極效果。例如 PA01 在任職前便獲得一位中介角色協助，在任職後持續提供建議與支持；PA02 與 PA03 皆參與過任職前的在地活動，認為這些體驗有助於工作初期獲取資訊並理解地方特性。

不過，對我幫助最大的是 I 町裡有一個專門負責對接地方協力隊的第三方中介組織。（PA01）

在人際網路方面，協力隊若無在地人脈，難以推動需要地方資源的活動。部分隊員（如 PA05、PA07）需透過地方公所的安排與協助，方能與地方旅行者或飯店建立合作關係。這些例子顯示，即便非正式網路具有彈性，仍需藉由地方組織的中介角色開啟合作機會。

這是役場他們的想法，讓我跟地方的兩家旅行社合作，但因為我的身分不能賣商品，所以他們希望我能到旅行社去實習。（PA05）

所以雖然我是在飯店工作，但這家飯店背後的社長其實是我們的副町長。它有點像是一個辦公營半私營的飯店，類似於一個特殊的公家單位。（PA07）

部分協力隊員（PA02、PA03、PA06）在任職前即與地方建立初步人脈，也對資訊交換產生積極效果。PA02 與 PA03 曾於任職前參與在地體驗活動，PA06 則因碩士研究多次造訪該地，皆表示先前的接觸使其更容易獲得工作所需資訊。PA08 則屬於「主動型」隊員，透過自行接洽旅遊業者、當地學生、居民，甚至邀請臺灣旅日 Youtuber 合作，展現其資訊網路的多元與拓展能力。

如果沒有老師和這些同事的交流，其實會感到很孤獨。因為役場職員不一定會特別照顧我，他們可能會覺得有我有認識的老師可以幫忙，那就讓老師來處理。工作時間之外其實大家很少有私人交流，工作上會問他們一些問題，比如當地怎麼樣，但有時候即使是當地人也不太清楚。剛到那時，我很喜歡祭典，結果我剛到的時候恰好有一個祭典，大概是十天後吧。這個祭典不大，但有很多攤位。當時我問了當地人的役場職員們這個祭典的由來，結果沒有人能回答我，所以我還去採訪了主辦方（笑）。（PA02）

像我就是有從老師、同學和學長那裡獲得幫助。至於大學時期來這邊做過實習的同事，因為人員流動很大，大家可能會換工作，流動後我還會跟他們保持聯繫。如果遇到困難，還是會請他們幫忙，這樣的情況不少。（PA06）

後來，我就找了一個專門從事旅遊相關業務的業者來進行合作，並和他們討論後，我提出了想做一個與實境解謎遊戲有關的旅遊活動。這位業者聽了之後說，如果我真的有這個想法，可以試試看。他們甚至願意在他們的平台上示範一次販售這個活動。最後，這位旅遊業者幫我找到了更多可能的合作夥伴來支持這個企劃。（PA06）

其他的情況大多是我自己利用町的宣傳平台找人來參加，但通常效果不會很好。其中有一個比較大的活動是，在奧運結束一年後，也就是 2022 年，R 町觀光協會想要舉辦一個讓市民感到榮耀與自豪的活動。這個活動的企劃全部交給我來主導.....我最終自己找了當地美術社的高中生一起設計一個 RPG 大地遊戲的活動，設計了一些任務讓參加者去完成，還有提供食物作為獎勵，這樣的互動方式讓活動變得更有意思和吸引人當地人來參加。（PA06）

1. 變化趨勢

協力隊在任職初期，對當地的非正式人際網路大多不熟悉，無論是地方協會、居民間的資訊流動方式，都需時間摸索與理解。許多隊員起初仰賴地方公所提供的正式管道推動工作，但在實務操作中，逐漸意識到地方計畫的順利與否，往往更取決於能否建立起信任的人際關係與非正式的資訊通道。

隨著服務時間的增長，隊員逐步發展出更靈活的互動策略。例如，一些隊員在參與地方活動、社團或與鄰里交流過程中，累積人脈、熟悉地方的行事風格與潛規則，進而能夠在角色上從「外來者」轉變為被信任的合作對象。這種變化不僅讓資訊交換更為順暢，也有助於隊員在地方社會中取得更多行動空間與資源支持。此外，部分隊員也從初期對地方協會的依賴，逐漸轉向「策略地配合」與「多元路徑開發」。例如，在觀光推廣上，一些隊員會同時與協會、在地店家、甚至個別居民建立資訊交換網路，以補足協會保守或不配合的情況。這樣的轉向反映出隊員不再只是單方面接受地方既有的規則與文化，而是學習如何「在體制外找路徑」、「在關係中找資源」，展現出更多主動與地方適應力。

總體上，協力隊與非正式網路的互動，呈現出一段從探索—挫折—理解—融合的歷程，揭示了資訊交換的多重樣貌與角色認同的轉變：隊員不再只是外部工作者，而是逐步成為可以被地方信任與倚賴的資訊節點與合作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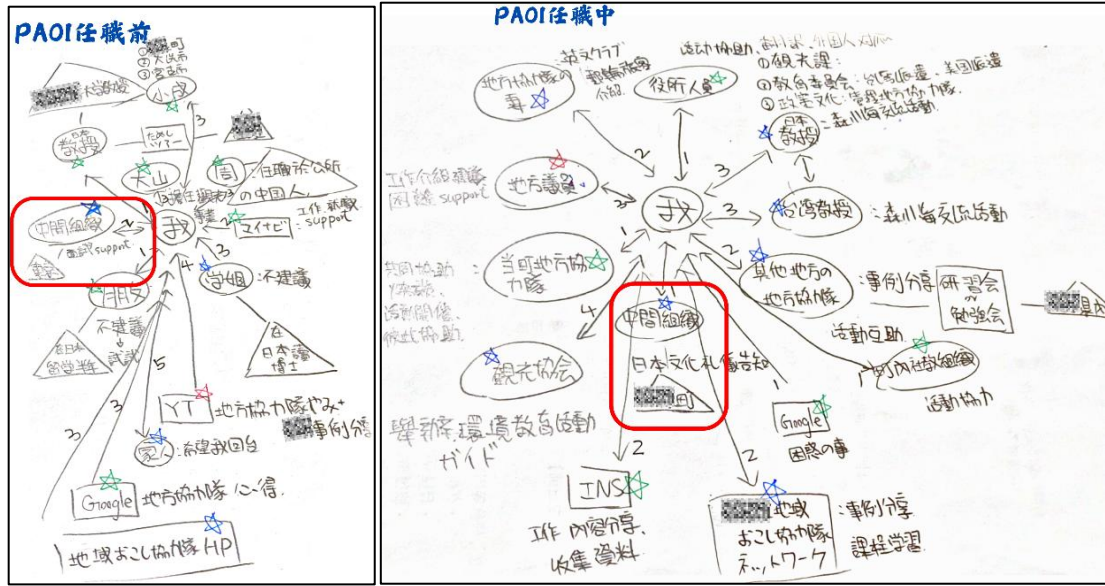
2. 資訊世界圖任職中的呈現

協力隊員的資訊交換網路在任職初期往往有限，但隨著時間推進，透過與在地人建立連結、參與活動與累積互動經驗，其人際網路逐步擴展並深化，進而使資訊流通更為順暢。這樣的過程在各受訪者繪製的「資訊世界圖」中均有具體呈現，顯示出協力隊員如何從初始的外來者逐步轉變為能夠連結在地資源的中介者。

PA01 在任職中期提到（圖 4-7 右），雖然初期辦活動時遭遇諸多挑戰，但歷經兩年的人脈耕耘後，其資訊網路逐漸成熟。例如與當地觀光協會合作推動環境教育活動、定期於I町的社交場所與其他地方協力隊員交流經驗，並與居民朋友合力籌辦英文會話教室，顯示其已能整合多元資訊來源與人力資源。值得一提的是，PA01 任職前（圖 4-7 左）即參與過試體驗活動，並在東京都研究所就讀期間與地方中間組織建立初步關係，該組織在任職前協助其面試準備，在任職後則提供有關日本職場文化與工作實務的建議。這位中間者角色在其資訊世界圖中從任職前延伸至任職中，成為穩定且持續的資訊支持來源。

圖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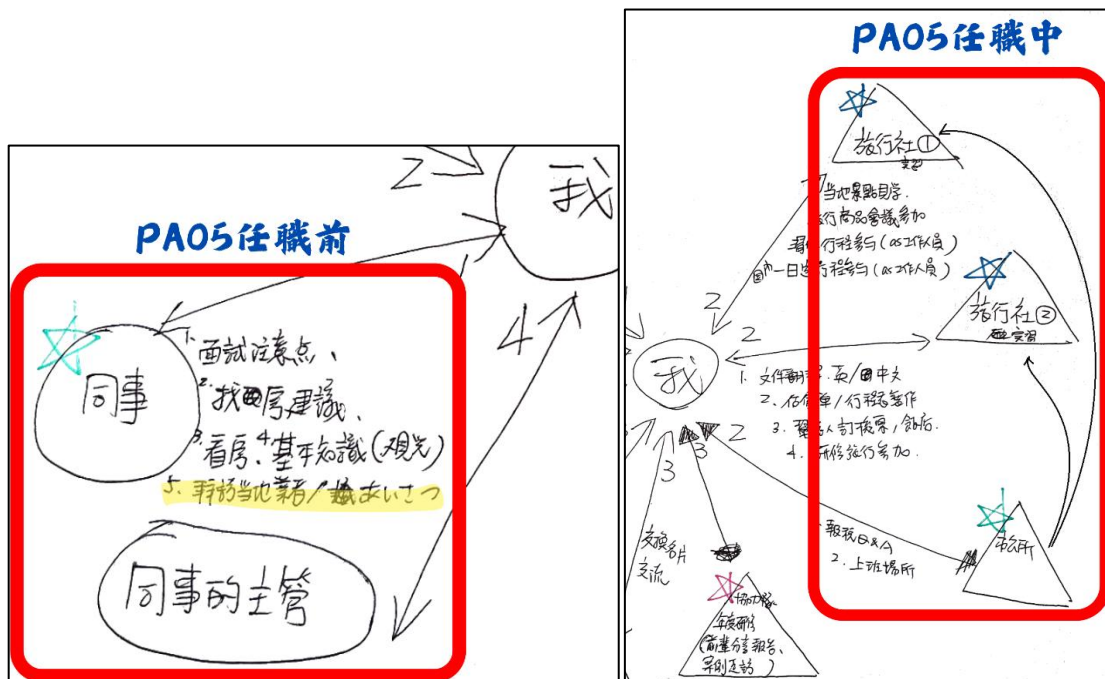
PA01 任職前/中資訊世界圖



PA05 (圖 4-8 左) 則強調其人際網路的建立始於任職前的「打招呼 (あいさつ) 行程」(黃色螢光筆標記部分)，在市役所主管與同事的陪同下，拜訪了當地多家業者與旅行社，不僅為其後的工作鋪路，也強化了與地方的情感連結。這些關係在任職後繼續發展，成為協助其推動實習企劃的重要後盾。

圖 4-8

PA05 任職前/中資訊世界圖



PA02 與 PA03 (圖 4-9) 皆參與過任職前的短期實地體驗——PA02 參與兩天一夜的試體驗活動，PA03 則完成為期 16 天的實習 (與後來的任職場域相同)。這些體驗使兩人提前與在地人建立連結，進而形成跨越任職前後的穩定人脈網路。PA02 的資訊世界圖中，包括任職前結識的朋友 K、三味線老師與農家等人，均在任職後持續提供資訊與協助，使其在面對地方文化與工作挑戰時感到較為安心與熟悉。PA03 (圖 4-10) 則特別強調，任職前的 16 天實習期間感受到職場同事的親切與接納，是其決定赴任的關鍵因素之一，後續包括實習時期的同事、好朋友與男朋友都成為任職中階段的重要支持者。

圖 4-9
PA02 任職前/中資訊世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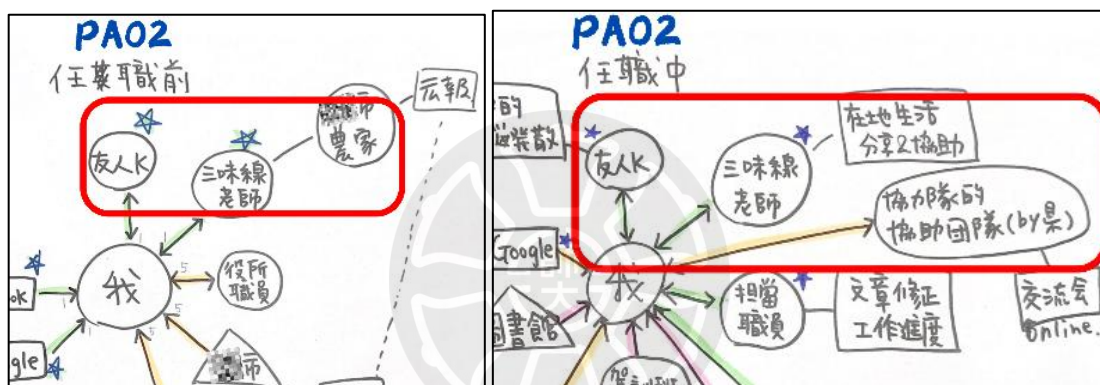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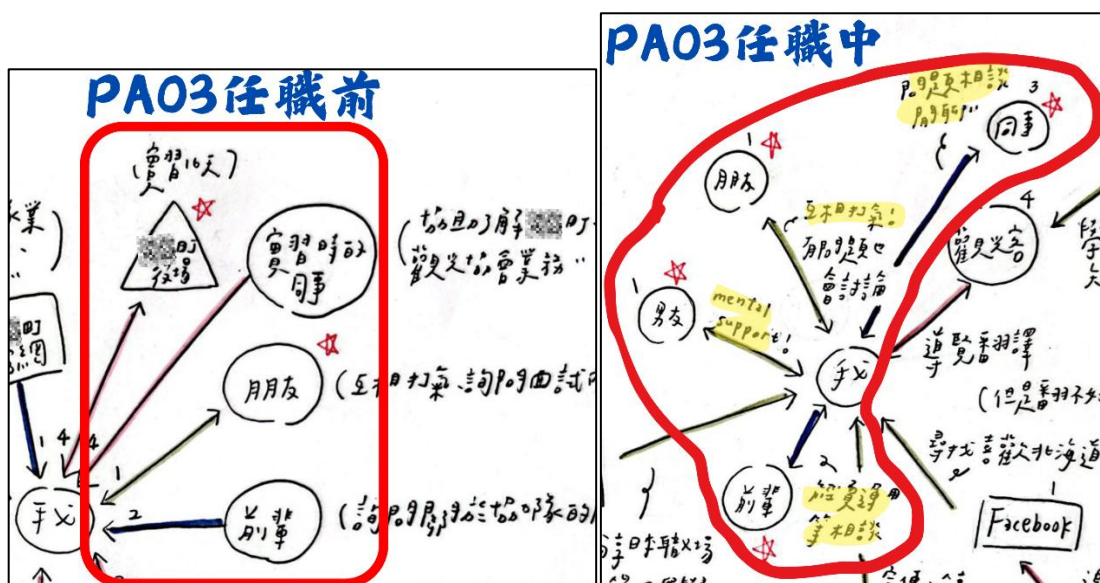


圖 4-10
PA03 任職前/中資訊世界圖



方「內部合作者」的過程，也說明了「資訊交換」如何伴隨「角色認同」與「地方融入」的深化而轉化。

(三) 外籍協力隊員如何因應制度脈絡調整其溝通與行動策略

外籍協力隊員在任職期間面對的不僅是語言與文化差異，更關鍵的是如何進入地方的人際網路，建立信任關係，以有效進行資訊交換。這些挑戰不只是語言上的障礙，更牽涉到地方對外來者的接納程度、專業信任與社會文化適應等層面因素。

受訪者指出，即便自身具備一定的語言能力與工作熱忱，若未能建立起地方社群的信任關係，資訊的獲取與工作推動仍常面臨限制。例如，PA01 觀察到一位語言能力優秀的中國籍臨時職員，其專業能力並未被有效運用，使他產生對自己未來參與度的疑慮，顯示地方組織對外國人專業價值的認知偏差，進一步削弱了資訊交換的信任基礎。

第五個是「專業能力不被重視」的感覺。像是有看過有一位臨時聘僱的中國人，他會講五種語言，但卻沒有被好好運用。我看到這點就覺得：「那我應該也不會被特別重視吧？」（PA01）

部分受訪者則指出，即使能適應日常工作內容，地方文化中深層的人際信任機制仍是一道門檻，資訊流通往往需要時間的積累才能建立。PA03 強調，地方人際關係的建立是一種漸進式影響的過程，困難是環環相扣的，對人際關係的資訊交換具有影響。PA06 則表示，初期因缺乏在地專業知識與語言熟練度，確實對翻譯與資訊理解造成困難，但透過與同事討論、主動查詢相關資料，他逐步克服挑戰，減少因語言與知識差距所造成的誤解。

我覺得主要的困難有三個：專業知識不足、語言障礙，以及與人互動。首先說專業知識不足，這方面問題比較大。因為我們這裡主要的觀光地點是森林和河川，尤其是森林，經常需要和前輩一起進去森林，然後他們會進行導覽，我負責翻譯。但有時候，由於缺乏專業知識，我無法理解森林相關的專業內容，這樣就無法進行翻譯。專業知識的不足也影響語言障礙，因為如果我沒有相關背景知識，難以跟別人開啟話題，這樣溝通就會有困難。至於日常工作對話，沒什麼大問題，但如果想和來觀光的人交流介紹，缺乏專業知識會造成語言障礙，進而影響與人的互動。（PA03）

知識不足和語言障礙其實還好，沒有那麼嚴重。知識不足的時候，一開始我會和我的同學討論要做什麼事情。第一年時，他會讓我上我們町的資料室看看有沒有別的先例。（PA06）

在語言方面，PA05 指出，雖然仍有用語錯誤或不夠流利的情況，但同事對其外國人身份具有理解與包容，願意主動提供資訊與協助，降低溝通的障礙。PA09 也認為，地方方言雖使日常對話變得更耗時，但透過反覆確認與練習，最終仍能完成工作，顯示地方語言文化主要影響的是資訊交換的時間成本，而非工作成效本身。

對我來說，我還是覺得語言是有點卡卡的問題。還有文化差異也是一個問題。如果列出來的話，專業知識其實不會是困擾我，畢竟我是外國人，我能做到的事情，他們也會盡力給我資訊或告訴我怎麼做。（PA05）

說真的我覺得說在工作的場所確實啊他們工作一下講很快的時候就自然變成方言。但頂多就說：「啊對不起，可不會麻煩你再講一次，我聽不太懂。」只能這樣子，所以在溝通的過程中，嗯是會比平常更花時間但是不會影響到結果。（PA09）

另一方面，有些協力隊員則將外國人身份視為資源，主動運用文化差異來促進交流。例如，PA10 在地方刊物中撰寫介紹臺灣文化的專欄，試圖讓當地居民了解其母國背景，同時也藉此推廣地方特色至外部社群。他認為，資訊交流應是一種雙向互動，唯有讓地方居民也理解外來者的文化與視角，才能建立更穩固的互信基礎。

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因為我的職位是經營社群媒體，負責宣傳。在介紹 U 市的同時，讓其他人認識 U 市，也希望 U 市的人能認識我的國家。我覺得交流是雙向的，不僅是讓外國人了解 U 市，還要讓他們了解外國，像我希望他們能認識臺灣。所以我有在市的月刊上大概兩個月一次介紹臺灣的專欄。（PA10）

此外，部分隊員如 PA04 與 PA09，因隸屬的地方過往與臺灣有互動經驗，使得居民對臺灣人有較高的好感，進而降低彼此之間的信任門檻，有助於資訊交換與工作的推進。即外國籍協力隊員在地方職場中，資訊交換的成效與其認同、信任關係的建立密切相關，而語言與文化差異則是這段互動歷程中不可忽視的背景條件。

我在日本工作已經四、五年了，所以對他們的工作方式有一些了解。要說沒有困難，這些困難其實很微小，可能眨眼就忘記了。當然語言障礙是有的，畢竟我從小學學的不是日語，所以在使用上會有些錯誤。不過他們也知道我是外國人，像 U 這裡，其實跟臺灣的 H 市有一定的交流，他們對臺灣人有一定的了解，這也讓他們對我比較包容。（PA04）

Covid-19 前我那時候還沒任職協力隊之前我是協助臺灣方小學過來日本做交流，其實疫情前臺灣的小學有過來一趟。.....就把這份延緣分持續下來到現到這樣。.....那時候主要其實就就如同剛剛說的那時候其實是民間的協會跟協會是窗口，我基本上在這兩個協會已經算是有露過臉，所以做事起來會比較順利。（PA09）

1. 變化趨勢

外籍協力隊員在初期常因文化差異與地方社群對外來者的保留態度，而難以進入資訊流通的內部，導致其專業知識與提案在地方實踐上受到限制。資訊交換初期多仰賴地方公所（役場）職員或直屬上司的協助，但在未建立人際信任基礎前，隊員往往處於資訊接收的邊緣位置。

隨著服務時間的拉長與日常互動的累積，多數隊員逐漸學會調整自身角色與行動策略，透過持續參與地方活動、善用社群媒體進行文化交流，或主動分享自身母國經驗，逐步建立地方對其的信任感與認同感。這種「由外而內」的過程，使部分隊員能由被動的資訊接受者，轉變為主動的資訊交流橋樑，甚至成為促進在地與國際連結的關鍵節點。此外，當地方原本即對外國文化較具開放（如曾與臺灣有交流經驗者），或地方公所（役場）本身有支持跨文化活動的意願時，協力隊員的資訊交換與計畫推動相對順利。綜觀所述，外國籍協力隊員在地方資訊流通中的角色會隨著時間、人際關係的深化以及地方文化的接納度而調整，呈現出由邊緣逐步向內滲透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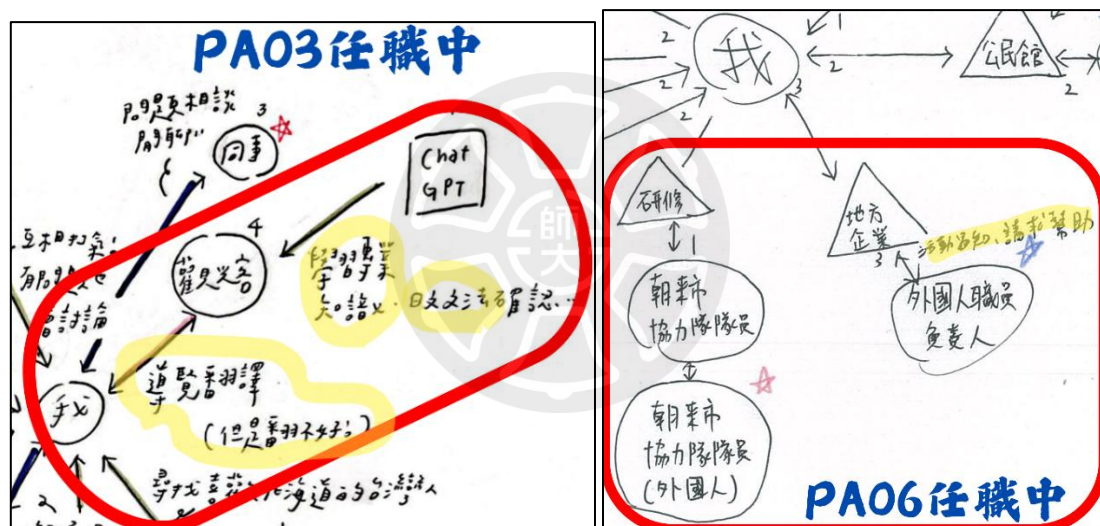
2. 資訊世界圖任職中的呈現

外籍協力隊員在任職初期普遍面臨專業知識方面的日語能力不足，以及地方社群對外來者的保留態度等多重挑戰，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資訊交換上的障礙。PA03（圖 4-12 左）便指出，即便已通過日語最高級檢定，仍感受到工作時須經常使用環境保育與森林導覽的專業日語、溝通時的細節難以應對，成為工

作上的壓力來源。在其資訊世界圖中，也特別標註了 ChatGPT 等翻譯與語言輔助工具作為協助理解的重要媒介，顯示其資訊支持網路不僅限於人際互動，也包括數位資源的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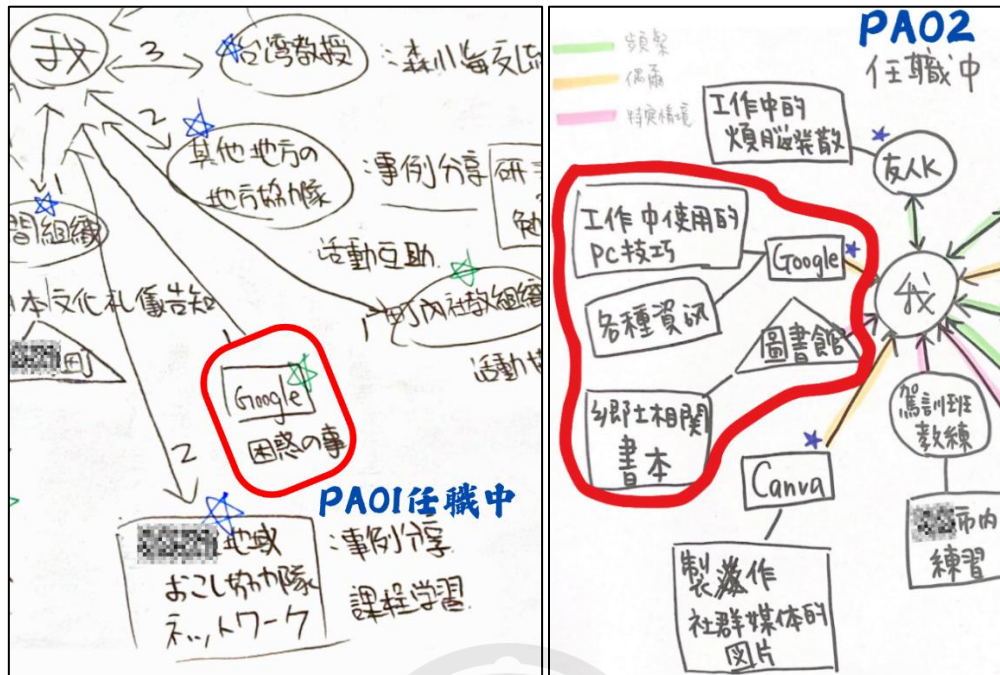
同樣地，PA06（圖 4-12 右）在初期也因對專業知識上的日語不熟悉，對地方制度與活動設計感到不安，但他選擇積極詢問在地同事、外國籍前輩以及其他市町的外國協力隊夥伴，逐步擴展自身的支持網路。其資訊世界圖中呈現多個向外延伸的協助來源，顯示資訊交換在地方內外的流動狀態，並突顯外籍協力隊透過互助網路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邊界。

圖 4-12
PA03 與 PA06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PA10（圖 4-13）的案例則展現了「外國人身份」如何從初期的挑戰，轉化為在地資訊與文化連結的資源。在自己與當地人攜手設立的社團「enjoyU 市」的支持下，PA10 成功規劃了臺灣照片展與地方刊物的臺灣專欄撰寫。這一合作關係並非一開始即存在，而是經由市役所同仁、協力隊上司與前輩等相關引薦（黃色螢光筆標記處），逐步建立信任。PA10 進一步運用「臺灣人」的身分優勢，成為促進 U 市對外文化交流的橋樑，突顯在角色認同的再建構下，外國人身份亦可轉化為價值資源。

圖 4-14
PA01 與 PA02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本節分析呼應了變化趨勢中所提的「由邊緣向內滲透」的歷程。初期因語言與文化差異，外國籍協力隊員多半無法即刻進入地方資訊網路，資訊取得也較為被動。然而，透過持續參與地方活動、主動發問、甚至使用數位工具輔助理解，隊員逐步打破資訊交換的障礙，並在過程中獲得地方的信任與合作機會。尤其如 PA10 這類案例，顯示「外國人身份」從一開始的陌生與被設限，逐漸轉化為具有正面價值的文化資本。此一過程並非單靠個人努力完成，而是在地方制度支持、社群網路引薦以及個人主動性的多重作用下，共同建構而成。

總結，資訊世界圖呈現出外籍協力隊員如何透過人際互動與文化交換，重構自身在地方的角色位置。他們從外圍資訊接受者轉變為地方與外部連結的媒介者，進一步體現了「身份」與「信任」之間的交互建構關係，也突顯資訊交換不僅是技術上的溝通過程，更深植於文化理解與社會認同的動態中。

(四) 任職中的小結

在任職期間，臺灣籍協力隊員所面對的不僅是工作職責本身，更是置身於地方行政體系、居民社群與支援機構等多元資訊環境中不斷調適的歷程。透過

分析 PA01 至 PA10 受訪者的資訊行為可見，資訊的取得與流通往往並不依賴正式制度，而是仰賴中介組織、在地人脈與其他協力隊成員的非正式經驗傳遞。這一現象呼應了對地方制度透明度不足、支援體系缺乏標準化的訴說（宍戶容代・三瓶裕，2019）。資訊世界圖的視角顯示，隊員須在多個資訊世界之間來回穿梭，並透過實踐逐步建立信任關係，才能取得實際執行任務所需的在地知識與協力資源。

本研究亦發現，資訊互動的品質與效果，受限於地方政府支援體制的成熟度與隊員的個人主動性。在制度設計仍以日本籍成員為主要對象的前提下，外國籍協力隊員需經常透過自身努力突破資訊障礙，處理行政文化差異、語言落差與社會參與門檻等挑戰，這與山本訓弘（2017）與對外國隊員制度適應困境的觀察一致。此外，部分受訪者在任職初期出現角色模糊、期待錯置等情況，需透過與地方政府、居民、支援機構的資訊互動重新界定自我定位（梶原良樹，2022；石川和男，2023），這說明資訊互動不僅是解決任務問題的工具性過程，更是一種持續的角色協商與文化實踐。

整體而言，任職中的資訊互動歷程，是隊員在制度框架內進行資訊評估、關係建立與角色建構的關鍵過程，也突顯目前制度在跨文化資訊支援與外國籍參與者適應支援方面的不足。這些觀察呼應了 Kuhlthau（1991）與 Wilson（1999）資訊行為模型中關於情境脈絡對資訊需求與決策歷程的關鍵影響，並補充說明在地方行政制度下的跨文化工作者如何透過資訊互動進行自我調整與社會實踐。

三、 任職期間的未來規劃與資訊行動

關於未來規劃，受訪者們依任期長短與個人情況展現出不同的傾向。目前任期尚未滿一年的協力隊員（PA04、PA05、PA07）多未有明確方向，處於觀望的階段；而任期即將屆滿或已退任的隊員（PA01、PA02、PA03、PA06、PA08、PA09、PA10）則大多已有具體的規劃。本研究亦請兩位已退任者（PA08、PA10）回顧當初任職期間面對退任所做的未來規劃與資訊尋求情形。

(一) 資訊需求與來源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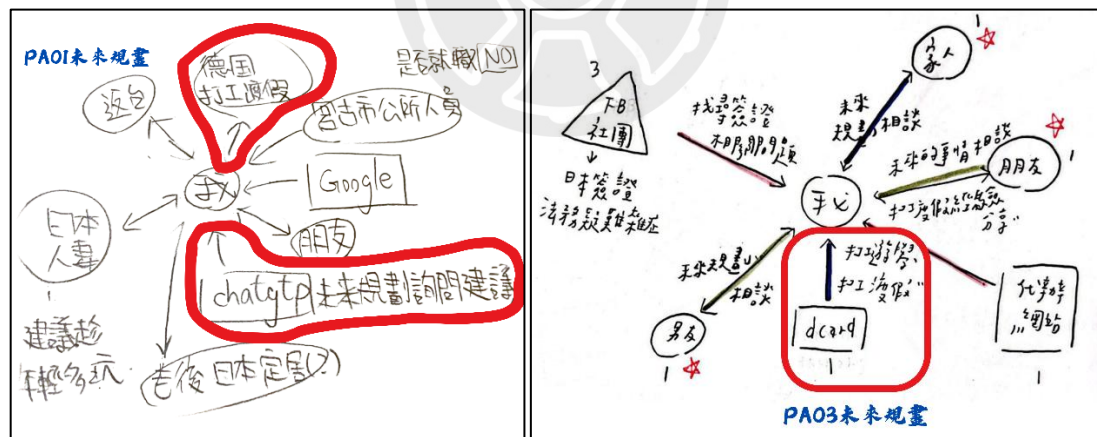
1. 他國打工度假的規劃

有兩位受訪者的未來規劃透漏出對短暫搬離日本的意願，尤其是以打工度假為主要目標。PA01 與 PA03（圖 4-15）皆表示有意在任期結束後離開日本，前往其他國家工作與生活。兩人皆為剛從學校畢業不久的年輕人，協力隊即為他們的第一份正職工作，至今已在日本工作三年。相較於立即投入穩定職場或長期定居的規劃，他們更傾向透過打工度假這類靈活的方式，拓展視野與累積跨文化經驗。為了實現此一目標，兩人均主動透過網路搜尋有關各國打工度假簽證的申請條件與可能的工作機會，顯示出其資訊行動多依賴線上資源進行自主規劃與探索，也反映出年輕世代外國籍隊員在向外探索的積極度。

目前我有打算去別的國家打工度假看看，趁年輕的時候去。（PA01）

目前的打算是任期結束後先回臺灣，然後打算去打工度假或打工遊學。關於這些資訊，我主要是上網查看一些代辦或是 Dcard 上的心得分享。結束打工度假後，我可能會再回到日本。（PA03）

圖 4-15
PA01 與 PA03 未來規畫資訊世界圖



2. 創業的資訊需求與挑戰

半數受訪者透漏出創業意願，然而，外籍身份在日本創業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亦成為資訊需求與行動選擇的重要關鍵。概括來說，創業相關的資訊需求主要集中於目前手上資源的取得、創業方向的可行性判斷，以及與簽證制度的相容問題。

PA05 的情況則更偏向尚未形成具體規劃（圖 4-17）。PA05 目前僅任職半年，在訪談中坦承尚未深入思考退任後的方向，僅回憶起面試時曾被詢問未來打算，當時以「創業」作為回應。然而，PA05 事後得知外國人在日本創業的門檻遠高於本國人，反而產生更多疑問與困惑。PA05 的資訊世界圖亦僅顯示與面試官之間的簡單連結，顯示目前對未來缺乏具體的資訊管道與實質規劃。

快要結束任期時，我會面臨簽證更新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我在面試時也有被問過。.....當時我沒想太多，當時我回答說，任期結束後想留在當地開業，開一家要求比較低的旅行業公司，例如地域限定的旅行業。我當時是這樣回答的，但後來我查了一下，發現如果外國人要在日本開公司，還得雇用兩名日本員工，所以條件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簡單。（PA05）

圖 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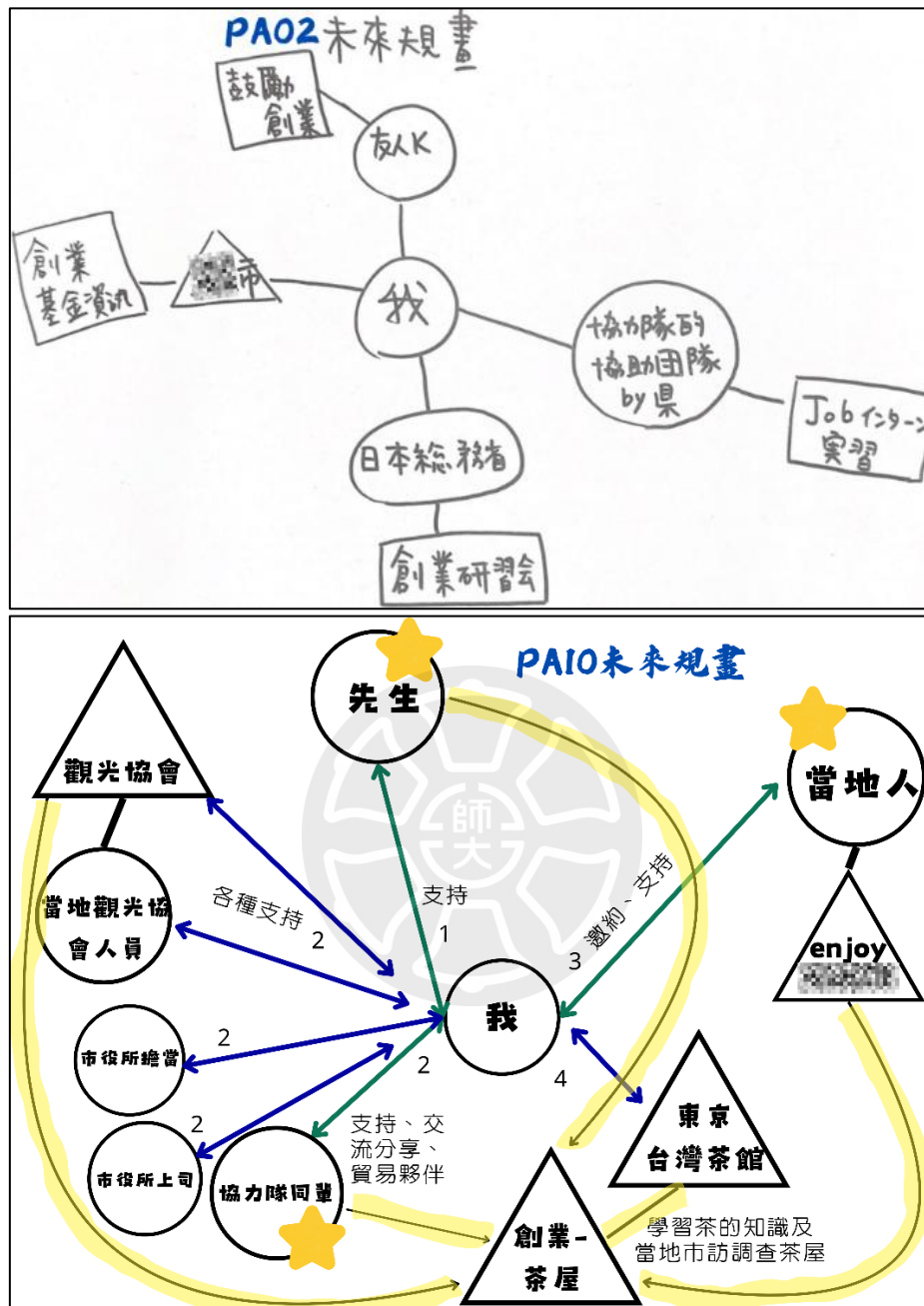
PA05 未來規畫資訊世界圖



相對而言，PA02 展現出較為積極且具體的行動策略（圖 4-18 上）。PA02 曾參與 G 市提供的創業補助方案，亦即總務省（2025）文獻中所提及的 100 萬日圓創業基金，並曾前往參加總務省主辦的全國協力隊創業研習營，展現出對創業資訊的主動搜尋與多元管道的接觸。同時，G 市亦提供創業見習機會，讓有意創業的隊員能進入實際產業現場進行短期觀察與體驗，有助於更具體地判斷未來方向與可行性，反映出中央與地方在制度設計上對協力隊創業提供了相當積極的資源支援。

我覺得我到任後，這些由他們舉辦的活動其實也很積極。另外還有一個部分是關於創業相關的研習。比如，如果我想要創業的話，我應該注意哪些事項？如果我當個人事業主，還是開株式會社也是創業的一種選擇。我的創業是想要週末做就好嗎？還是要全職做，週一到週五都要做的事？總務省也有一些補助，提供這些免費的研習。（PA02）

圖 4-18
PA02 與 PA10 未來規畫資訊世界圖



PA10 則是一個相對完整且成功的創業案例（圖 4-18 下）。任職期間，PA10 對日本茶文化產生興趣，遂主動向 U 市役所申請補助，前往東京學習相關知識並取得地方支持。在此基礎上，他於自創社團「enjoyU 市」中多次舉辦泡茶活動，不僅推廣茶文化，也藉此觀察地方居民的接受度，實為創業前的市場試探。隨後在協力隊同事與當地人共同合作下創立茶屋，並成功營運，進一步獲得觀光協會與社區的支持（黃色螢光筆的關聯為支持的人與團體）。PA10 亦提及曾成功申請地方政府提供的 100 萬日圓創業補助，不過此補助為「先支出後申請」制度，必

須先自費投入後方可提出申請，此一制度特上對於創業初期的財務規劃提出了不小挑戰。

那學完之後，覺得自己好像可以創業了，先前也有在社團裡舉辦幾次喝茶體驗會，有受當地人的贊同，覺得這是可行的市場，因為當地認識很多朋友，也因為我要開店，所以就在當地一起開了。最重要的是還有一個誘因是，協力隊畢業後，如果在當地創業會有補助金。.....我現在正在申請中。其實那筆補助金的申請過程很麻煩，你需要先自己墊付那些錢，然後事後再申請。等申請審核通過後，才會把錢還給你。(PA10)

根據這五位有意創業的受訪者來看，協力隊隊員在創業規劃過程中面臨多重考量，尤其是身分制度與資源取得之間的緊張關係。在面對創業意願時，資訊的可得性、地方支持系統的健全程度，以及外籍身份帶來的法規限制，都是決定其可否實踐的關鍵因素。

3. 繼續擔任協力隊的移動規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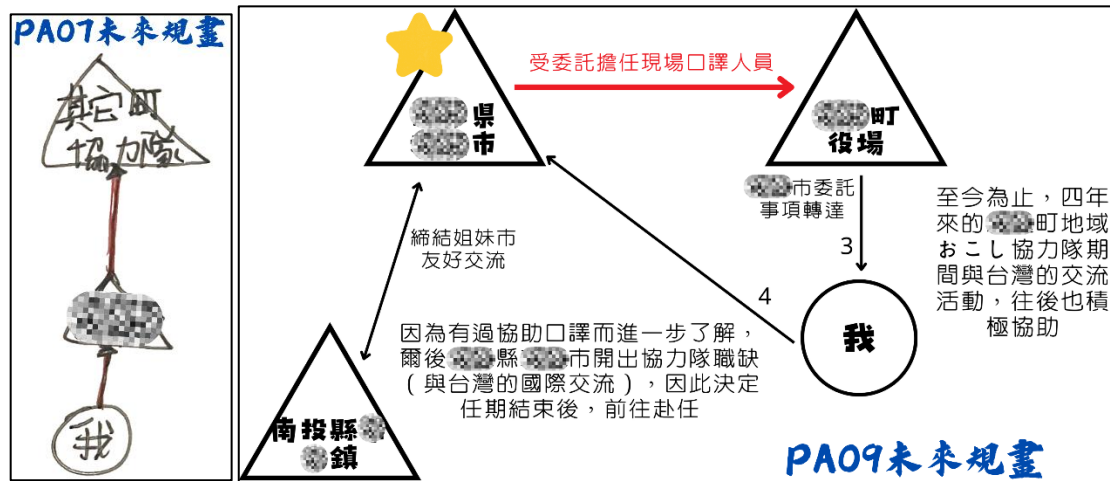
另外，有兩位受訪者 (PA07、PA09) 表達希望在任期結束後，搬遷至同一縣內的其他市町，繼續以協力隊員身分服務 (圖 4-19)。他們對未來的想像並非離開協力隊體系，而是希望轉換地點，延續既有的工作模式與生活節奏。此類資訊需求主要集中於：其他市町是否有招募需求、招募條件是否開放給已具經驗的隊員、以及如何在縣內流動中順利銜接行政程序等。這類型延續的規劃，相較創業或出國，更仰賴各地自治體的接納意願，也需要透過縣內網路、隊員社群、地方公所 (役場) 所屬單位等管道蒐集資訊。

我應該不會一直待在這個町，我有想過去隔壁町的協力隊任職，曾經與隔壁縣的協力隊隊員交流過，比較之下資源比較多。(PA07)

好的，首先就是我先講一下我先先講結論，我最後的決定是到隔壁最上町的隔壁 S 市繼續擔任協力隊任期地方振興協力隊隊員。我為什麼認識那邊的原因是因為我去年度 S 市跟南投縣 C 鎮有簽定就是姐妹鄉市的一個締結，那時候隔壁鄉鎮是有來函請我去翻譯。.....至於為什麼不選擇待在 M 町，如果要推廣觀光，M 町最大的困擾是交通問題因為畢竟日本東北仰賴車為主，而且交通的部分這個課題我這四年來我一直找不到解決的方法那我們隔壁的 S 市那邊有新幹線有抵達。我想要透過協力隊到下一個到 S 市是當協力隊去掌握這些資源，之後把我想做的東西從 M 町拓展到整個 G 縣的北區。(PA09)

圖 4-19

PA07 與 PA09 未來規畫資訊世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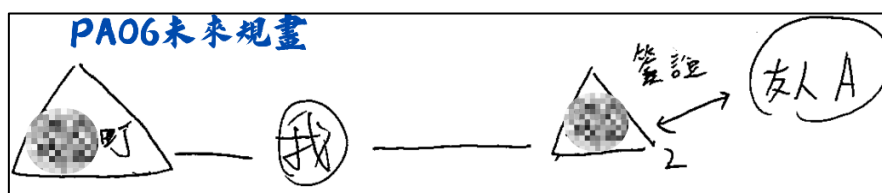
4. 其他工作規劃

PA06 表達希望留在 K 縣發展 (圖 4-20)，雖目前在 K 町擔任協力隊，但仍偏好居住在 PA06 剛來日本時，研究所時期居住且又熟悉的 K 市。其任期屆滿後，計畫進入朋友於 K 市創立的公司工作。儘管如此，PA06 亦表示若 K 町有需要，願意短期返回支援地方活動。

關於未來的規劃，我之前已經提到過，我希望能過一種兩地頻繁往返的生活，主要以 K 市為主，這裡則是來辦活動或是有需求時才過來。我已經有了處理簽證問題的頭緒，認識的人有公司，可以幫我處理這部分。(PA06)

圖 4-20

PA06 未來規畫資訊世界圖



整體而言，臺灣籍協力隊員在任職期間對未來的規劃呈現多樣化樣貌，其資訊行動與決策歷程受年齡、任期長短、個人興趣與制度環境等因素影響。資訊來源則涵蓋網路搜尋、社群媒體、地方諮詢窗口、協力隊網路與友人資源等，顯示出協力隊員在制度中須運用多元策略整合資訊，並評估現實可行性因應未來生活與職涯的轉變。表 4-2 所示資訊來源分布揭示，協力隊員普遍結合網路搜尋、官方網站、創業諮詢處與人際網絡等多元管道進行未來規劃，顯示制度支援與資訊可近性將持續是影響其生涯轉折的關鍵。

表 4-2

未來規劃之資訊需求類型與資訊來源

未來規劃之資訊需求類型		打工 度假	創業	簽證	移動至其 他市町繼 續任職	留日其 他縣市 工作
資訊來源						
人	市/町內專家		✓			
	創業諮詢處專家		✓	✓		
	協力隊同事		✓	✓		
	觀光協會成員		✓			
	地方居民		✓			
	伴侶/朋友	✓	✓			✓
	同縣市內其他市町的役場主管				✓	
物	網路搜尋 (各國打工度假簽證資訊、就業機會、簽證資訊)	✓		✓		
	社群媒體平台 (Dcard：日本生活版、 Facebook 社團：日本簽證法務 疑難雜症)	✓		✓		
	協力隊官方網站(創業與補助 資訊)		✓			
	日本入國管理局網站			✓		
地 點	留遊學代辦處	✓				
	町內創業諮詢處		✓			
	中央總務省(創業研習會)		✓			
	大城市的學習教室		✓			
	地方公所(役場)				✓	

資訊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資訊世界圖中的人、物、地點出現狀況

本節旨在分析受訪者於資訊世界圖中的繪圖呈現情形。研究方法上，為利資料的標準化與後續分析，本研究於訪談前設計了繪圖規則，將不同類型的資訊互動物件以不同圖形標示，包括以圓形代表人物、矩形代表工具或媒介、三角形代表地點，並透過箭頭方向表示資訊流向，星號則用以指出受訪者認定的重要資訊來源。以下本節將依圖形中「人」、「物」、「地點」分段歸納分析任職前與任職中，受訪者主要的資訊互動對象類型。

此外，每段也將分析該項資訊互動對象「顏色反映訪問頻率」（綠色=頻繁互動；藍色=偶爾互動；紅色=僅在特定情境下），「數字標示資訊取得的難易度」（1=很容易，5=非常困難），觀察受訪者任職前後資訊互動頻率與資訊取得難易度，進一步歸納出資訊流動的結構與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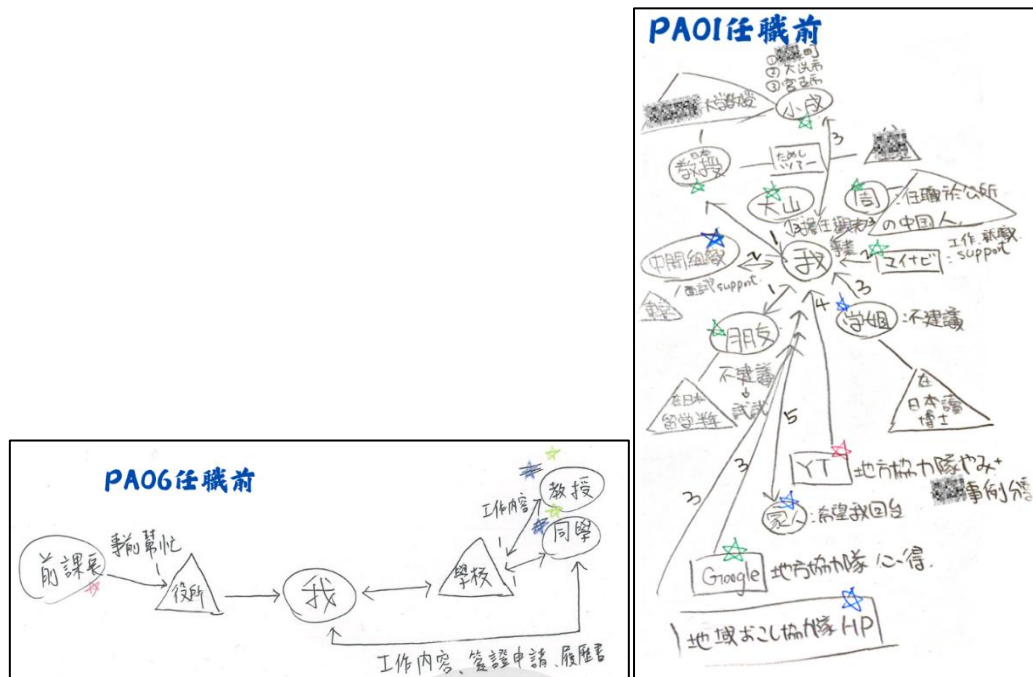
一、 資訊互動對象

(一) 圓形：人物的分析

在任職前，受訪者的資訊來源主要來自於個人社會網路，涵蓋了研究所教授、學長姐、朋友、語言學校職涯輔導老師、中間組織人員、面試官、家人、實習時接觸的地方公所（役場）職員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受訪者標註星號的重要資訊來源集中於「朋友」、「研究所教授」與「地方公所（役場）職員」，顯示在尚未正式進入協力隊體系之前，受訪者傾向依賴個人經驗或人際關係網路中的可信賴人物來獲取與地方相關的資訊，並建立初步的在地認知與期待。其中如 PA01、PA04、PA06（圖 4-21），均將任職前互動之所有對象列為關鍵資訊來源，反映出在準備階段，資訊多元且來源分散，但整體仍圍繞著既有人脈與協力隊計畫的接觸點（如學校、面試時所接觸的地方公所（役場）職員）展開。

圖 4-21

PA06 與 PA01 任職前資訊世界圖



而在任職後，資訊互動的對象則呈現結構化與在地化的趨勢。多數受訪者（PA01、PA05、PA06、PA08、PA07、PA10）的資訊互動轉向與實際工作場域有連結的角色（圖 4-22），如地方公所（役場）職員、上司、地方協力隊其他成員、觀光協會人員、當地居民、旅行社職員、藝術家、學生團體、旅館經營者、youtuber、劇團等。這一轉變反映出資訊獲取途徑由個人過往經驗延伸至地方內部，並隨著駐點工作的深入而拓展。此外，任職中的重要資訊來源多為「地方公所（役場）職員」、「其他協力隊成員」以及「當地居民」等，顯示協力隊隊員在實際執行任務時，會傾向依賴地方支持與民間知識的共同提供。

因此協力隊隊員於任職前與任職中的資訊互動網路呈現以下三項主要特徵：

1. **由個人向在地社群轉移**：任職前的資訊互動較依賴個人過去的教育或社交人脈，而任職後則轉向正式機構與地方資源的接觸與合作。
2. **關鍵人物的穩定**：無論任職前後，「朋友」與「地方公所（役場）職員」皆是多數受訪者（PA01、PA02、PA03、PA04、PA06、PA09、PA10）標示為星號的重要資訊來源，顯示此兩者為資訊支持網路中具穩定且信任度高的角色。
3. **資訊來源的重要性認知因人而異**：儘管部分對象如「大學教授」、「觀光協會人員」在某些受訪者圖中標示為重要來源，但在整體中仍呈現個性化的差異，顯示資訊評價受個人經驗、任務內容與互動頻率所影響。

透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資訊世界圖中的人物分佈不僅反映出資訊獲取的脈絡，也展現出協力隊隊員角色轉變過程中所倚賴的社會支持如何逐漸地從外部延伸至在地體系之中。如此一來對理解地方協力隊員在異地社會中如何定位自身並建立資訊掌握策略，提供了具體的參照。表 4-3 為任職前/後資訊互動的人物參照。

表 4-3
任職前與任職中資訊互動人物

階段	任職前	任職中
資訊互動人物		
研究所教授	✓	✓
學長姐、研究所同學	✓	✓
朋友	✓	✓
伴侶	✓	✓
家人	✓	✓
語言學校職涯輔導老師	✓	
工作介紹的仲介	✓	
第三方中間組織人員	✓	✓
實習時接觸的地方公所（役場）職員	✓	
面試官（亦即未來上司）	✓	
市長或町長	✓	✓
地方公所（役場）職員		✓
地方公所（役場）外國籍職員		✓
觀光協會人員		✓
其他協力隊成員		✓
當地居民（學生群、業者群）		✓
當地居民（外國人居民）		✓

資訊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顏色與數字標記，互動頻率與資訊取得難易度的分析

從受訪者的資訊世界圖中可見，顏色與數字的標記提供了理解地方協力隊隊員在任職前後的具體資訊互動網路線索。有了這些標記可以揭示資訊互動的頻率、取得的難易程度，進一步描繪出資訊流動的結構與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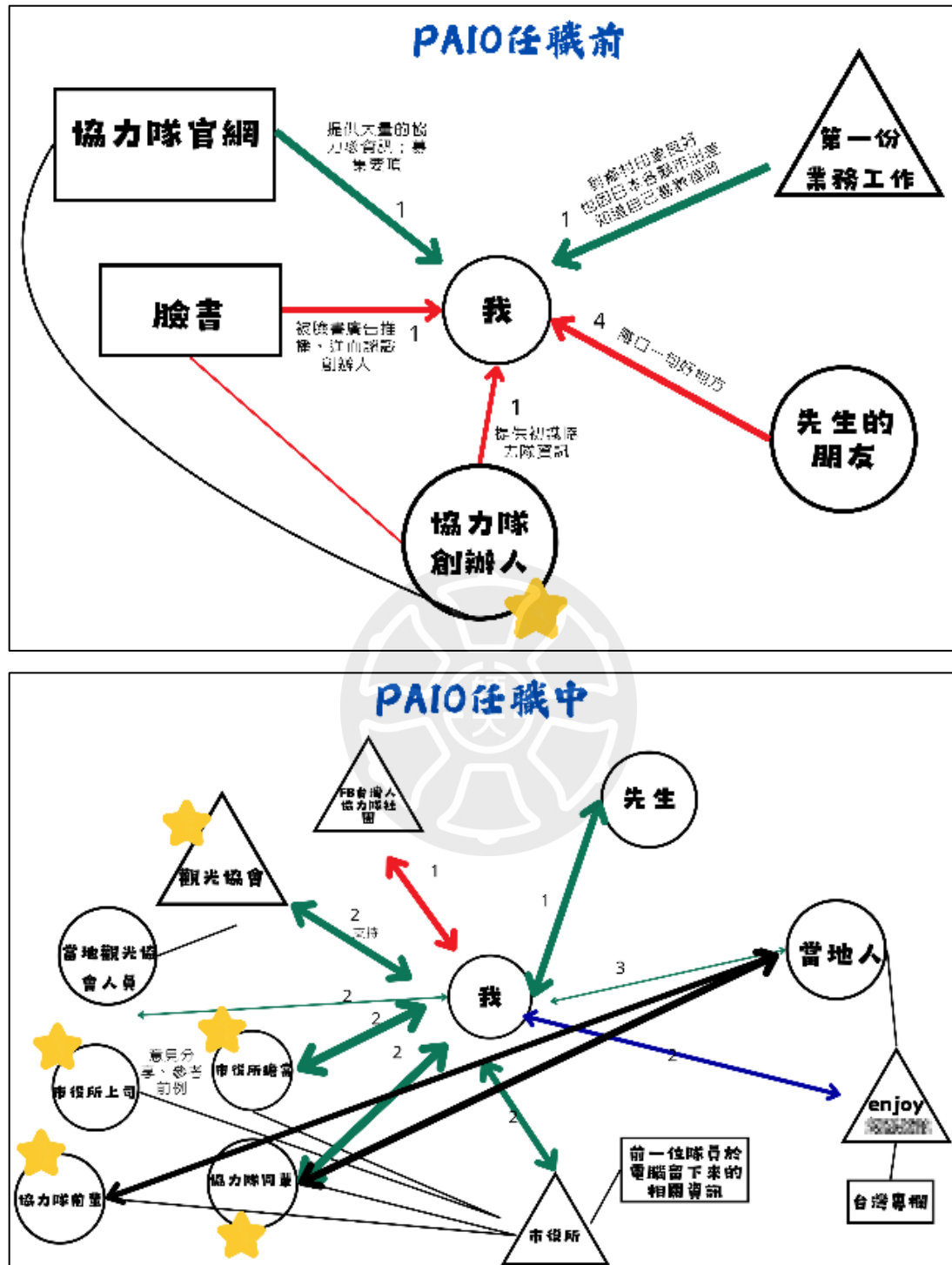
首先，在互動頻率的顏色標記上，任職前的「綠色（頻繁互動）」對象主要集中於受訪者原本所處的社交圈，例如朋友（PA01、PA02、PA03、PA05）、教授（PA01、PA06）、研究所同學（PA06）、三味線老師（PA02）、語言學校同學與職涯輔導老師（PA03）、仲介（PA07）等，顯示協力隊隊員在尚未進入地方社會前，主要透過自身既有人脈網路來獲取相關資訊。這類資訊來源通常具有信任基礎，互動密切，成為資訊探索初期的重要支持。

任職後的綠色標記則顯著轉向實務上接觸的地方角色，包括地方公所（役場）職員（PA01、PA02、PA06、PA08、PA09、PA10）、其他協力隊隊員（PA01、PA04、PA05、PA07）、觀光協會人員（PA10）、當地居民（PA08、PA10）、研究所同學（PA06）、教授英語的老師（PA06）、飯店工作的前輩（PA07）等。這些在地角色與組織成為協力隊隊員任職後的主要資訊互動對象，反映出資訊流動從原先私人圈層逐漸過渡到地方社會與互動場域的轉變。圖 4-23 為 PA10 任職前與任職後的資訊互動對象，可以看出 PA10 由原本社交圈擴增至地方社會的角色。



圖 4-23

PA10 任職前與任職後的資訊互動對象由原本社交圈擴增至地方社會的角色



再者，至於數字所標示的資訊取得難易度（1 為最容易，5 為最困難）。在任職前，多數資訊來源落在 1~3 之間，如教授（PA01、PA06）、朋友（PA01~PA03、PA05）、三味線老師（PA02）、語言學校前輩（PA03）、仲介

(PA07)、未來同事 (PA05) 等，代表受訪者普遍能透過親密人際關係獲得資訊。然而，也有少數角色被標示為 4 或 5，顯示即使身處相關職位或地方，資訊取得仍存困難，例如地方公所（役場）職員（PA01、PA02、PA03、PA08）、家人（PA01、PA08）、面試官（PA04、PA05、PA08）等，可能因為角色限制、溝通距離或缺乏對地方的深入理解而難以提供具體協力隊資訊。

任職後的資訊取得難易度則呈現更為多元。仍有角色被標示為「1（非常容易取得）」（如地方公所（役場）職員、協力隊隊員、當地居民、研究所同學、外國人英語老師等），表示這些人員為資訊取得的重要且穩定來源。但即便與某些角色互動頻繁，例如地方公所（役場）職員、觀光協會人員、當地旅館老闆（PA01、PA04、PA08、PA10），其資訊取得難度仍被標示為 2~4，不難看出，資訊傳遞過程中仍受到部門職責限制或角色互動界線的影響。

最後，為了更具體呈現受訪者在協力隊任職前後的資訊互動狀況與資訊取得難易度，本研究將「資訊世界圖」中出現的資訊來源進行整理與分類，並透過雙軸象限圖（圖 4-24）進行視覺化呈現。該圖以 X 軸表示「資訊取得難易度」（從 1「非常容易取得」至 5「非常難以取得」），Y 軸則表示「資訊互動頻率」，分為「紅色（僅特定情形下互動）」與「綠色（頻繁互動）」兩類，形構成四個象限。

人物的位置配置方式主要依據以下兩項指標：

1. 資訊互動頻率（Y 軸）：參照受訪者訪談內容中對各角色的互動描述，若受訪者明確指出與某角色互動密切、資訊交換頻繁，則將其標記為「綠色」，代表高頻互動；若僅在特定時點或任務需求下偶爾接觸，則標記為「紅色」，代表低頻或情境限定的互動。
2. 資訊取得難易度（X 軸）：根據受訪者對資訊可得性的主觀評價與實際經驗，依據其描述進行 1 至 5 的評級。例如，若資訊來源來自信任關係強的人（如朋友、導師、研究所同學等），多被評為 1 或 2；若資訊需經過層層機關或角色限制（如公所職員、面試官），則被歸為 3 至 5 的較高難度區段。

依據這兩個面向，各角色被安置於對應象限中。例如，受訪者原本的社交圈（如朋友、研究所同學、老師等）被歸類為綠色高互動區，且多位於X軸偏左的「易取得」區段；而面試官、地方公所（役場）所屬人員則多分布在低互動頻率且資訊較難取得的象限中。如此可具體觀察出受訪者資訊網路在角色互動強度與實際可得性上的分布趨勢，亦有助於識別資訊流通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制度瓶頸。

圖 4-24
人物互動頻率與資訊取得難易度



特別的是，任職後標示為「紅色（僅特定情況下）」者也不在少數，如 PA02 的駕訓班教練、PA04 的其他町協力隊隊員、PA07 的前隊員、PA10 的先生的朋友等，顯示部分資訊來源具有偶然性或短期互動特性，難以形成穩定的資訊支持網路。此外，也有「2~3」等中度難度標示的角色，如當地居民、外國人居民、日本居民、旅館老闆、臺灣／日本的小學與交流協會職員等，他們雖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在地資訊，但因互動頻率與溝通深度受限，其資訊傳遞常受非正式管道的脈絡約束，出現不一致或片段化的情況。

總體而言，協力隊隊員的資訊互動樣態隨著任職階段的推進而出現質性的轉變。任職前，資訊大多依賴熟人與信任關係的非正式網路；任職後，則轉向以地方政府職員、居民、觀光協會人員等組成的多元在地網路為主體，受限於「角色期待」、「可接近性」及「制度性篩選」等因素，使得資訊流動呈現多層次的結構。

這樣的轉變不僅呼應實務上協力隊制度的權力配置現況（如地方政府主導下的資訊分配機制與隊員的制度邊緣性），也與既有研究中指出資訊獲取途徑高度依賴人際推薦與非正式分享的現象相符（一般社團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2024；柴原良樹，2022）。在地方參與與社會融入的過程中，資訊互動網路的重構，成為協力隊員逐步建立在地定位與行動策略的關鍵環節。

二、 資訊互動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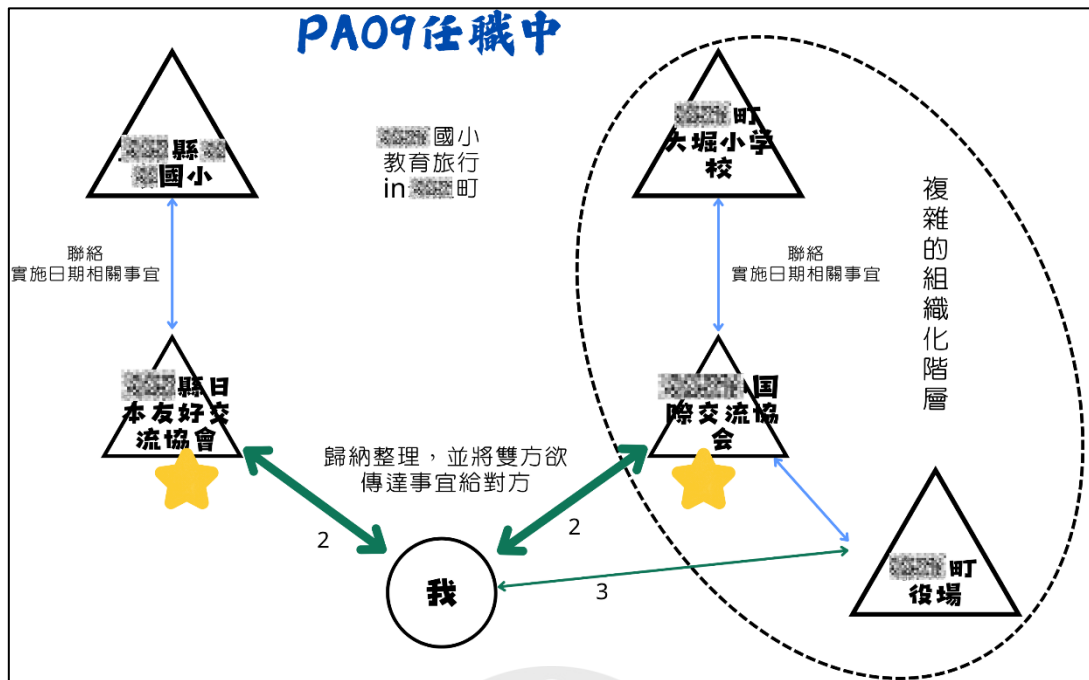
（一） 矩形：工具媒介的分析

從受訪者於資訊世界圖中所描繪的「矩形」圖像可見，資訊媒介在協力隊隊員進入地方工作前與任職期間，扮演了輔助與導引角色。這些矩形所代表的工具與平台，呈現出個人取得資訊的途徑以及與地方資訊環境連結的管道，涵蓋求職網站、社群媒體、官方網站與數位工具等多元媒介形式。

在任職前階段，多數受訪者仰賴數位搜尋與社群平台作為主要資訊來源。工具使用以 Google、Facebook、官方網站（如：各地方政府與總務省的協力隊頁面）、日本求職網站（如：Mynavi、Rikunabi）等為主。尤以 Google 為最常見的搜尋起點，Google 搜尋幾乎貫穿於多數受訪者的資訊脈絡中，例如 PA01、PA02、PA03 與 PA08 皆曾運用 Google 尋找協力隊相關資訊，或探索特定地區的官方招募頁面。社群媒體如 Facebook 則在資訊探索階段展現關鍵功能，不僅提供制度介紹與案例經驗，也透過社團與貼文連結學長姐的故事與實務心得，成為吸引與說服潛在隊員的重要渠道。多位受訪者（如：PA02、PA04、PA05、PA10）特別標註 Facebook 貼文或社團為星號的重要資訊來源，顯示社群中人際經驗分享在初期決策中具有來源的契機。

圖 4-27

PA09 任職中的繪圖以地點（三角形）為主



綜合上述，協力隊隊員在任職前後的資訊媒介使用呈現以下幾項主要特徵：

1. **數位工具為開啟認識協力隊制度的起點**：在任職前，多數隊員皆透過 Google 搜尋、Facebook 社群、總務省與地方政府的官方網站接觸協力隊資訊，社群媒體特別在人際經驗傳遞與情感連結上發揮重要作用。
2. **媒介功能從資訊探索轉向工作支持**：任職後，媒介的使用重心轉向實務操作、任務執行與組織互動，例如製作素材、學習技能、參與官方社群與線上論壇，顯示資訊媒介已成為日常工作與自我進修的工具。
3. **社群平台與制度性學習並行發展**：Facebook、Instagram 等社群平台仍持續在地方宣傳與個人連結中發揮功能，同時，官方機構提供的線上研習會、地方協力隊社群也逐步形成一種制度化學習場域，支撐協力隊員在職場上的成長。
4. **資訊互動媒介的個人化差異**：並非所有受訪者都依賴工具媒介，有部分人著重於人際互動或地點現地交流，顯示資訊獲取與使用仍受個人習慣、任務內容與所在社群特性影響。

透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資訊媒介不僅構成協力隊隊員進入制度的入口，也在職涯發展與在地實踐過程中，形塑出一套具有功能、情感與制度的資訊連結系統。這些媒介的運用軌跡，揭示出協力隊員如何在資訊與行動之間，建構個人資訊互動策略。表 4-4 為任職前/後資訊互動工具參照。

表 4-4
任職前與任職中資訊互動工具

階段	任職前	任職中
資訊互動工具		
Google	✓	✓
Facebook	✓	✓
官方網站（如：各地方政府與總務省的協力隊頁面）	✓	
日本求職網站（如：Mynavi、Rikunabi）	✓	
Instagram、Threads		✓
Canva		✓
ChatGPT		✓
協力隊內部社群的聯繫（如：整個縣或町的協力隊 Line 群組、東北地區臺灣人協力隊 Line 群組）		✓
實體資源（如：地方公所（役場）留下的紙本資料）		✓
特定事件（如：公告地方或全國協力隊研習會平台消息）		✓

資訊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顏色與數字標記，互動頻率與資訊取得難易度的分析

從任職前與任職中的資訊來源分布來看，「顏色」與「數字」的標示提供了理解資訊接觸頻率與可及性的重要線索。在顏色標示中，「綠色（頻繁互動）」所代表的高互動來源，在任職前多集中於搜尋引擎（如 Google）、社群媒體（如 Facebook）、以及日本的求職網站等數位平台，例如 PA01 與 PA02 即明確標註這些媒介為主要資訊來源。這些平台具有資訊流通快、介面熟悉、使用門檻低等共通特徵，反映出受訪者在進入協力隊制度之前，普遍傾向透過熟悉且資訊密度高的數位媒介進行初步探索。此階段的資訊互動多為被動式且單向輸入，以搜尋結果或平台推播為主，箭頭方向多呈現單向流動，如 PA03、PA07 與 PA08 所示。這樣的互動模式突顯出制度初始接觸時，協力隊隊員仍主要依賴數位工具來理解協力隊計畫與相關案例，尚未進入與人或社群建立互動關係的階段。

圖 4-28

PA01、PA02、PA07 與 PA08 任職前資訊世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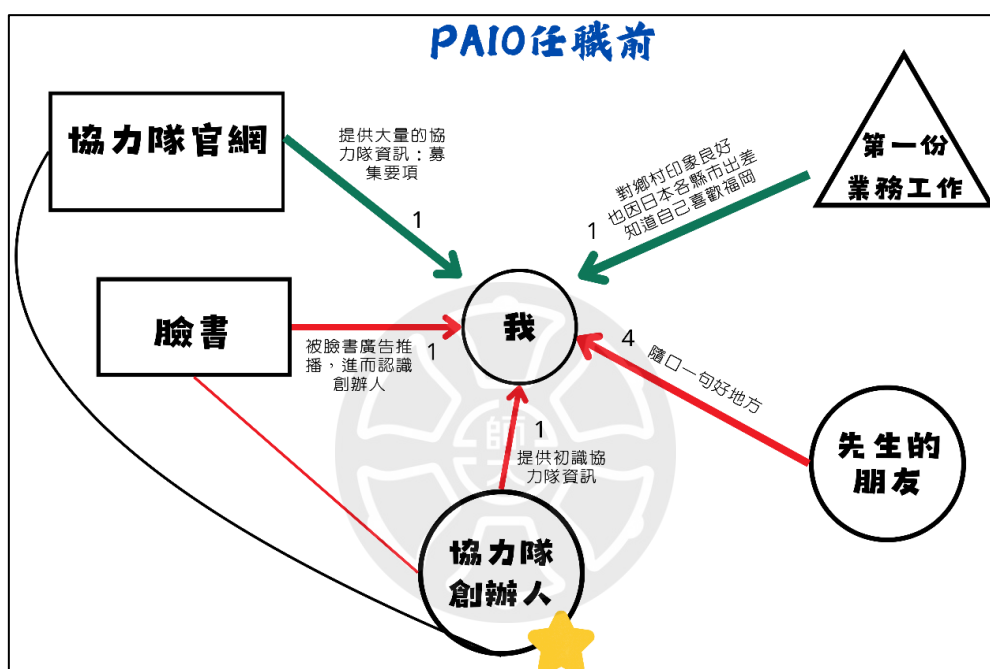


到了任職之後，綠色來源的樣貌轉變。不少資訊世界圖顯示出受訪者開始有了跟協力隊內部社群的聯繫（如：整個縣或町的協力隊網路、地方社群媒體），或是與工作密切相關的實體資源（如：地方公所（役場）留下的紙本資料）。這種互動型態轉為更貼近地方、關係導向的資訊取得方式，意味著資訊的取得不再只是個體行動者與網路平台之間的單向搜尋行為，而是包含與周遭社群互動、進入制度內部後所能接觸到的具體而在地的資料來源。

「藍色（偶爾互動）」與「紅色（僅一次互動）」則在任職前後的樣態中，主要體現的是資訊嘗試與觸及的多樣與偶發。在任職前，紅色來源常來自特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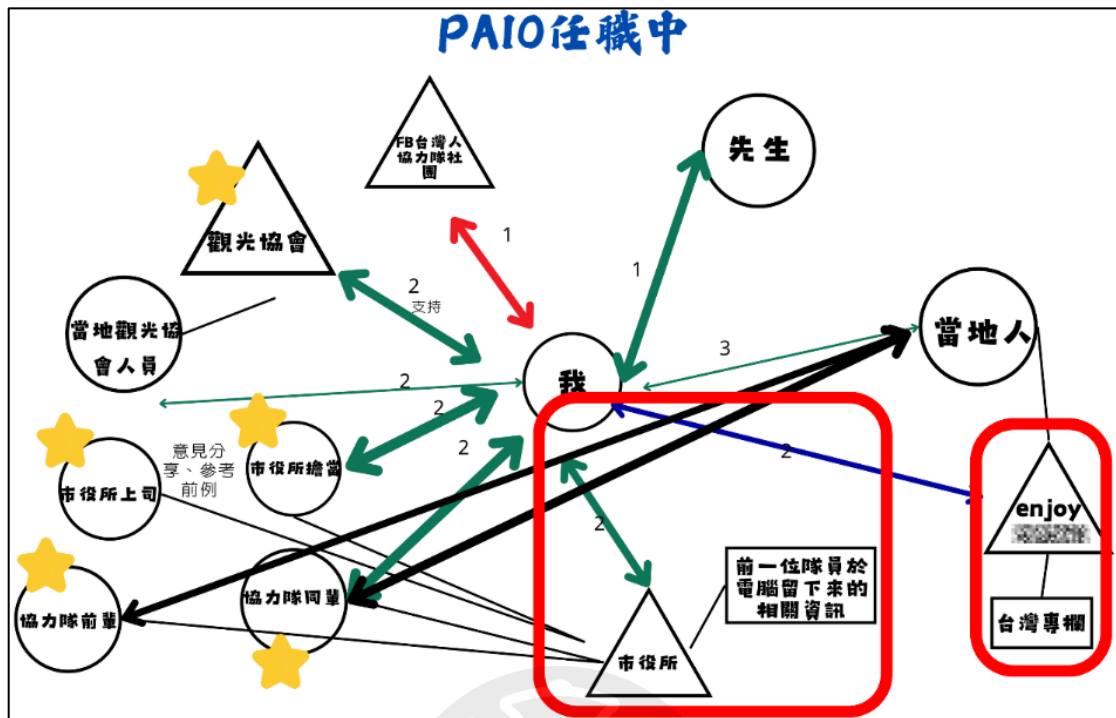
平台（如 YouTube、Facebook 廣告）的一次性觸及，或是資訊推播的機緣所致。這種一次性的互動雖然頻率低，卻常是角色轉變的契機。例如受訪者（PA04 與 PA10）就是因為偶然看到特定貼文而產生參與動機。任職後，藍色或紅色來源則轉向特定事件（如：公告地方或全國協力隊研習會平台消息）的單次參與，成為未來像是創業或定居想法的觸發點，而不再是初始接觸協力隊制度的主要媒介。

圖 4-29
PA10 任職前資訊世界圖



在數字標示資訊取得難易度的面向上（1 為最容易，5 為最困難），多數資訊來源被標為「1（很容易）」，無論是任職前或任職中，皆以可快速獲得、操作直觀、語言或平台習慣熟悉的來源為主。這一方面說明受訪者在資訊探索上仍傾向以可近性作為第一層選擇標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制度相關資訊在公共領域（如：官方網站、求職平台、社群媒體）上的基本開放程度。然而，當資訊來源涉及個人經驗、地方社區相關資訊或非正式網路時，其取得難度與互動頻率便不一定成正比。例如 PA10 任職後的有關前隊員的紙本資料、社團的刊物雖標示為容易取得，但其實需要進入制度內部或特定社群後方能得見，顯示出資訊的「取得」與「接觸條件」之間仍存在層次上的差異。

圖 4-30
PA10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



為了更具體呈現受訪者在地域振興協力隊任職前後與各種資訊工具之間的互動樣貌與資訊取得難易度，本研究進一步整理資訊世界圖中出現的主要工具型資訊來源，並以雙軸象限圖（圖 4-31）進行視覺化分類與詮釋。此象限圖的設計延續前述圖 4-24 之邏輯，將資訊來源依據兩項指標進行配置：

首先，在 Y 軸「資訊互動頻率」方面，依據受訪者對於各種資訊工具使用情境的描述，若工具在資訊探索歷程中被頻繁使用、具持續性且具有主動搜尋特性，則標示為「綠色（頻繁互動）」。例如，Google 搜尋引擎、日本求職網站、Facebook 社團等平台在多位受訪者的訪談中被反覆提及，顯示其在任職前資訊探索階段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被歸入高互動頻率象限。相對地，若僅在特定情境下偶然使用，例如 YouTube 演算法推播、Facebook 不特定頁面的貼文推薦，則標記為「紅色（僅特定情形下互動）」，表示此類工具的資訊互動頻率較低，常為一次性或偶發性的資訊接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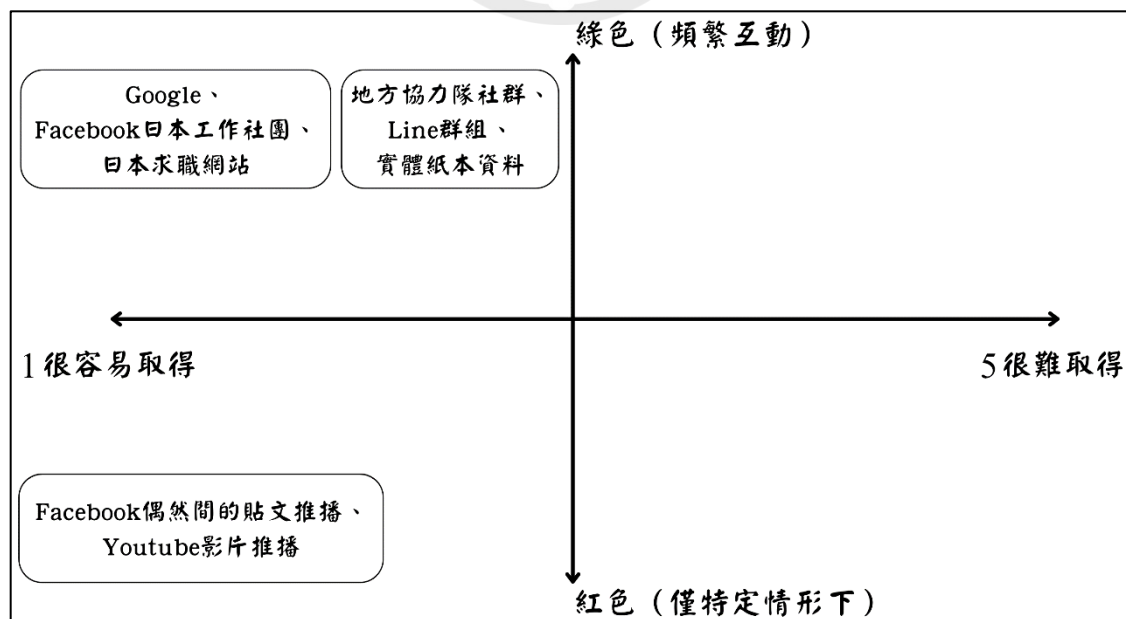
其次，在 X 軸「資訊取得難易度」方面，則依據受訪者對於各項資訊來源的可及性評估進行 1 至 5 的評分。若資訊來源介面熟悉、語言無障礙、搜尋門檻低，並可快速得到回應，則評為 1（非常容易取得）；若資訊需經過登入特定

平台、透過社群邀請、或須加入制度內部群體（如 LINE 群組、協力隊內部社群），則評為 2 至 3；若涉及更高層級的制度進入門檻，則會評為 4 至 5。整體來看，多數工具型來源雖表面上為公開資訊，但實際仍可能因使用者所處位置、制度熟悉度與語言能力等因素而存在隱性障礙。

舉例而言，Google 與 Facebook 日本工作社團位於左上象限，代表其易於取得且互動頻率高，為多數受訪者初期探索協力隊制度的重要工具；而 Facebook 演算法下偶然推送的貼文與 YouTube 推薦影片，雖然資訊接觸門檻低，卻因互動頻率低、不具持續性而位於左下象限；至於 LINE 群組與地方協力隊社群媒體，雖在制度內部屬於高度互動來源，但取得門檻相對較高，需透過人際引薦或制度參與方能進入，因而被配置於右上象限；這說明即使為高互動來源，其可及性仍受到制度界限所限制。

透過本圖可發現，工具型資訊來源在任職前後的資訊互動樣態與可近性分布存在明顯差異。任職前的資訊接觸以開放平台為主，呈現被動、單向的資訊接收型態；任職後則轉向關係導向、需透過制度參與才能接觸之閉環社群，資訊來源由公開轉向內部化，發現了資訊探索歷程中「進入制度」的重要性。

圖 4-31
工具互動頻率與資訊取得難易度



整體來看，任職前的資訊接觸模式以開放平台為主，呈現出被動式、單向輸入的特徵。受訪者多仰賴如 Google、Facebook、日本求職網站等熟悉且門檻

低的數位工具作為探索協力隊制度的起點，顏色標示中的「綠色（頻繁互動）」多集中於此類平台，顯示其使用頻率高且可近性良好；相較之下，「藍色（偶爾互動）」與「紅色（僅特定情形下）」則展現資訊接觸的偶發，儘管互動次數有限，卻常成為轉向參與的重要契機，例如 PA07 的 Facebook 偶然間的貼文推播、PA01 的 Youtube 影片推播，可能引發進一步的興趣與行動。任職後，資訊互動樣態出現明顯轉變，綠色來源逐漸由開放平台轉向具有地方與制度連結的媒介，如地方協力隊社群、Line 群組、實體紙本資料等，這些資源多需透過制度參與或人際網路才能接觸，顯示資訊流動從個人探索轉向關係導向與內部知識網路的型態雖然多數資訊來源在數字標記上被評為「1（非常容易）~2（容易）」，顯示其表面上的取得容易，實際上這些資訊往往隱含制度門檻與接觸條件，特別在任職後更為明顯，說明資訊取得的「可及性」與實際「可用性」之間仍存在落差。透過顏色與數字的交叉觀察，可見協力隊員在不同階段中，如何透過資訊媒介取得所需資訊，並將資訊由資源轉化為建立地方連結與制度關係的工具。

三、 資訊互動的實體場域

（一） 三角形：地點的分析

在受訪者所描繪的資訊世界圖中，三角形所代表的「地點」亦提供了觀察資訊互動中的場域面向。這些實體地點不僅是資訊的來源，也是影響協力隊隊員做出選擇與建構地方認識的媒介。從 PA01 至 PA10 的繪圖觀察中，可以辨識出地點的角色在任職前後具有不同的功能與意義轉變。

在任職前階段，許多受訪者與地點之間的互動多建立於學習與體驗基礎之上。學校、體驗營、實習之地方公所（役場）等地點成為最初接觸地方或協力隊制度的場域。部分受訪者（如：PA01、PA06、PA07）在研究所或實習經驗中接觸到與日本地方相關的資訊與經驗，這些學術與教育場域成為地方意象的初步建立之處。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場域具有實習機會，如 PA03 於 N 町公所為期 16 天的實習就被受訪者標註為重要資訊來源，顯示實地參與式的地方體驗在資訊獲取上有顯著效果。

此外，也有部分場域來自過去的個人經驗或社會接觸，如 PA10 曾於多個縣市出差，進而對地方產生好感；PA09 透過赴任前於東京的地方特產館（東京了

ンテナショップ) 短期打工更加認識從事農產品推廣的協力隊隊員們的工作，這些地點雖非正式的就業或實習機構，卻因其「在地經驗性」而強化了對地方的親近感與認同感。

圖 4-32

PA10 任職前因前工作的地點進而對鄉村有良好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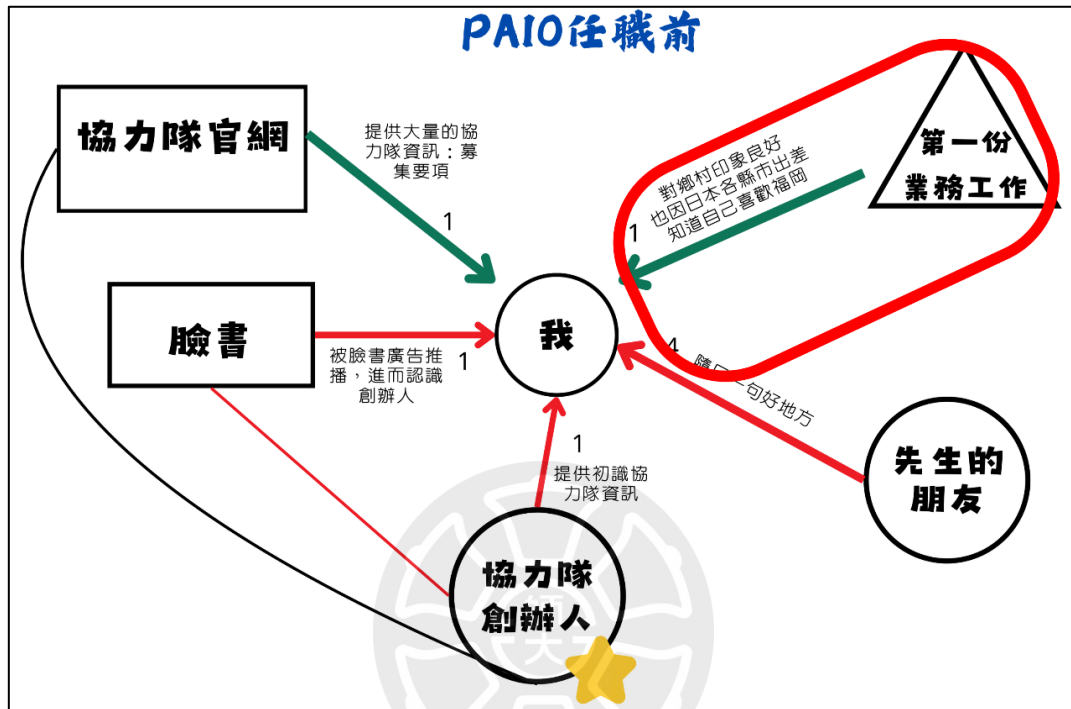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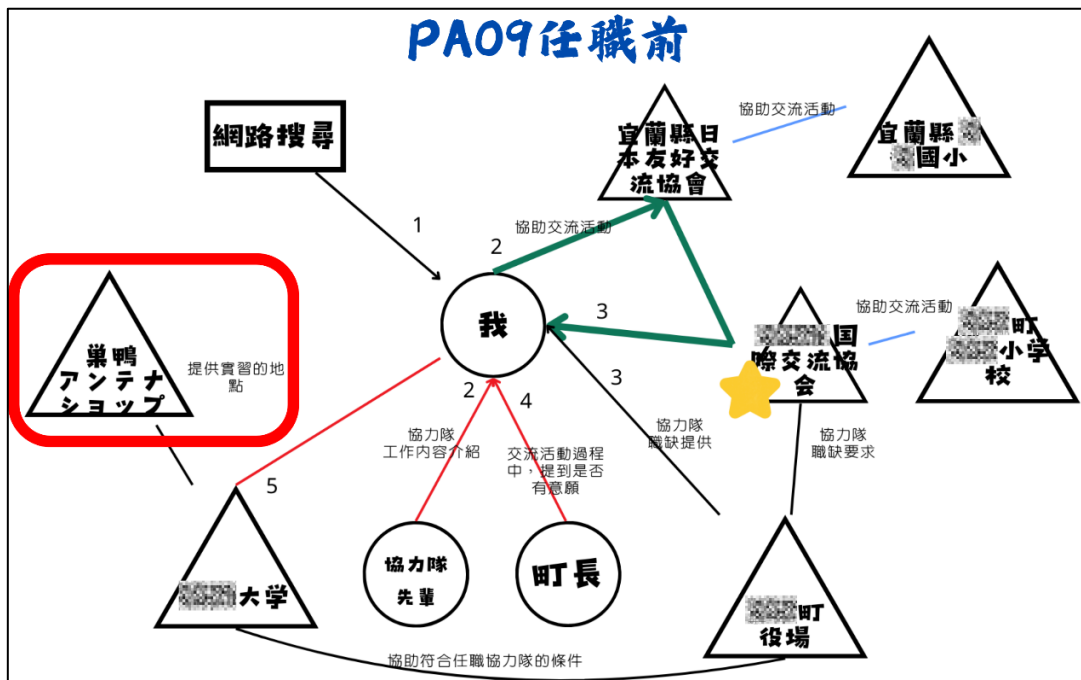


圖 4-33

PA09 任職前於東京的地方特產館短期打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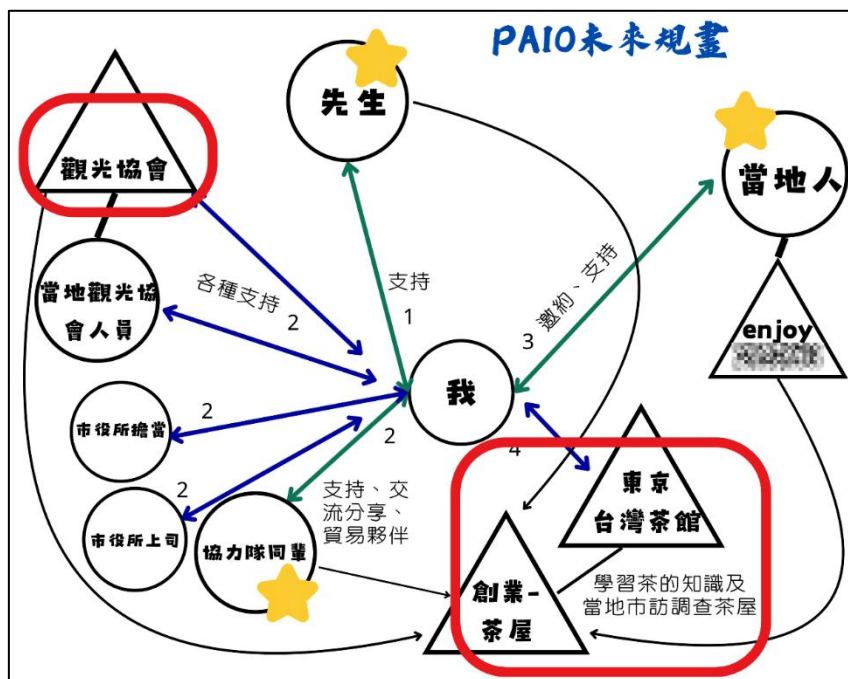


然而亦有部分受訪者在任職前缺乏與地方的直接實體接觸（如：PA04、PA05），資訊互動主要透過數位媒介或人際經驗傳遞而非地點上的經驗，反映出協力隊制度在招募階段，並不完全依賴實體場域作為資訊傳遞的唯一管道。

到了任職中階段，資訊互動的地點開始由前期的探索與接觸，轉向在地實踐。受訪者不僅深入地方公所（役場）、觀光協會、圖書館、公民館、旅行社、學校等場所，也經常參與如祭典活動、觀光展、販售市集、協力隊交流會等在地活動，將自身實際互動於地方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中。這些地點不僅是工作的舞台，也是資訊流動與知識交換的場域。例如 PA04 透過走訪 Y 町祭典認識地方，PA07 甚至前往臺灣參展、與不同町的隊員交流，顯示出地點資訊互動已不再限於單一地域，而具有跨域移動與經驗分享的特質。

值得關注的是，部分隊員的資訊互動場域具有未來導向與創業規劃性質，如 PA10 曾前往東京的茶館學習創業技能，並規劃在 U 市設立創業空間；PA08 參與奧運活動、實境遊戲與 YouTube 拍攝地點，也積極接觸創業諮詢平台，顯示地點作為資訊互動媒介已進一步延伸為創造與規劃的空間。此外，部分地點如圖書館、公民館，也出現在多位受訪者任職中的資訊互動圖中，反映出這些場域在在地資源整理與市民交流中的中介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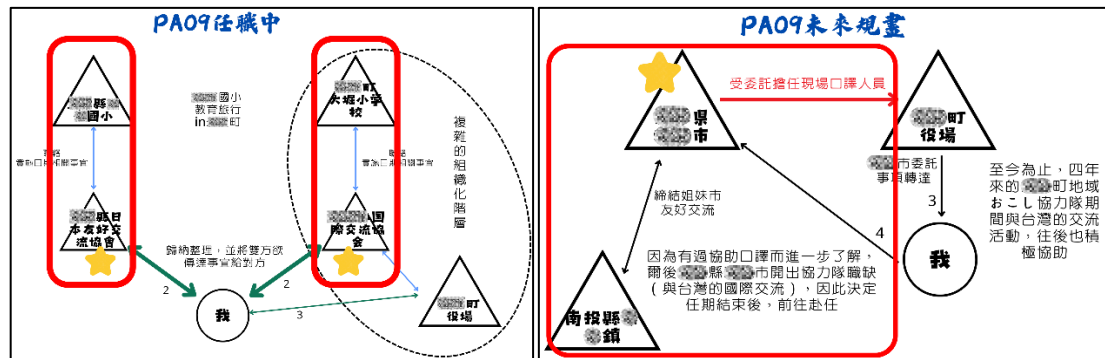
圖 4-34
PA10 未來規劃資訊世界圖，前往東京茶館學習未來創業技能



此外，也有特定受訪者（如：PA09）描繪出地方與臺灣在制度上的連結，例如地方姊妹市、交流協會、國小之間的合作，顯示資訊互動的地點場域已不再侷限於個人經驗，亦體現了中日地方之間的制度與網路連結，地點亦成為跨國地方外交的節點。

圖 4-35

PA09 任職中與未來規劃皆畫出臺灣與日本締結姊妹市，未來也志在繼續為雙方兩縣市擔任橋樑



總體來看，從受訪者在資訊圖中繪製的三角形地點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項觀察：

1. 任職前地點多為學習與探索性質：如研究所、公所實習、交流協會、留學與打工經驗，提供了初步接觸地方與建立協力隊知識圖像的機會。
2. 任職中地點轉為工作與參與場域：實際的地方組織（如公所、觀光協會）與公共空間（如圖書館、公民館、祭典場地）構成了資訊流動、社群連結與知識生產的基礎場域。
3. 場域具有跨域與未來導向特徵：如前往東京學習創業、參與臺灣與日本的展售活動、探索其他町作為未來可能的工作場域，顯示地點已從原處的地理範圍轉變為邁向他縣的行動與交流節點。
4. 地點與制度的中介功能浮現：包括地方政府、公所、姊妹市制度、日台交流協會等，都成為資訊傳遞與地方創生實踐的重要節點，體現地方作為制度網路一環的多重角色。

根據上述這些發現，地點作為資訊互動之一，已不再僅僅是物理位置的象徵，而是一種承載個人經驗、資源、社群網路與文化記憶的複合場域。協力隊

員透過與不同地點的互動，不僅獲取資訊，更在其中形構出對地方的理解、認同與未來的規劃實踐。表 4-5 為任職前/後資訊互動地點參照。

表 4-5
任職前與任職中資訊互動地點

階段	任職前	任職中
資訊互動地點		
學校（如：大學、語言學校）	✓	
體驗營	✓	
前實習之地方公所（役場）	✓	
前份於都市的地方創生商店工讀	✓	
前工作的場所 （如：前工作為業務、旅遊業，曾於多個縣市出差）	✓	
地方公所（役場）		✓
觀光協會		✓
在職職場訓練（研修）		✓
地方社區活動中心（公民館）		✓
國小		✓
當地祭典活動		✓
觀光展等販售市集		✓
全國、縣、市或町舉辦的協力隊隊員們交流會		✓

資訊來源：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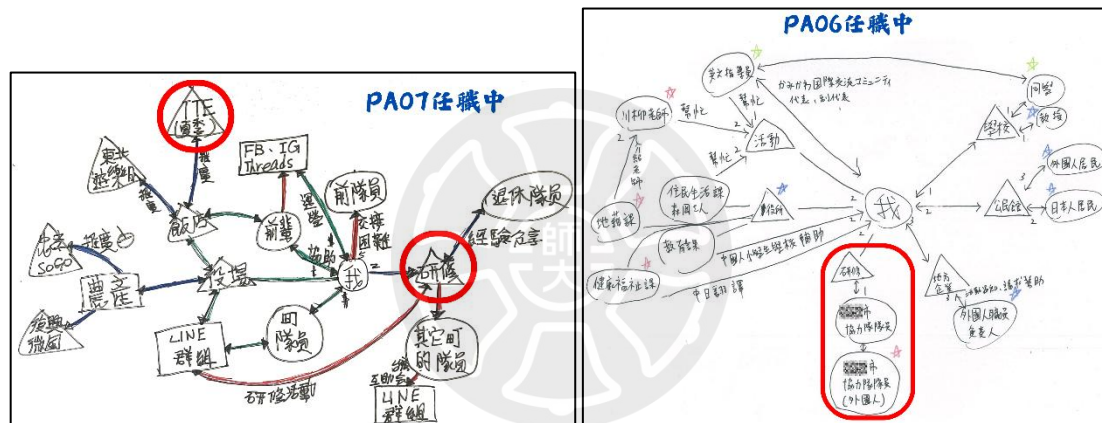
（二）顏色與數字標記（互動頻率與資訊取得難易度）的分析

在顏色標記方面，任職前的「綠色（頻繁互動）」來源多半圍繞個人既有背景與生活圈，例如畢業的研究所（PA01、PA06）、或前職場與大學時期赴日實習地（PA10、PA07），這些來源具有高熟悉、情感連結強的特質，亦常為受訪者初步了解協力隊制度與地方社會的重要支撐。而任職後的綠色來源則明顯轉為在地資源，例如所在地的公所（役場）（PA05、PA06、PA08、PA09）、觀光協會（PA10）、祭典活動（PA04）、在職職場訓練（研修）（PA07）與地方社區活動中心（公民館）（PA06），顯示出資訊互動網路從私人熟人圈，轉向在地行動者與公共制度接點的轉變。

而「藍色（偶爾互動）」與「紅色（在特定情況下互動）」的標記，則呈現出資訊互動的多樣化與階段變化。在任職前，這些標記多指涉一次性接觸的資訊管道，例如協力隊說明會（PA04）、語言學校的職涯輔導（PA03）或 Hello

Work 求職諮詢 (PA08) 等。儘管互動次數有限，這些資訊接觸仍可能在關鍵時刻提供重要啟發，對後續的行動選擇產生影響。而進入任職階段後，藍色與紅色來源則更多反映出工作歷程中的探索與機會。像是參加觀光旅展 (PA07)、活動拍攝支援 (PA08)、或駕訓班練習場 (PA02) 等短期課程與嘗試，雖屬非經常性安排，但卻具有屬實踐性質。這些互動場域成為協力隊員在地方發展與自我摸索之間的實驗平台，使其得以在不同情境中學習與調整。由此可見，藍紅色來源在後期也從初期的資訊觸及，轉變為反映特定事件與學習的媒介，例如臨時任務中的合作關係，或一次性的官方在職訓練 (研修) 等，展現出資訊互動的功能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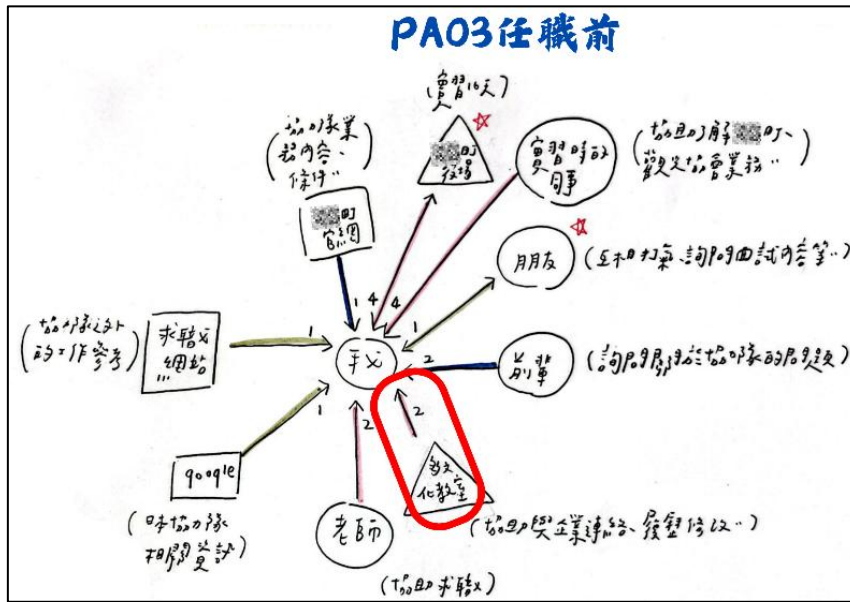
圖 4-36
PA06 與 PA07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皆標示出研修場域



在資訊取得難易度 (數字標記) 的面向上，任職前多集中在「1 (最容易) ~3」之間，代表受訪者大多能透過熟悉管道或社群順利獲取資訊，如畢業的研究所、語言學校。但也有如 N 町公所 (PA03)、G 市役場 (PA02) 這類標示為「4 或 5 (最困難)」的案例，反映地方政府在對外資訊傳遞上的距離感與進入門檻。

圖 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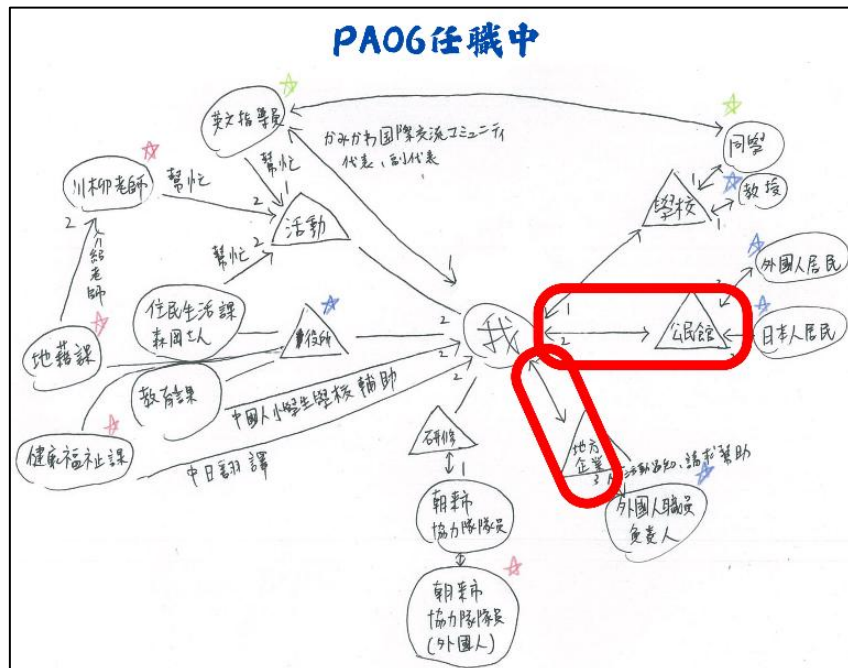
PA03 任職前經常利用語言學校的職涯輔導室（多文化共生教室）求職



任職後則出現更多 2~4 級的中段難度，例如地方社區活動中心（公民館）、地方企業、交流會等，雖非高度困難，但仍需靠人際互動、工作實踐或累積經驗才能取得。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綠色頻繁互動的單位，如 R 町公所（PA08）、M 町公所（PA09）等，有時其資訊也被標示為 2 或 3，顯示「互動頻繁」不等於「取得容易」，資訊交換仍受到體制上的複雜化等的影響。

圖 4-38

PA06 任職中資訊世界圖標示出公民館、地方企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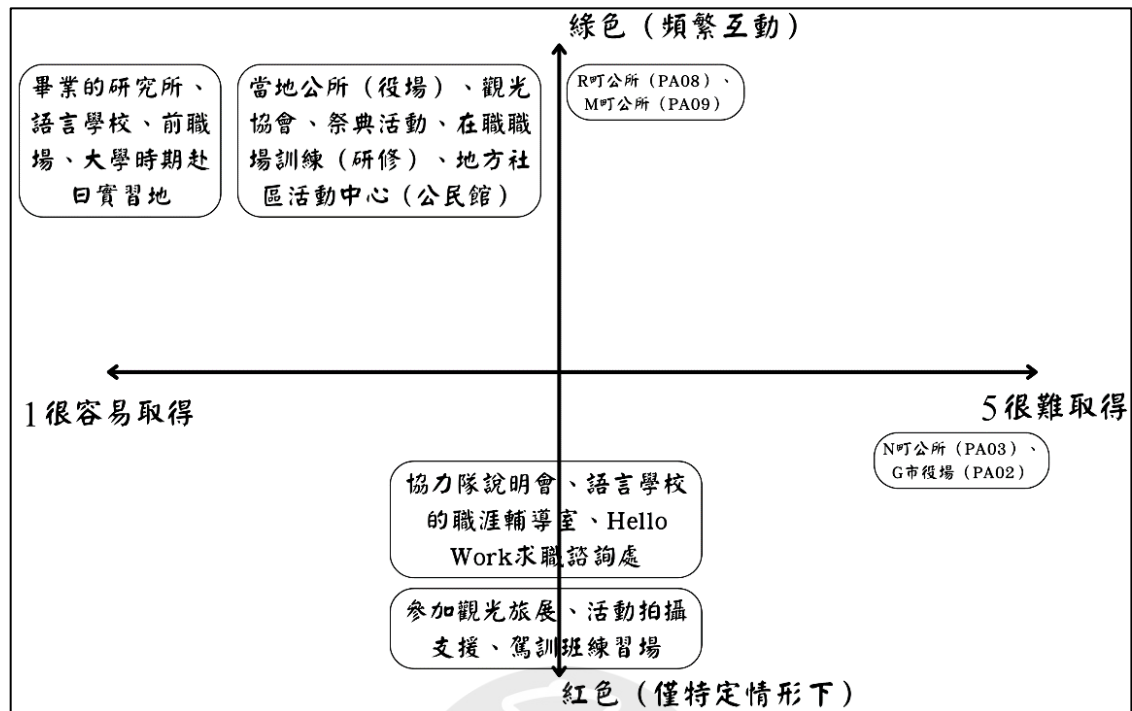


為了更具體地呈現受訪者在資訊行動中所涉入的實體場域互動樣貌，本研究進一步整理資訊世界圖中標記為「地點（三角形）」的資訊來源進行整理與分類，並以雙軸象限圖（圖 4-39）進行視覺化分類與詮釋。此象限圖的設計延續前述圖 4-24 之邏輯，將資訊來源依據兩項指標進行配置：

首先，Y 軸「互動頻率」的劃分上，本研究參考受訪者對特定地點的接觸密度、參與深度與持續性程度，將頻繁互動者標示為「綠色」，如任職後的 R 町與 M 町役場（PA08、PA09），顯示受訪者與當地公所間有長期與密切的資訊往返關係，常成為制度內部資訊交換的主要節點。相對地，若地點僅在特定活動或情境下出現、無持續互動，則被標記為「紅色」，例如觀光旅展、駕訓班或協力隊交流會，這些場合雖提供關鍵資訊，但性質屬於一次性或臨時性接觸。另有部分地點，如職涯輔導機構與 Hello Work 等，僅在某些受訪者的任職前探索階段短暫出現，互動頻率中等，因而歸為「藍色」分類。

再者，X 軸「資訊取得難易度」方面，依據地點之可及性、使用門檻、進入條件進行 1 至 5 等級的劃分。若地點位於受訪者生活圈中、可自由進出（如研究所、語言學校），則評為 1（非常容易取得）；若需透過制度參與、人際引介或語言能力支援才能進入者，如特定市役所、外地研修場所，則被歸類至較高等級（如 4~5）。例如圖中右上象限所列之 N 町公所（PA03）、G 市役場（PA02），即因其資訊不透明或外部人士難以進入而被標示為高難度來源。

圖 4-39
地點互動頻率與資訊取得難易度



整體來看，任職前的資訊互動地點多集中於左半象限，即「資訊取得相對容易」，且來源多與既有社會經驗（如大學、語言學校、實習機構）相關，帶有強烈的生活熟悉感與情感連結。這些地點多為協力隊制度初步認識的重要場域，也是角色形成與資訊啟發的第一站。任職後，資訊地點轉向右上象限，如地方公所、觀光協會、公民館等，這些地點需透過制度參與或在職身份才能進入，顯示資訊流動開始從開放系統進入到內部化、制度化網路，資訊取得條件亦因角色轉換而產生變化。

此外，即使為高互動頻率的綠色地點，亦不代表資訊取得容易。像是 PA08 與 PA09 所標記的 R 町與 M 町役場，實際仍存在語言門檻、內部知識差距或制度複雜性，使資訊雖常接觸但未必可即時理解與掌握。此種「互動高但難度亦高」的資訊地點，突顯出制度中資訊傳遞機制的多層性與不對稱性。

透過此象限圖可看出，協力隊員在不同階段中所接觸之地點，已不只是物理空間，更為資訊行動的社會場域，承載著認知轉換、角色扮演、制度進入與地方連結等多重意義。地點的資訊功能，從初期的探索與理解，逐步轉化為在地實踐、制度互動與未來規劃的行動平台，也印證地點作為資訊互動節點的重要角色。

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透過訪談與資訊世界圖的繪製與分析，探討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員的資訊行為與資訊互動網路。根據「人」、「物」、「地點」三類資訊來源的視覺化與訪談內容交叉分析，揭示隊員資訊世界隨著角色變遷與在地經驗累積而轉變的歷程。本節將綜合前三節的分析結果，從資訊實踐的理論視角，討論協力隊員資訊互動行為的階段特徵、行動策略與制度結構之關聯。

首先，在資訊互動對象方面，協力隊員從任職前主要仰賴的個人社交網路（如朋友、教授、第三方仲介），逐步轉向任職後的在地實務人脈（如地方公所職員、前輩協力隊、當地居民）。這一轉變呈現出資訊來源從個人化向在地化的遞移過程，透過資訊搜尋歷程（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ISP）模型（Kuhlthau, 1991）中由「開始與選擇」走向「探索與形成」的階段遞進。

然而，本研究發現，協力隊隊員的實際資訊行為歷程並非如 ISP 模型所假設的線性六階段發展，而是呈現出跳躍、重返與交錯的動態路徑。特別是在「探索」與「形成」階段之間，受訪者往往因資訊不足或外部條件改變而返回先前階段重新選擇。例如有受訪者在參與體驗營與面試後才確定任職地點，亦有受訪者在其他地區未錄取後，重新搜尋資訊並改變志向。這類情境顯示，在制度資訊不透明、職缺資訊片段化的現實條件下，求職者往往透過經驗參與、面試互動與人際對話不斷補齊資訊缺口，資訊行為呈現出高流動性與回饋性，反映出 ISP 模型需面對現實應用中的非線性特徵。於是接著本研究進一步從資訊主動程度、來源多元性與決策參與深度三方面，歸納出「計畫導向型」、「機會導向型」、「依賴型」三種類型，說明協力隊員在求職歷程中的資訊策略與決策方式具有顯著差異，補充了 ISP 模型中未強調的個體差異與社會條件因素，說明資訊搜尋過程往往受到制度可及性與人際網路的深刻影響。

其中，地方公所職員與早期認識的朋友，在任職前後皆被視為關鍵角色，顯示資訊依附網路的延續性，也說明個人資訊實踐如何在跨階段中保持穩定關係並同時發展新的人脈網路。這樣的資訊關係維持與轉換，呈現出隊員在變動中的社會位置下對資訊環境的適應能力。

其次，資訊媒介的使用也呈現階段性的變化。任職前，多數隊員依賴 Google、Facebook 等開放性平台主動搜尋職缺與制度相關知識，屬於探索導向；而任職後，資訊媒介則轉變為任務支援工具（如 Canva、ChatGPT）與內部訊息通道（如 LINE 群組），同時透過 Instagram、Threads 等社群平台進行在地互動與對外傳播。這種資訊媒介的多元角色與轉換，呈現資訊行為從「資訊探索」到「資訊應用」的功能發展，也突顯出資訊實踐具備社交與任務雙重層次。

此外，也有隊員較少使用工具媒介，偏好透過人際互動與現地參與獲取資訊，說明資訊實踐具備高度個人差異性，與任務內容、文化背景與個人性格密切相關。如此資訊策略也呼應宍戶容代與三瓶裕美（2019）所指出，協力隊的在地活動實踐與資訊接觸方式會因文化不同而呈現出多樣性。

再者，在資訊取得的場域方面，任職前的資訊互動多發生於學校、生活圈與實習單位，而任職後則擴展至地方公所、觀光協會、社區活動與跨地區協力隊交流空間。這些場域不僅是資訊的提供點，也構成具社會與文化意涵的資訊交換空間。像是地方創業諮詢平台、外國人支援組織等，更具有延伸至中長期生活與職涯規劃的「鋪路功能」，是資訊實踐中具前瞻性的節點。

然而，從資訊的互動頻率與可及性來看，仍可觀察到即使部分角色或場域與隊員互動密切，但因制度權限或文化理解落差等原因，資訊的實際可得性仍有限，出現「互動頻繁但難以獲得有效資訊」的情況。這也說明資訊流動嵌入在地方行政體制與文化脈絡中，隊員資訊實踐常面臨潛在的社會門檻。這與山脇啓造（2019）關於地方制度與文化影響外國居民參與的研究相呼應，指出地方開放性與社會期待對資訊行為有實質影響。

綜合來看，資訊世界圖的分析呈現出協力隊員在不同階段資訊來源、資訊媒介與互動場域的動態變化。隊員透過行動策略在制度限制與地方文化中不斷調整資訊實踐方式，逐步建構屬於自己的資訊支持系統。這些實踐既回應了文化與制度上的結構條件，也展現出個體的能動性。透過資訊世界圖，本研究描繪出協力隊員在任職過程中資訊世界的流動樣貌，並為理解外國籍參與者在地方制度中資訊實踐的挑戰與策略提供初步的理論參照。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綜整本研究針對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員於日本地方任職期間的資訊行為分析結果，並與過去相關研究進行比較，說明其在資訊互動歷程中的主要特徵與挑戰。第一節將根據前章研究發現，從資訊來源的演變、取得難度與行動差異三個面向，歸納隊員在跨文化脈絡下的資訊世界與在地參與歷程，並參照既有文獻進行理論與經驗上的對照。第二節則針對協力隊制度在實務推動中面臨的資訊可及性不均、青年參與門檻與地方融合困境等問題，提出對臺灣教育體系、日本中介支援組織與地方政府的具體建議。最後，第三節將就研究對象選擇、方法應用與理論深化三方面，補充提出未來研究可能延伸的方向。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從資訊行為與資訊世界圖的視角，分析臺灣籍地域振興協力隊員於任職前後的資訊互動歷程，歸納出以下三項結論：

一、 資訊來源的變化反映出角色與生活重心的轉變

本研究發現，協力隊員在任職前多仰賴非正式人際網路（如朋友、老師、仲介）與開放性數位媒介（如Google搜尋、Facebook社團）來搜尋制度與職缺相關資訊。此階段資訊行為帶有高度不確定性，伴隨焦慮與目標模糊的情緒，與山本訓弘（2017）指出外國籍協力隊在申請初期資訊獲取不足、制度認識偏低的問題相符，這些資訊多半來自熟人介紹或前輩經驗，而非正式管道。

任職後，資訊來源轉向在地行政組織、協力隊前輩、居民與地方活動場域，資訊行為也從單向接收轉為雙向互動，並積極應用於任務推展與社群經營。這一轉變不僅是資訊來源的變化，也標誌著從外部申請者到地方參與者的角色轉換，呈現出「從被幫助者到能處理事務者」的歷程。

此資訊世界圖的拓展亦可視為對Kuhlthau（1991）資訊搜尋模式中「不確定到構築意義」之歷程的反映。圖像呈現從以任職前的「個人經驗圈」為主，而任職後則拓展至「地方制度圈」與「社群參與圈」，圖像上出現更多與地方密切互動的實體與人物，說明資訊來源的轉換，跟隊員實際生活的重心與參與也同步在改變。

二、 資訊取得的挑戰：不只關乎距離，更牽涉制度與地方氛圍

協力隊員的資訊取得行為，不僅涉及技術操作與語言能力，更深植於地方的制度安排與社會文化氛圍中。本研究也發現，即使隊員已經身處在地方的行政體系或日常工作中，有些資訊仍然難以取得。常見互動對象如地方公所（役場）職員或協力隊前輩，當資訊涉及制度規則、申請流程或「內規」時，仍然可能出現資訊傳遞不清楚的情況（山本訓弘，2017；宍戶容代・三瓶裕美，2019）。這些都說明，資訊取得是和當地的氛圍、行政習慣與人際關係都有關，尤其對外國籍協力隊隊員來說更是如此。

此外，地方文化氛圍同樣關鍵。在文化封閉、熟人社會色彩濃厚的地區，資訊交換效果有限；相對地，在文化開放、鼓勵互動的社區中，資訊流通更順暢、信任關係也較易建立。此現象呼應Shuva（2021）對加拿大新移民的研究，指出資訊可得性取決於資訊環境的「可進入性」。Cho（2014）亦指出，在跨文化職場中，文化理解、組織規則與非正式互動的可及性將直接影響資訊交換與適應成果。對外國籍的協力隊員而言，地方制度的接納程度與文化包容性，決定其是否能由被動接收者轉為資訊流通的參與者。

綜上所述，資訊互動不僅是日常知識與事務的交換歷程，更是協力隊員在地社會角色建構的過程。資訊是否能取得，深受行政制度、地方文化氛圍與人際信任關係的共同影響。協力隊員在資訊網路中的能動性變化，正是其地方適應與參與歷程的重要發現。

三、 資訊行為展現個體差異，與任務類型與個性特質相關

本研究發現，不同協力隊員在任職後的資訊行動展現出顯著的個人差異。部分隊員擅長運用數位工具與整合資源（如Canva、ChatGPT、LINE群組等），將資訊取得視為任務管理的一環；另一些隊員則較依賴人際互動與現地參與，透過參加地方活動、拜訪居民，逐步累積地方知識與資訊網路。這些差異不僅來自個人能力，也受到任務性質（如觀光推廣、創業支援等）、過往經驗與個人特質的綜合影響。

進一步觀察發現，部分隊員將資訊行動延伸至未來生活與職涯規劃，主動參與創業諮詢、支援機構活動，或建立對外交流平台，使資訊行為具備延續性

與發展性。這與Sin與Kim（2013）關於國際學生使用社群媒體拓展資訊與人脈網路的研究相似，也呼應賴佳柔（2017）指出打工度假者的資訊搜尋會隨生活階段與互動經驗調整策略，並結合生涯發展目標展現出主動性與目的性。

也有不少隊員提到，雖初期以體驗生活為主，但在思考是否長期留在當地後，開始意識到主動參與與資訊搜尋的重要性，透過活動參與與建立人脈來拓展資訊來源。資訊行為的變化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們對地方生活的適應與參與狀況。

上述而言，協力隊員的資訊行為並非單一模式，而是因個人條件、任務需求與地方經驗而異。這些差異不僅體現出資訊行動的多樣性，也揭示資訊行為與個人發展動機之間的深刻連結。

四、 小結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發現，地域振興協力隊員的資訊行為具有長期歷時性的社會實踐，並非單純的資料搜尋或任務配合，而是隨著角色轉變、制度適應與個人目標調整而不斷演化的過程。資訊取得與運用不僅反映出隊員從「申請者」到「地方參與者」的身分變化，也揭示資訊行為在協力隊員地方適應歷程中的核心地位。

首先，資訊來源的轉變從非正式的線上社群與人際網路，轉向制度內部資源與地方社群互動，顯示出資訊行動與生活重心同步轉移的歷程。其次，資訊是否可得，往往不在於是否詢問，而取決於行政制度的開放性、地方文化的包容性與資訊網路的可進入性，使得協力隊員需在制度與人際之間不斷摸索與調整。第三，資訊行為亦展現高度個體差異，不同隊員會根據自身經驗、任務性質與個性特質，選擇數位工具、人際互動或實地參與等不同策略，有些人更將資訊行動延伸為職涯發展的規劃與實踐。

因此，資訊行為不僅是完成工作的手段，更是隊員理解地方、建構身分與實現參與的關鍵橋樑。它串連了制度結構、地方文化與個體意圖，形塑協力隊員如何在異文化環境中找到立足點。這些發現提醒著，若欲強化對外籍協力隊員的在地支持，除了提供資訊資源本身，更應重視資訊可理解性、人際可接觸

性與情境可共感性的建立，唯有如此，資訊行動才能真正轉化為地方參與與社會融合的動力。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對臺灣籍協力隊員資訊行為的分析，可見目前協力隊制度在實際運作中，仍存在資訊掌握不均、非本地青壯年參與門檻高、以及與地方社群連結困難等課題。為促進外籍或非本地參與者與日本地方的雙向融合，並提升制度的永續性與實質效益，本文分別針對以下三個面向提出建議：

一、 給臺灣大專校院與青年族群的建議：提前介入地方、創造制度參與契機

本研究顯示，部分受訪者（如 PA01、PA06）是透過教授引薦、研究所實習或學術計畫而接觸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制度，進而促成實際參與。這反映出目前多數臺灣青壯年對日本地方工作的理解有限，且缺乏制度化的接觸機會。為此，建議臺灣大專校院可與日本地方政府建立合作機制，設計如寒暑假地方創生體驗營、跨域學分課程或短期駐在實習等制度化項目，使學生在學期間即能實地參與地方事務，提早理解制度文化與居民互動樣態，為未來參與奠定基礎。

此類「事前接觸機制」不僅有助於降低跨文化進入的心理門檻，也能提升參與者的地方適應力與實務理解，呼應柴原良樹（2022）對地方創生人材育成階段性支持的重視。透過產學合作與實地體驗的結合，臺灣學生得以在進入職場前即掌握在地行政運作與社會文化脈絡，進而提升未來作為協力隊或類似職位參與者的準備度與留任意願。

臺灣教育單位亦可思考與日本地方政府建立更具制度性的跨國合作架構，提供青年赴日地方實習、研究與短期參與的制度支持，並建立返國後的職涯銜接管道，促進國際經驗在地轉化與長期發展。如此不僅能提升臺灣青年對地方創生議題的參與度，也有助於建立臺日雙向人才交流，推動在兩國的合作橋梁。

二、 對日本中介支援組織：強化資訊橋接與跨文化支援角色

本研究顯示，多數協力隊員在任職前即面臨資訊取得困難，普遍仰賴人脈介紹或非正式社群資訊，導致其對地方制度與任務內容理解不足，增加文化適

應與制度進入的困難度。鑑此，建議除了既有的中介支援組織支援的同時（石川和男，2023；栗原良樹，2022），也積極建構多語資訊平台，並結合實地體驗活動與事前說明會，以提升資訊透明度與參與者準備程度。

建議優先建立以英語為輔助語言的資訊平台，整合地區職缺、任職經驗分享與常見問題解答等內容，以協助具英語能力之外籍參與者順利理解制度與任務內容；同時，應鼓勵具參與意願者逐步培養日語能力，並設計語言支援與文化說明的過渡機制，協助其順利進入在地行政與社會網路。

此外，建議制度化設置「多語文化中介人材」或「協力隊前輩支援機制」，由具備語言能力與協力隊經驗者擔任協調者，提供制度解說、行政協助與文化翻譯功能，進一步強化資訊流通與跨文化溝通的支持基礎。

三、 對日本地方政府：導入制度彈性，強化參與入口

為回應更多非本地青壯年對地方工作的探索需求，建議地方政府可嘗試推動「試用型協力隊」或「階段式參與制度」，提供更多彈性參與的入口。研究發現，曾參與短期派遣、地方交流或實習活動的受訪者（如PA02、PA03、PA04、PA07、PA09）在正式任職後對地方制度與生活環境的適應力明顯較佳。

建議地方自治體設計一至三個月的短期任務，或推動「副業型協力隊」、「週末隊員制度」等模式，降低潛在參與者對長期承諾的心理門檻，同時作為地方政府的預篩與人才媒合平台。試用期間所累積的地方接觸經驗，將有助於日後轉為正式任職，並強化留任的穩定性與制度黏著度。

四、 未來研究建議

儘管本研究已具體呈現協力隊員在地方參與中的資訊經驗與挑戰，未來仍有若干面向可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首先，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未來可進一步納入其他國籍協力隊員或具不同語言背景之參與者，探討資訊行為是否因文化差異、語言能力或來日動機的不同而呈現異質性，進一步豐富跨文化資訊行為的比較視野。此外，亦可針對地方行政人員、中介組織或協力隊前輩進行多元觀點的資料收集，補足本研究

以隊員為主體之視角，從資訊供應端與制度執行面更全面理解資訊傳遞的瓶頸與協作機制。

其次，在方法論層面，資訊世界圖法為本研究提供了視覺化與參與式的資料收集與詮釋工具，未來可考慮結合長期追蹤研究設計，觀察隊員資訊行為與角色建構在不同任期階段的變化，亦可結合數位足跡分析（如資訊平台使用紀錄、社群貼文分析）以補充主觀敘述之侷限，提升研究資料的多元性與客觀性。

最後，從理論發展的角度來看，協力隊制度不僅是勞動派遣或人才交流的制度設計，更涉及個體在地方社會中實踐自我定位與文化協商的歷程。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資訊行為如何作為建構地方感、歸屬感與跨文化認同的途徑，為資訊行為研究開展更具社會學視野的拓展可能。



參考資料

- Cheers 地方創生 (2019)。「東京是個黑洞，把年輕人都吸走了」日本用 3 大關鍵讓偏鄉重生。
<https://web.cheers.com.tw/issue/2019/placemaking/article/05.php>
- Neuman, W. L. (2000)。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揚智文化。
- 吳智琪 (2019)。以視覺敘說取向探究臺灣赴日留學生的日常生活資訊世界圖〔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 林珊如、許禎芸 (2008)。從國內碩士論文探討資訊行為相關研究。圖書資訊學研究，3 (1)，51-74。
- 徐孟鈴、張承暄 (2021)。臺灣赴日打工度假者之跨文化適應研究-以歸因理論分析-。中華日本研究，12，89-115。
-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我國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臺灣經濟論衡，16 (4)。
- 陳世萱 (2022)。大學應屆畢業生初任求職情境中的資訊世界〔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 陳世娟與鄭宜青 (2022)。大學生申請出國交換計畫之資訊行為研究。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36 (1)，27-55。
- 鈕文英 (2021)。研究方法與設計：量化、質性與混合方法取向。雙葉書廊。
- 歐陽宇 (2024)。打工度假參與動機及回國職涯發展之研究-以日本打工度假為例。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12 (1)，11-21。
- 蔡天怡 (2021)。資訊行為理論與研究取向概述 (2010~2019)。載於吳美美 (編)，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瞻 2.0 (244-262 頁)。元華文創。
- 賴佳柔 (2017)。海外打工度假者之資訊行為〔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 賴鼎銘、黃慕萱、吳美美、林珊如 (2001)。圖書資訊學概論。國立空中大學。

戴辰軒 (2021)。自閉症兒童主要照顧者之資訊行為：以資訊世界圖研究法為取徑〔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一般社団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 (2009) 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とは。

<https://www.iju-join.jp/chiikiokoshi/about.html>

一般社団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 (2023) 令和 4 年度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 https://www.iju-join.jp/f-join/r4_syousai.pdf

一般社団法人移住・交流推進機構 (2024) 令和 5 年度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 <https://www.iju-join.jp/f-join/syousaiban.pdf>

二階堂裕子 (2022)。外国人とともに創る自立的な農山村コミュニティの可能性—持続可能な人口減少社会をめざして—。農業と経済, 88 (3), 45-54。

上水流久彦 (2024)。外国籍住民が地域おこし協力隊隊員として働くのはなぜか?外国籍地域おこし隊員と雇用自治体の視点からの初歩的検討日本文化人類学会第 58 回研究大会。

小竹森晃 (2016)。「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政策目的と実態：鳥取県智頭町を事例に。同志社政策科学院生論集, (5), 41-52。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4988/pa.2017.0000014413>

山本訓弘 (2017)。地域おこし協力隊制度における外国人起用に関する考察グローバルビジネ学会 2017 年度研究発表会予稿集。

<https://www.slideshare.net/slideshow/ss-80074742/80074742#1>

山脇啓造 (2019)。外国人材活用の条件 (下) 多文化共生政策の推進を。日本経済新聞朝刊。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XZO42402250T10C19A3KE8000/>

内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 (2015)。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総合戦略 (2015 改訂版)。 <https://www.chisou.go.jp/sousei/info/pdf/h27-12-24-siryoul.pdf>

日本経済新聞報（2014）。新成長戦略に「ローカル・アベノミクス」第3の矢は地方重視。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ZO73455890X20C14A6ML0000/>

平井太郎與曾我亨（2018）。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入口・出口戦略 全国版。人文社会科学論叢，5，275-313。

石川和男（2023）「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任期中・任期後における課題と移住・定住政策-移住・定住を視野に入れた政策展開を中心として-。専修商学論集，117，1-23。

宍戸容代與三瓶裕美（2019）。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活動地への定住と起業。都市問題，110（6），88。

谷脇茂樹（2019）北海道東川町に見る小規模都市の地方創生。富山国際大学現代社会学部紀要，11（2），53-67。

国立国会図書館（2024）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現状と課題

<https://dl.ndl.go.jp/view/prepDownload?itemId=info:ndljp/pid/13182008>

房安功太郎（2015）地域サポート人材の定住に向けた所得確保の現状と課題—岡山県h市の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を対象に—。農村計画学会誌，34，211-212。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2750/arp.34.207>

法務省出入国在留管理庁（2023）令和5年6月末現在における在留外国人数について。 <https://www.moj.go.jp/isa/content/001403955.pdf>

栗原良樹（2022）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現状と課題。農村計画学会誌，41(3)，114-119。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2750/arp.41.114>

総務省（2019）。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概要。

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707762.pdf

総務省（2025）。令和6年度 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の新規・拡充施策等。

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959445.pdf

総務省地域おこし協力隊全国ネットワーク（2024）。不安解消へのこれまでの取り組み。 <https://www.soumu.go.jp/kyouryokutai-network/>

総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自立応援課（2023）。令和5年度総務省地域力創造施策。

<https://www.jcrd.jp/01844df2e0c262fbed26ea57035ad407bdd7ad6c.pdf>

総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自立応援課（2024a）。令和5年度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隊員数等について。

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941085.pdf

総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自立応援課（2024b）。令和6年度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の新規・拡充施策等。

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926212.pdf

総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自立応援課（2024c）。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受入れに関する手引き（第5版）。

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975740.pdf

総務省自治行政局地域自立応援課（2023）。地域おこし協力隊事例集。

https://www.soumu.go.jp/main_sosiki/jichi_gyousei/c-gyousei/kyoryokutai_r04.html

読売新聞オンライン（2024年）。地域おこし協力隊員に外国人を積極登用、国が財政支援インバウンド期待で増加傾向。

<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40129-OYT1T50102/>

増田寛也（2014）。地方消滅-東京一極集中が招く人口急減。中央公論新社。

羅曉勤（2019年）。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を利用した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の現状—語りの中から見えてくるもの。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会議予集。

藤井孝哉（2020）。地域政策としての「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をめぐる制度の非対称性—愛媛県における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活動—。日本の科学者，633，600。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60233/jjsci.55.10_44

藤江開生（2024）。図書館員×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可能性：宮崎県椎葉村での活動から考える。載於中村百合子（編），St. Paul's librarian。立教大学学校・社会教育講座司書課程，71-79。

- Bates, M. J. (2010). Information Behavior In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4rd Ed. <https://doi.org/10.1081/E-ELIS4>
- Belkin, N. J. (1980). 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 as a basis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5,133-143。
- Case, D. O., & Given, L. M. (2016). Looking for information: A survey of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seeking, needs, and behavior
- Charmaz, K. (2015).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載於 edition, n. (編),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402-407.
- Chatman, E. A. (1999). A theory of life in the roun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50(3),207-217.
- Dalmer, N. (2017). 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to explicate the information-care relationship in dementia care.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54(1),647-649.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02/pr2.2017.14505401101>
- Dervin, B. (1992). From the mind's eye of the user: The sense-making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9,61-84.
- Goel, L., de Jong, P. and Schnusenberg, O. (2010). Toward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of study abroad intentions and behaviors. *Journal of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1(4), 248–265. doi:10.1080/08975930.2010.526011.
- Greyson, D. (2013). 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A participatory, visual, elicitation activity for information practice interviews.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50(1),1-4.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02/meet.14505001104>
- Greyson, D. (2015). Health-related information practice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young paren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https://doi.org/10.14288/1.0166526>

- Greyson, D. (2017) . Health information practices of young parent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73(5),778-802.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108/JD-07-2016-0089>
- Greyson, D., O'Brien, H., & Shoveller, J. (2017a) . Constructing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in the social information worlds of young mothers.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54(1),139-149.
- Greyson, D., O'Brien, H., & Shoveller, J. (2017b) . 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A participatory arts-based elicitation method for information behavior interviews.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39(2),149–157.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j.lisr.2017.03.003>
- Greyson, D., O'Brien, H., & Shankar, S. (2019) . Visual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world maps: An exploration of four methods. *46*(3).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177/0165551519837174>
- Hertzum, M. and Hyldegård, J.S. (2019) . Information seeking abroad: An everyday-lif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75(6), 1298–1316. doi:10.1108/jd-11-2018-0183.
- Jaeger, P.T. & Burnett, G. (2010) *Information worlds: Behavior, technology, and social context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Routledge.
- Jaehee Cho (2014) .Impacts of information-providers' perceived cultural backgrounds on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s: Investigation of American employees'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s in a Kore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the 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41, 66-79,<https://doi.org/10.1016/j.ijintrel.2014.05.003>.
- Kelly, G. A. (1963) . *A theory of personality: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W. W. Norton.
- Kitzie, V. L., Tsai, T.-I., Martzoukou, K., Mabi, M. N., & Greyson, D. (2022) . What is next for information world mapping? Internation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behaviors/practices in context.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44(4).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j.lisr.2022.101196>

- Krikelas, J. (1983) .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Patterns and concepts. *Drexel Library Quarterly*,19(2),5-20.
- Kuhlthau, C. C. (1991) . Inside the search process: Information seeking from the user'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42(5),361-371.
- Mabi, M. N. (2020) . Viewing immigrant labour integration through an intersectional lens : Inform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settlement of african immigrants to metro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Library, Archival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 Martzoukou, K., & Burnett, S. (2018) . Exploring the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needs and the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barriers of syrian refugees in scotland.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74(5),1104–1132.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108/JD-10-2017-0142>
- Nardi, B. A., & O'Day, V. (1999) . Information ecologies: Using technology with heart. Mit Press ◦
- Naveed, M. A., Batool, S. H., & Anwar, M. A. (2021) . Resident university students'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practices. *Information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26,1-19
- Oh, C.Y., Butler, B.S. and Lee, M. (2014).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ettling in an unfamiliar geo-spatial environment.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1(1), 1–11.
doi:10.1002/meet.2014.14505101068.
- Pettigrew, K. E. (1999) . Waiting for chiropody: Contextual results from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information behaviour among attendees at community clinic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35,801-817.
[https://doi.org/10.1016/s0306-4573\(99\)00027-8](https://doi.org/10.1016/s0306-4573(99)00027-8)
- Savolainen, R. (1995) .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Approaching information seeking in the context of “way of life”,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7(3), 259–294. doi:10.1016/0740-8188(95)90048-9.

- Savolainen, R. (2007a) .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Reviewing the “umbrella concepts” of information-seeking studies. *Library Quarterly*,77(2),109-132. doi:10.1086/517840
- Savolainen, R. (2007b) .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s and source preferences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A social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58(12),1709–1719.
- Shuva, N.Z. (2021) . “I actually got my first job through my ex-colleague”: Employment-related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Bangladeshi immigrants in Canada.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54(1),34-53. <https://doi.org/10.1177/0961000621992806>
- Sin, S.-C.J. and Kim, K.-S. (2013)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The informational valu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35(2), 107–116. doi:10.1016/j.lisr.2012.11.006.
- Singh, K., Kumar, M. and Khanchandani, V. (2015).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foreign students in University of Delhi: A surv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nowledge Content Development & Technology*, 5(2), 25–43. doi:10.5865/ijkct.2015.5.2.025.
- Sonnenwald, D. H., & Wildemuth, B. M. (2001) . Investigating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using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horizons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 Taylor, R. S. (1986) . Value added process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Bloomsbury Academic.
- The Asahi Shinbun (2021) . In major shift, japan looking to accept more foreigners indefinitel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4484056>
- Tsai, T.-I., Chen, H.-J., Tai, C.-H., & Chen, Y.-L. (2019) . How do students’ information world maps change while developing their thesis topics? A longitudinal study using artsbased elicitation interviews.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56(1),495-498.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02/pra2.54>

Wilson, T. D. (1997) . Information behavior: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33(4),551-572.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S0306-4573\(97\)00028-9](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S0306-4573(97)00028-9)

Wilson, T. D. (1999) . Models in inform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55(3),249–270.



附錄一：知情同意書

親愛的協力隊隊員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洪毓蓮，目前在柯皓仁教授指導下進行碩士論文研究，題目為「探討地方創生職員之資訊行為與資訊世界圖—以日本地域振興協力隊臺灣籍隊員為例」。本研究希望了解您在加入協力隊前、任期中以及未來規劃中，需要哪些資訊，以及如何找到和使用這些資訊，並透過繪製資訊世界圖，分析您在工作中的資訊來源和社會網路。研究對象為任職於日本自治體地域振興協力隊計畫的臺灣籍隊員，任職地點與任職時間長短不拘。

本研究蒐集之資料均會匿名處理，未來研究成果不會呈現您的真實姓名，填寫之詳細資訊亦會重新歸納處理，以保障您的個人隱私。訪談進行過程將全程錄影，並且在彙整成逐字稿。若是您不同意錄音、不願某段發言被錄音，或是您中途想退出訪談，請您隨時提出且不需提供理由，無需感到壓力。在論文完成前，您有權利隨時退出研究，訪談結束後若想撤銷同意，請您與我聯絡，我會一併銷毀資料。

唯部分訪談內容及完整資訊世界圖可能作為案例援引至研究論文中，以支持研究結果。錄影檔、逐字稿、資訊世界圖電子檔將由研究者妥善保存，且於研究成果發表完畢七年內刪除銷毀，並僅供本研究相關分析與成果使用，亦無衍生的商業利益。

若您詳閱完本文，並同意以上所述研究相關事項，請告訴我，謝謝您！

受訪者是否同意：我同意我不同意，日期：2025年__月__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柯皓仁 博士

研究生：洪毓蓮 敬上

2025年01月15日

附錄二：基本資料調查問卷

第一部分 受訪者基本資料調查

本問卷將詢問您個人求學、求職及目前任職情況相關問題，以協助我們了解您的求職歷程及背景脈絡。所有填答內容均將以匿名方式處理，僅用於研究目的，不會作其他用途。您的工作地點、領域、職稱等資訊未來呈現方式將整理成大分類，整份研究中不會直接呈現，請放心作答。如對問題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提出。感謝您的協助！

基本背景資訊

1. 請問您的性別：生理男生理女
 2. 請問您的年齡：_____歲
 3.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國中（含）以下高中職 專科、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
 4. 請問您最高學歷畢業的科系：_____
- 教育領域 藝術及人文領域 社會科學、新聞學及圖書資訊領域 商業、管理及法律領域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領域 資訊通訊科技領域 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 農業、林業、漁業及獸醫領域 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領域（根據教育部統計處大專學科標準分類）

過去留學或工作經驗

5. 請問您學習日語的時間：約_____月/年
 - (1) 有相關日語能力檢定考試的證照嗎？若有，請問您的證照是_____
6. 請問您有在日本留學，如：交換留學、就讀語言學校、大學（含學、碩）或專門學校等經驗嗎？無 有
 - (1) 若有，請問您上一份的留學經驗型：交換留學語言學校大學（含學、碩）專門學校請問為何時？_____（西元）年____月至_____（西元）年____月
請問當時留學的學校為：_____
7. 請問您在加入地域振興協力隊之前，您是否有在日本工作的經驗（含實習、打工、約聘或正職）？無，跳過此題。無，但有非在日本的工作經驗，進入問題7-2。有，進入問題7-1。
 - 7-1. 若有，請問您上一份的工作經驗：實習打工約聘正職
 - (1) 請問您上一份的工作地點為：日本_____（縣市）

(2) 請問您上一份的工作時間：_____（西元）年____月至_____（西元）年____月

(3) 請問您上一份工作的業界（依照日本業界分類標準）：製造業商社零售金融服務軟體及通訊媒體官公廳（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公所）

(4) 請問您上一份工作的職種（依照日本職種分類標準）：管理職專業及技術職（研究人員、技術開發人員、醫師、藥劑師等）事務職（行政職務）販售職（結帳、零售店販售員等）服務業（旅館及飯店的服務生、娛樂設施等的服務人員、美容師、照護員等）保全職農林漁業職（肉牛及乳牛飼育員、園藝師等）生產程序業（鐵工、飛機維修員等）運輸及機械操作業（火車司機員、飛機機師、巴士導覽員等）營建及採掘業（營建土木工、配管工、礦工等）搬運、清掃、包裝等職業

7-2.就無在日本工作的經驗，請問您上次工作地點為：_____（國家與縣市）

(2) 請問您上一份的工作時間：_____（西元）年____月至_____（西元）年____月

(3) 請問您上一份工作的產業：_____

(4) 請問您上一份工作的職位：_____

關於現在任職的協力隊工作

8.您是任職於何時開始任職於此協力隊？_____（西元）年____月

9.目前的工作職稱：_____主要工作內容：_____

10.協力隊的計畫來看，有提倡隊員於任期結束後定居，您有考慮過未來定居於此嗎？無 有 其他_____

附錄二：訪談大綱

第二部分 質性訪談

任職前的資訊需求與搜尋歷程

接觸與初始認識

1. 您是透過什麼管道得知地域振興協力隊的資訊？申請這項計畫的原因是什麼？在決定申請此計畫之前，您有做哪些相關功課以及關注哪些資訊？（如地方創生計畫內容、工作地點、待遇等）

搜尋與評估

2. 請您分享搜尋這些資訊時，您曾經遇到找不到需要的資訊的情況，或者在查找或取得資訊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

3. 請您分享曾經很容易就找到所需資訊的情況。哪些類型的資訊比較容易查找或取得？您覺得為什麼查找或取得這些資訊較容易？

決策與準備

4. 在準備申請時，請問哪些人幫助您找到需要的資訊（如朋友、前輩、相關業界人員）？您偏好和認為重要的人或資訊來源管道為何？

任職期間適應跨文化職場的資訊世界

資訊需求與取得

5. 在您任職期間，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難是哪些？這些困難通常與哪些方面相關（如專業知識不足、語言障礙、文化差異、與人互動等）？

6. 談談您通常透過哪些管道或人尋求資訊支持（如前輩、朋友等）？這些來源如何幫助您解決問題並促進您的適應過程？

7. 您是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的？談談您經常透過哪些地點或平台獲取或分享資訊？這些交流和地點對您的工作適應有何幫助？

未來規劃資訊行為

未來規劃相關資訊需求

8. 任期結束後，您目前對未來的規劃有哪些？（如是否留在當地、返回臺灣、或其他選擇）考量這些因素的同時，會透過何種管道詢問與評估相關資訊？

附錄三：資訊世界圖繪製說明

第三部分 邀請繪製前往任職協力隊歷程的資訊世界圖

一、簡介與準備

感謝您參與我們的研究！接下來，我想邀請您幫助我繪製一張簡單的「資訊世界圖」。這並不是一幅需要藝術技巧的畫，而是用來表達您任職於地域振興協力隊歷程中的資訊互動方式。您無需擔心繪畫能力。我會將重點關注於您的經驗和資訊互動，而非繪圖技巧。

資訊世界圖是一種用圖像來描繪您如何獲取、分享和使用資訊的方法。

這張圖會包括：

- 人：對您提供幫助、分享資訊或交流想法的人，例如師長、前輩、朋友等。
- 地點：您曾經獲取或交換資訊的場所，例如工作場所、社區活動空間、網路論壇。
- 物：您依賴的工具或媒介，如數位工具、書籍、宣傳單。

您只需要用簡單的符號、箭頭或文字來表示這些元素之間的互動，例如哪些人對您特別重要、在哪裡找到有用的資訊，或哪些工具幫助您解決問題。

在繪圖過程中，沒有正確或錯誤的方式，您可以自由表達，甚至邊畫邊說，也可以選擇保持沉默。預估此階段約15分鐘。繪製完成後，請您說明圖中各項元素的代表意義，例如符號、文字與圖像的意義。此資訊世界圖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您在協力隊工作中的資訊需求與互動模式，並為研究後續分析提供有力的視覺資料支持。

二、繪圖步驟與要點

請您幫我將準備好的繪圖工具（如A4紙、鉛筆、至少三種顏色的色筆），放在一旁

步驟一：時間軸劃分

在紙上切出三段時間軸，依照「任職前」、「任職中」、「未來規劃」三階段，每段皆須提及「人、物、地點」的資訊來源和互動。於空白處中央標示「自己」的位置，不必為圓形符號，任何可以代表自己的符號都是允許的。例：「任職中，哪些人在幫助您適應職場文化？」、「任職前，您常去哪些地方獲取職缺資訊？」。

步驟二：標準化圖例

統一使用符號表示資訊世界中的「人、物、地點」。圓形：人（師長、前輩、朋友等）；方形：物（如手機應用程式Facebook、Instagram等、瀏覽器搜尋、宣傳單等。）；三角形：地點（如實體活動、就業資源中心、網路論壇等）。圖例旁寫下標註，例：「協力隊前輩—提供工作建議」、「Facebook社團—幫助了解當地活動」。

提示

（圓形）

- 在前往任職及工作過程中，您經常向哪些人尋求資訊？（如協力隊員前輩、朋友、教導您的日語老師等）

- 您是否記得有人主動向您提供過對工作特別有幫助的資訊？可以跟我們分享他們是誰，以及提供了什麼內容嗎？

物（方形）

- 在獲取或使用資訊時，您經常依賴哪些工具或資源？（如社群媒體等）
- 這些工具或資源如何幫助您解決工作的問題？（如使用搜尋引擎查詢日語詞彙）

地點（三角形）

- 在哪些地方，您最常獲取或交換資訊？（如社區活動中心的文化交流、辦公室、網路論壇等）
- 哪些地點對您的資訊互動特別重要，為什麼？

步驟三：使用箭頭強調資訊互動與流動

為捕捉「資訊如何流動」，以及跨文化互動中的關鍵行為。用箭頭表示資訊流向，區分「單向提供」與「雙向交流」的互動，並標明「資訊類型」。（如「跟前輩討論日本工作的甘苦談」、「社群媒體幫助了解當地活動」。）

步驟四：加入額外標記，利於區分不同的資訊屬性。

用星號標出「最重要的資訊來源」。用顏色區分資訊互動的頻率，綠色：頻繁互動（如每天與哪位朋友聯繫）。藍色：偶爾互動（如參加社區活動）。紅色：僅在特定情境下（如緊急問題時聯繫）。用數字標出獲得資訊的難易程度（1=很容易，5=非常困難）。

第四部分 反問與訪談資訊世界圖中的圖像、文字與符號的意義

一、回顧圖像：

- 1.說明為什麼您的圖中打星號的資訊來源對您的日後的行為最為重要？
- 2.繪製過程中，有沒有發現一些您在口頭表達中未提及的資訊來源或互動關係？